

《江青传》

作者：叶永烈

声明：本书仅供读者预览，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

第一章 秘密抄家

夜半鬼敲门

子夜，万籁俱寂。上海淮海中路的武康大楼三楼三室，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谁呀？”保姆披衣起床，问道。

“开门！”命令式的男声。

“你是谁？”保姆又问了一句。

“开门！”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口吻。

保姆刚把房门开了一条缝，一群凶神似的男女就拥了进来，约摸十几个人。一律便衣，男青年居多。进屋之后，立即把房门反锁。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午夜。

地点：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寓中。

郑君里和夫人黄晨^①都被惊醒。一人看管一个，郑家的人都失去了行动自由。

^①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六日，本书作者采访了黄晨。

没有任何证明，没有说明来者是什么单位。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他们拉上窗帘之后，就动手抄家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端坐在沙发上，用眼神指挥着。看得出，他是头头。

年轻人们打开郑家所有的箱、柜、抽斗。看得出，这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物，语言不多，动作熟练；把每一本书卷曲，用大拇指指甲按着书页，迅速地逐页翻卷过去，查一下书中是否夹着纸头；每一本线装的书，都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片挑开，查看折页之中是否夹着什么……他们带来好几个米色拉链包，凡是写有文字的纸头，尤其是信件，全被装进包里。就连黄晨的工作笔记，儿子的成绩报告单之类，也都囊括一空。

直到清晨六点，头头说声“走”，这群人呼啦一下子就撤了。

郑君里和黄晨赶紧来到阳台，朝下俯瞰：只见那些人三三两两分头而走，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郑君里觉得这群人来得增蹊，去得突兀，当即打电话给单位——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原海燕电影制片厂）。

“红旗电影造反兵团”的头头异常震惊：赵丹刚刚来过电话，说昨夜一伙来历不明的“红卫兵”闯入上海湖南路八号三楼他的家中，一直抄至清早才走。不抄财物，唯抄信件、笔记、日记、画报之类。

紧接着，顾而已和陈鲤庭两家，也打电话向“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天马电影制片厂）告急。顾而已和陈鲤庭都是“电影老人”。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燎原》、《槐荫记》等电影，还主演过许多影片；陈鲤庭导演了《两人行》、《结婚进行曲》等影片，写了电影剧本《鲁迅传》等。

在上海坐镇的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马上接到来自电影界的密报。

“歼七”追抄一封信

一位军人领着我。漫步在上海市区一条幽静的马路，走进一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门。

像绿绒地毯般的草地，整洁的水泥路，一幢幢小巧玲珑的两层洋房。

这儿是空军招待所——巨鹿路八六九号。

军人指着一幢小楼对我说，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就是在那儿跟“联合舰队”的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一起开秘密会议，写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军人又指了指另一幢小楼说道，当年“十·八”抄家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通宵坐镇指挥的，便是江腾蛟。

江腾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一九八一年进行公审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一。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一九二〇年，江腾蛟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这个县出生了二百二十三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改名红安县。江腾蛟本是这二百二十三名之一，然而，后来他却成了将军中的败类。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当林彪下达发动武装政变的手谕，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江腾蛟担任了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江腾蛟得意地斟满一杯酒，对“三国四方”——上海的王维国、杭州的陈励耘、南京的周建平和从北京秘密来沪的林立果狂笑道：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江腾蛟成为林彪的心腹，代号“歼七”。

江腾蛟的形象，那挺直的腰板像军人，而戴上那副黑框眼镜则像文人。他多年在上海空军担任领导，家住离巨鹿路不远的高

很快地，她又获知，著名京剧演员童芷苓昨夜也遭突然抄家。

同时行动，同样手法，抄了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五家，显然有来头。

然而，李文静居然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未接到抄家者的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了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刊载《郑君里、黄宗英、童芷苓等家中被不知名的红卫兵搜去内部材料》。

这“不知名的红卫兵”究竟来自何方？受谁指使？

李文静急告当时正在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

张春桥、姚文元也愕然，不知何方神仙突然插手上海。

李文静后来这样回忆蹊跷的“抄家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晚赵丹、郑君里等人家被抄，我们认为事关重大，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未回信，仅叫警卫员带口信说，你们不要管了。”（引自李文静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交代材料。）

李文静答复电影界、京剧团的造反派：“不要管了！”

“夜半鬼敲门”，这“鬼”来自何方？五位被抄家的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如同蒙在鼓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受尽凌辱的郑君里，死于危难之世。

一年之后，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顾而已也饮恨而逝。

他俩至死不知那次神秘抄家的主谋是谁。

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笼罩着中国大地的阴霾之气一扫而光，那个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主谋落入人民的法网。

“十·八”抄家案被列为“国案”进行审查，这才终于大白于天下……邮路。他把女儿送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他已是“老上海”了。

一九六四年，他出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此后不久，林彪之妻叶群来到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四清”蹲点，亲手树起那个闻名全国的“活学活用”标兵——不识字的社员顾阿桃。江腾蛟侍奉叶群左右，忠心耿耿，被叶群看中了。以至当“文革”锣鼓敲响之后，林彪唯恐子女在北京不安全，秘密地派人把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如此推心置腹，江腾蛟已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已是南京部队空军政委兼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的江腾蛟，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任务”，当即秘密来京。

夜色苍茫。一辆轿车直奔钓鱼台十六号楼。车上坐着吴法宪和江腾蛟。他们刚刚进楼，叶群已坐在那里等他了。

没有寒暄，叶群开门见山：“江政委，请你来京，为的是要在上海执行一项绝密任务。”

一种特殊的信任感，使江蛟故不由得挺直胸膛，大声地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叶群马上压低了声音，悄然在江腾蛟耳边说道：“是这样的：这项任务是江青同志前几天交办的。考虑到部队执行任务的保密性好，所以尽管这项任务跟空军业务无关，我还是考虑让你执行。任务并不太复杂。江青同志说，她有一封信，落到了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中。你设法把这封信追回来，但不要惊动别人……”

原来，就这么一桩小事，江腾蛟不由得感到轻松起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光是抄郑君里一家，目标太暴露了。能不能同时再抄几家？”

叶群不由得抚掌而笑，她也早已虑及这一点，只是故意不说出来。果真，精明的江腾蛟，也想到了这一步棋，跟叶群不谋而合。

于是，增加了四家，以便遮人耳目——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江青曾说起，这些人也知道她在三十年代的一些底细。

世上曾有过“陪斩”。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发明了“陪抄”。

为了绝对保密，叶群给这五家取了代号“老大”——郑君里；“老二”——赵丹；“老三”——陈鲤庭；“老四”——童芷苓；“老五”——顾而已。

抄家的主要目标是“老大”。其余“陪抄”的四家，估计也有“防扩散材料”。

叶群叮嘱江腾蛟道：“把信件、日记本、笔记本、画报，凡是文字材料，统统抄回来。然后，你亲自押送到北京，交给我。直来直去，不要让任何人插手。”

江腾蛟不敢怠慢，唯唯领命。

翌日，江腾蛟就神秘地飞回上海……

后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上午，江腾蛟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如下供认：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吴法宪打电话叫我来北京，还说叫我保密。我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吴法宪让我上他的车一同去钓鱼台见叶群，……叶对我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这封信在哪个手上不清楚，你可以回去组织一些人冒充红卫兵搜查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等统统都拿来。叶群说要绝对保密。……”

教导队冒充红卫兵

朝沙发下看看，拉开茶几瞧瞧，江腾蛟在仔细检查着巨鹿路那幢小洋房，生怕暗藏着窃听器。江腾蛟的干将——上海空军部队文化处长张彪，奉命来到。紧接着，组织处长裘著显、秘书处刘世英、保卫处副处长陶崇义、军务处副处长蒋国璋，赶来报到。

六个脑袋，几乎凑在一起。江腾蛟轻声细语，交代了来自北京的绝密任务。但是，江腾蛟只说“首长指示”，并未讲明“首长”是谁，也不点明真正要追抄的是什么。江腾蛟又增添了于伶、周信芳两家，以遮掩真正的目标。

按照江腾蛟的部署，张彪负责侦察七家地形。虽然张彪的脚有点瘸，行动却疾如电，迅如风。只花了半天时间，他就把这七家周围地形、出入路线查个水落石出。然而，神不知，鬼不觉，他的侦察不露形迹。

裘著显奉命组织抄家队伍。江腾蛟决定，这次以“上海市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名义去抄家。裘著显从警卫排里挑了二十多名战士，假装红卫兵。不过，清一色的男青年，未免太“整齐”了。于是又从军内“可靠”的干部子女中，选了二十多人。

就在这时，张彪侦察回来了。他附在江腾蛟耳边，建议减去于伶、周信芳两家，原因是于伶

家就在空军招待所对门，挨得太近容易暴露自己，而周信芳因主演京剧《海瑞上疏》，被当作“南方的吴晗”，不知抄了多少次家，已经没有“油水”了……

江腾蛟觉得张彪言之有理，也就放弃了于、周两家。

夜幕降临。四十多名假红卫兵，穿着各色便衣，集中在上海东北角、离虹口不远的新华一村。这个新村，一排排米黄色的楼房，位于僻静之处，在上海并不显眼。其实，那儿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来上海，常住那里。后来，王维国为林彪反革命政变秘密训练的敢死队——“教导队”，就住在新华一村，在那里进行格斗、捕俘和各种特殊训练……

秘密会议在新华一村空军图书馆里召开。夜里，那儿无人问津。张彪面对四十多个假红卫兵，下达“战斗任务”：“我们空军有一份绝密文件遗失了。据侦查，落到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童芷苓、顾而已这五个黑帮分子手中。为了不打草惊蛇，领导上决定让你们化装成红卫兵，对他们进行彻底抄家。凡属文字材料、照片，都要没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暴露军人身份。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紧急任务，一定要圆满完成……”

江腾蛟作了如下五条规定（据张彪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在特别法庭上所作的证词）：

“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本、笔记本、照片等物品，其他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准动；”

“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

“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

“四、临时行动，将军用卡车上牌照用纸糊上；”

“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

假红卫兵们被蒙在鼓中，唯有带队者才知道意图。迎着秋风，几辆卡车在昏黑、冷清的马路上急驶。郑君里家是重点，由秘书处刘世英和军务处副处长蒋国津两人带队。“一号”江腾蛟的女儿，也混在假红卫兵之中。

“二号”赵丹家，由裘著显带队。

“三号”陈鲤庭家，由张彪负责。

“四号”童芷苓家，由陶崇义负责。

“五号”顾而已家，由杨启良负责。

如同作战一样，五路兵马按命令同时行动。

这五家都是上海著名的“黑帮分子”，都属“不设防的城市”。五路兵马虽然没有一纸证明文书，却如入无人之境，空手而去，满载而归……

江腾蛟通宵坐镇巨鹿路，守在电话机旁。总算一切顺手，五路兵马没有遇上任何“麻烦”……以陈丕显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当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尚未被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印第九十九期《文化大革命动态》，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月九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等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搜文件文物，不抄其他，行动秘密……”抄家的“战利品”分两次送往北京。先是江腾蛟和张彪飞去，然后刘世英、裘著显飞去。“上面”交待的任务只是抄一封信，而他们带去的“战利品”却是鼓鼓囊囊的四麻袋，另加一小包。

当时的路名已经“革命化”了，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那时被改称为“反帝路”。来自上海的四位神秘客人，一下飞机，便由空军党办二科科长卫球迎接，送往“反帝路”四十四号空军招待所，住入北楼六号门，江腾蛟住楼上，另三个住楼下。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抄家“战利品”

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见不得光。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夜九时许，空军招待所忽地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关闭所有的路灯。

路灯灭了。在一片黢黑之中，几辆轿车悄然而入，停在九楼六号门前，从车里闪出几条黑影。据当事人张彪回忆：

“晚上九点多，江腾蛟把我的房门推开，叫我出来。我出来一看，是叶群、吴法宪、林豆豆，还有一个青年人模样，头一晃就被他们身影遮住未看清，因为都集中在楼梯上，我估计是林立果。送走叶群、吴法宪等以后，江腾蛟回到楼上他住的房间。我进去一看，那麻袋东西没有了。”

直到那几辆轿车驶出空军招待所之后，那里的路灯这才重放光明。

还有一个细节，不能不提及：那几辆轿车的车牌，全用纸糊上了！

那几个麻袋，放在轿车的后尾。

此后的事，当事人、原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八日为特别法庭所写的证词中，谈得十分详细：

回到了毛家湾，叶群让把材料送到她卧室，倒在地毯上……在分类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材料完全是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郑君里等……

“（大约过了三天）叶群说，江青同志指示，要将这些材料放到最保险的地方去……我已经同吴法宪讲了，放到空军指挥所去，你和张云生一块去，放到空军指挥所去……”

“过了将近两个月，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叶群从钓鱼台打电话告诉我，空军要把那包材料退回，你收下，我马上就回去。过了一会，空军党办科长卫球把那包材料送来交给我，我一看原封未动，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很快叶群就回来了，一同来的还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他们领到客厅，到办公室找我要走材料，并让我快点到后院小伙房捅开火炉子，说是要销毁这包材料。我到后院刚把火炉子捅开，叶群领着江青和谢富治也到后院来了。谢富治亲自拆封，和叶群他俩一份一份地填入火炉，中间还让我拿铁棍扎了几下，江青是在离火炉十来步远来回踱步。材料烧完以后，他们又回到前院客厅，我弄好炉子回到办公室，记得过了一会儿，江青和谢富治就走了。”

毛家湾的炉火，吞没了使江青脸红心跳的三十年代丑史材料。

她渐渐舒心，脚步也轻快起来。

然而，当她一想起那封落到郑君里手中的信，并没有抄来，不由得又双眉紧锁……

郑君里手中，究竟有什么信，使江青如此坐立不安？

郑君里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我去采访郑君里夫人黄晨，是那样的方便，从我家的阳台上，便可以看见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访她。

她刚从香港回来。国恨家仇，十年风霜，在她的前额刻下深深的皱纹，黑白参半的头发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齿：“这个蓝苹，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审“四人帮”的日子里，亿万观众都曾从电视屏幕上见到过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兰绒上衣，拢了拢头发，非常镇静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铁栏杆围着一张高背木椅，江青穿着一件低领的黑上衣，套着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面打着一个显眼的补丁。她挺直脖子，瞪着眼睛，强装着一副“旗手”的神态。

“蓝苹！”黄晨一见到江青，眼中迸出愤怒的火花，大声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惊，呆住了。自从公审以来，当着法官，当着众多的旁听者，还未曾有过叫她“蓝苹”的。不，不，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敢当面叫她“蓝苹”的了。

江青转过脑袋，视线转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气，说了一句：“阿黄？！”

她确实感到震惊：因为她以为黄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么东西，叫我阿黄？”黄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厉声道：“你逼死我丈夫郑君里，我要控诉！我要揭发！……”

通过电视，黄晨在亿万人民面前，揭发了江青迫害郑君里致死的罪行，揭发了江青策划的

“十·八”抄家案……

黄晨正气凛然，义正词严，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视一切的脑袋。

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记下了江青的这一罪恶：“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郑君里、赵丹、顾而已、童芷苓、陈鲤庭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会各界人士名单中，提及了“著名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他的名字与中国电影紧紧联系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担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员；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编导了轰动中国影坛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了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的《乌鸦与麻雀》；五十年代，他导演了优秀影片《宋景诗》、《林则徐》、《聂耳》；六十年代，他导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诚如袁文殊为郑君里的遗著《画外音》一书写的序言所说，他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广博的理论修养，才华茂盛的电影导演。”

电影演员蓝苹，本是郑君里夫妇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郑君里（二哥）、唐纳（三弟）、赵丹（四弟）因志同道合，曾经结为四兄弟。蓝苹曾是唐纳之妻，跟郑君里夫妇过从甚密。

一九三六年，当三对新人——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时，沈均儒为证婚人，而郑君里为司仪。

黄晨与蓝苹互以“阿黄”、“阿蓝”相称。看到一块合意的料子，一起买来，做成一色的两件衣服，黄晨和蓝苹同时穿了出来。

黄晨还记得，一九五一年，当她出差到北京，住在电影局招待所，江青闻讯，派来了汽车，接她去中南海。那时的江青，穿着一身土蓝布列宁装，还念旧情。江青曾经说，如果她愿意，可以帮助她去苏联学剧场管理……

然而，当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

鲜红的历史，闪光的道路！这种连草稿都不打的牛皮，只能骗骗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细的郑君里夫妇，特别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针毡……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并不是叶群、江腾蛟，却是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一天，郑君里回到家里，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儿。

果真，他告诉黄晨：“今天，张春桥找我谈话。”

事情颇为突然，厂里通知他，到“康办”去一下。

张春桥板着面孔，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里接待他。

在说了一通端正态度、积极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之类话以后，张春桥把话题一转：“我知道，你跟江青同志早就认识，有过交往。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同了。她过去有一些信件之类的东西，还在你家里。这很不妥当。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来，密封，交给我。”

郑君里明白，这是张春桥找他谈话的真正目的，他从张春桥的话中听出，显然是奉江青之命找他——除了江青本人之外，别人不会知道那封信的。

当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在侧。

据梁国斌回忆：

“一九六六年六月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曾对我说，江青现在是主席的夫人了，她有照片、信件在郑君里家，我要找郑君里谈一次，为慎重起见，你也参加一下。我答应了。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时我在场……”

“张春桥对郑君里说，现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

在你家不很妥当，还是交给她处理吧！郑君里完全答应。”

郑君里和黄晨一起在家中翻找，总算找出一包材料，密封，托厂里转给张春桥。

梁国斌回忆道：

“事隔约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对我说，郑君里那里的信件、照片等交出来了，已转交给江青，她当场烧了。”

这么一来，郑君里似乎“太平”了。

不料，过了些日子，张春桥又一次找郑君里谈话。

这一回，张春桥的脸上乌云密布，仿佛马上就要发出闪电和雷鸣。

他不再绕弯了，单刀直入道：“江青同志有一封信在你手中，你为什么不交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来，显然，江青已经看过郑君里上一次交给张春桥的材料。

“那封信，早就不在。”郑君里答道。

“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把信找出来。”张春桥依然不放过他。

郑君里回到家里，忧心忡忡，他早就销毁了那封信，眼下交不出来，而江青又紧追不舍。

黄晨和他翻箱倒柜，郑君里向来很重视保存创作资料，便于写作，他保存了许多三十年代电影书报、剪报。凡是其中涉及蓝苹的，都一一交出。

黄晨还找出了一张四人合影的照片——唐纳、蓝苹、郑君里，她。

她记得，那是在一九三六年，他们在霞飞路（淮海中路）万籁鸣兄弟所开的“万氏照相馆”里拍的。

郑君里见到这张照片，立即放入上交材料中。黄晨虑事比丈夫仔细，只见她拿起剪刀，剪去了唐纳。郑君里会意，赞许地点了点头。因为如果不剪去唐纳，更会招惹麻烦。

再也找不出别的“防扩散材料”了。郑君里深知，这一回的材料仍没有那封信，江青势必不会放过他，于是，郑君里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明信件“没有保存，只是理出几张三十年代的老照片，请你处理吧。”他了解江青的脾气，她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为了避免她的纠缠，他在信中还写道：“运动之后，我们搬到农村去落户，搞搞文化馆的工作……”

虽然郑君里已经退避三舍了，然而，他并没有从江青的记忆中消失，恰恰相反，她已把他视为心腹之患了。

她要借刀杀人，这“刀”便是叶群。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七岁的生日，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使那里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江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离毛泽东只咫尺之遥，挥动着小红书，向红卫兵招手。她深深地被权力的魅力所吸引，所陶醉。

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见到叶群。叶群邀她到毛家湾走走，她答应了。

三天之后，江青出现在毛家湾林彪寓中。

江青和叶群在微笑中，谈成一笔肮脏的交易：“你替我拨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于是，江青说起了郑君里，说起了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一封信。

于是，叶群通过吴法宪，电召江腾蛟火速来京。

于是，十月八日深夜，一伙不速之客，光临上海武康大楼郑君里家中……

据黄晨回忆，在抄家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进出，对我们搜身，叫我们把所有的首长的文字东西都拿出来，把我们的书翻了一地……把君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创作手稿、资料搜刮一空，连我的小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作业的成绩报告单都拿走了。……”

“大抄家后，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就把君里秘密地抓走了。在监狱里，君里同志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仅两年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江青要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一九五八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引者注：《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苟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苟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一九五八年写给郑君里的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写给他信。黄晨还回忆，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和另外一个人。

要说清楚这些信件起因，不能不从头讲起……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二章 真实身世

拨开云雾探真容

行文至此，该表一表本文的主角——江青了。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大抵“锁在云雾中”的缘故，她的本来面目“寻常看不见”。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三十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好在她也有着“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一九七二年跟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维特克写作“江青记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三十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夫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一九三〇年——引者注）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团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

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当她拎着一只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她不过是十九岁的山东姑娘而已。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理，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路易斯女士自述身世。

她，生于山东诸城东关。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淮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启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月旅店。

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小老婆生下的女儿，便是本文的主角——江青。她的乳名叫李进孩（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江青的出生年月，通常说成“一九一四年三月”，这因为江青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填表时这么写的，一九五〇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六十七岁，亦即一九一四年生。本书也依此说法。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一九一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一二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因此，江青可能生于一九一二年。后来，又改口说成一九一四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

江青有个哥哥，名叫李建勋，又叫李干卿，生于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三日。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李云霞。江青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岁。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路易斯女士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薛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薛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江青的母亲离开李德文，确实是在元宵节：那年，诸城淮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有闲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满肚子的气。正在这气头上，江青的母亲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揍她，先打背，后打手，竟打断了她的小手指，痛得她泪如泉涌。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给了江青一巴掌，打掉了她的一颗牙齿。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屏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的母亲出走之后，生活没有着落。她没有文化，只有气力，就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

她把江青寄养在亲戚家。

江青曾记得：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小时候，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

江青曾叹道：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

“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学戏生涯

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张家的二少爷，名唤张少卿，又叫张叔平。此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大十六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

一九二四年，张少卿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一九三〇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的一员干将。

一九三三年七月，张少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LH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二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鼎力相助江青——这是后话。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课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李云鹤小学毕业了。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家。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一九二九年念过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破破烂烂……”

她所说的“艺术学校”，其实就是山东省实验剧院。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她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并非长久之计。

“一九二九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来说，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就在那儿只读了一年……”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侔颇有声望。他是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赵太侔此人颇有来历。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

“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

“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es学舞台图案……”^①

^①梁实秋，《雅舍怀旧——忆故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二五年五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

不久，赵太侔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王泊山为教务主任。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王泊生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籟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陈崇娥，男同学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

顺便提一笔，一九二九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也遭到江青的迫害。

关于江青考入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

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力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王庭树还写下关于江青的印象：

“山东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〇年，西北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京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那年我只有十六岁，在北京吃尽苦头。我的行装简陋得很，甚至连内衣也没有。虽然我拿了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依然冷得发抖，因为被内的棉絮早因年深日久而磨薄了。那个时候的北京，漫天风沙，晚上阴沉沉。那时我还不懂政治，根本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义。我只晓得我要养活自己，我爱话剧。”

李云鹤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

“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

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凑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

“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榘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也许就在这次回去后，她竟跑到青岛去找到赵太侗院长（时赵已任青岛大学校长）。”

赵安置她在校中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当时梁实秋正任青大图书馆馆长。”

就这样，江青离开了北平，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料，那里成了她的人生的转折点……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

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江青曾向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事实上，赵太侔属于国民党的革新派，他在文学方面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接近，我一度曾受资产阶级赏识……”

“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名著选读、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导《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间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青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据江青自述，十七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就在这时，一个物理系的十九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太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南国社在上海公演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名剧《沙乐美》，演女主角的便是俞珊。此后，她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她，轰动了上海，成了名演员。江青朝俞珊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她常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珊那里，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最初的爱侣黄敬

俞启威成了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一九四九年初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为了详细了解俞家身世，笔者几经周折，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访问了俞珊的胞妹俞瑾。当时年近古稀的俞瑾，眉目清秀，个子瘦弱，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身老式的蓝卡其衣服，独居于一幢很普通的宿舍楼。步入她的住屋，墙上竟挂着从一九八五年起的一本本挂历——过时了她也不取下。她说从未有人前来采访。看罢我的介绍信，她陷入了回忆。她谈吐缓慢而清晰，思维很有条理。面对我的录音机，她谈起了她的三哥俞启威……

俞家是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鲁迅的同乡。祖父俞明云（一八六〇——一九一八），字恪士，号弧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甲午中日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云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亦即校长。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云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就是俞明云。俞明云著有《弧庵诗存》四卷。俞明云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

俞明云之妻也是名门闺秀，乃曾国藩的孙女，曾记泽之女。

俞明云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那房子人称“俞庄”。俞家在北京、上海、南京也都置有房产。

俞明云三兄弟，他是长兄。他的小弟弟的长子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傅斯年夫人。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〇年一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

俞明云的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算起来，俞大维是俞启威的堂叔，一个成了国民党政府大官，一个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

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任铁道部技正、陇海铁路局局长。据俞瑾回忆，俞大纯在日本学化学，回国后在南京家中制造炸药，不慎爆炸，幸未受伤。在当时，私制炸药要判杀身之罪，俞大纯赶紧躲往德国，直至几年之后才悄然回来。

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长兄俞启孝出生于北京，后来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

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

老三便是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在兄弟姐妹之中，唯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

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大姐俞珊其实是“老大”，出生于日本，喜爱文艺，成为演员，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导，受到社会的尊重，很多朋友在她父亲面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

小妹便是俞瑾，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如今退休，独自在家看看电视。她说，她看过印着姐姐剧照的画报，也看过姐姐演的戏，觉得姐姐确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

俞瑾记得，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应召而来。

在俞明云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一九三〇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据俞瑾回忆，三哥黄敬（由于他后来以“黄敬”之名传世，下文均以“黄敬”相称）从小就与众不同。他没有“少爷”架子，跟佣人、轿夫们挺讲得来。那时，有一个名叫小亭的佣人专门伺候他，“三少爷”待小亭如同手足。“三少爷”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一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

俞瑾记得，俞家在北京先是住西单劈柴胡同一号，后来迁往阜内大街五十九号鄂家大院。那是一幢豪华住宅，院子里种着海棠树、杏树、牡丹、芍药。暑假里，黄敬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母亲跟人搓麻将，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惊诧不已……

其实，黄敬加入共产党，最初是受大姐俞珊的影响，虽说俞珊并不是中共党员。他随俞珊一起，也参加了南国社。

南国社是田汉创办的。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湖南长沙人，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一二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校长便是徐特立。一九一七年随舅父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改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结为挚友。一九二二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一九二五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戏剧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一九二七年，扩大为“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

五部。南国社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化团体色彩。

黄敬在南国社，结识了演员宗晖。他本名谢伟荣，中共地下党员。在宗晖影响下，黄敬在上海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这位“三少爷”的思想逐渐左倾。

一九三〇年初冬，由于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青岛，黄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翌年暑假，他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

在青岛大学，黄敬和王弢（后来改名王林）同住一屋。这位王弢，便是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

虽说王弢已经注意到黄敬思想左倾，不过，并没有马上发展他加入中共，其原因是黄敬的家庭背景颇为复杂，需要对他进行考察。当时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当时化名李春亭），向王强说过了这样的意见。这样，当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尚不是中共党员。

十九岁的江青加入了中共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几天之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

江青和黄敬，都投入了学生运动。

江青曾这样自述：

“青岛学生请愿，我被大势所激发，对赵太侔老师说：‘我要参加请愿。’他立即反问：‘你也要去捣乱？’我一时答不上来，转身离去，知道他一定因此非常不高兴。……我终于明白他的见解是错误的，便决定参加青岛的左翼演员同盟。”

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在此之前，据云江青有过一次婚姻。徐铸成曾这样写及：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那时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了。有一个山东实验京剧团到北平（那时北京刚改称北平）演出，记得我曾去看过《打金砖》，演的是汉光武的故事。这出戏唱词很多，特别在最后凌烟阁自责一场。主角就是该团的团工王泊生，其他的演员姓名，都没有刊登海报，是否有女角李云鹤登台，我就无从查考了。”

“但李云鹤当时确是该团刚培养出来的小旦，而且当他们回到济南后，不久就由媒的之言，和一个后生结婚了。……大概是因为嫌弃新结婚的小丈夫太‘土头土脑’吧，也许那时自认为是‘江上有青峰’，怕长期隐没在白云之中？总之，这个小女人是逃出了家庭，偷偷到了青岛，投奔赵老师求助。自然，她的学历是不够上大学的，无可奈何，赵太侔给她在该校图书馆安排了一个图书收发员的位置。没多久，她竟和正在山大（引者注：山大，即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曾改名山东大学）读书的赵教授的内侄黄敬，由卿卿我我而正式宣布同居。”^①

^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一九八八年六期。

江青的那位“小丈夫”究竟是谁？徐铸成没有说及。美国罗斯·特里尔所著《江青正传》一书，根据江青当年的老同学、后来在台湾的王庭树的回忆，写及了这一段往事：

“云鹤回到济南，没有人提出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也没有舒适合意的家可归。她当时知道，她缺乏正规高等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她看来，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或阴谋抓得到的东西才会是她的。

“有个姓费^②的青年，是中学毕业生，爱好京戏和地方戏，到艺专去看《湖上惨事》的演出。可巧云鹤那天晚间上场。费君这个济南商人的儿子，被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迷得如醉如痴。费君是个禀性孝顺、务实的人，比云鹤大几岁，人长得很像样。云鹤非常高兴，她在《湖上惨事》里出场，引起了观众当中一个人的激动。她和费君会过几次面。

②此处误译为费，应为裴，即裴明伦。

“艺专一关门，云鹤没有事做，而且手头拮据，因为她在艺专呆了几学期，她和留下的家庭成员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不止一个朋友劝她顺从大势，求得保障：‘不可让金龟跑掉。’这是面临‘好出价’的姑娘的座右铭。一九三〇年底，她和费君结婚，按照社会风俗，去费姓商人家里住下，做一个受拘禁的儿媳妇。……”

“这段姻缘只有几个月，最末几星期家里一团骚乱，喧闹争吵不休。人家闲谈议论，说云鹤懒惰，‘睡觉睡到日上三竿’（大约上午十时）才起，‘像个指使别人去厨房给她端来菜的阔太太’似的在那里坐着。人家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礼教，受不惯家规的约束，总离家跟一伙人聚会或找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能理解她已经不是在舞台，而是处于费家排行最低的新媳妇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①

①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就这样，江青的第一次婚姻告吹，从济南前往青岛。她后来的历史表明，她的每一次婚姻的破裂，总要离开原先居住的城市，跑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番新的生活。

江青跟黄敬的相爱，倒是真心实意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同学张栋材（现在台湾）这么回忆：

“在青岛大学时，李云鹤虽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但靠了和赵太侔的关系，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一多的‘名著选读’，她就坐在我的邻桌。同时我和她的爱人俞启威则共一宿舍，所以对他们两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江青和黄敬志同道合。黄敬虽说读的是物理，却喜爱文艺，在南国社当过演员。他在青岛组织了“海鸥剧社”，江青也参加了。海鸥剧社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除黄敬、江青外，还有王弢、崔鬼、王东升、张福华，王弢为社长。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文艺新闻》，称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是“预报暴风雨的海鸥”。海鸥剧社和上海左翼剧联领导人赵铭彝取得了联系。江青和黄敬结合，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是新潮人物，不拘泥于这些礼仪；另一方面也由于俞家是名门望族，择媳择婿总希望门当户对，江青出身低微，这样的婚事难以得到俞家父母的认可。

江青曾这样谈及自己当时生活的困境：“我每月拿三十块钱薪水。十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很高，除下的二十元不够我开支。……”

中共在青岛大学的活动，受到青岛国民党警察局的密切注意。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弢成了密探追捕的对象。

“到上海去躲一躲，我的家在上海。”黄敬对王弢这般说道。

于是，黄敬秘密地陪伴王弢前往上海。安顿好王弢的生活之后，悄然返回青岛。

黄敬接替了王弢的空缺，担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他是赵太侔的内侄，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党员。

不久，黄敬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年七月，一桩突然发生的事情，使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这是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密探逮捕……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三章 初闯上海

借住在上海田汉家中

匆匆踏上南去的海轮，驶出胶州湾，向上海前进。

头一回坐海轮的江青，没有兴致欣赏大海的景色，她被大海的波涛颠得头昏脑胀，呕吐不已。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向她献殷勤。看出他不怀好意，她更加心绪不宁。

所幸当轮船在黄浦江泊岸时，她左等右盼，终于见到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前来接她。此人名叫史东山，原名匡韶，浙江峡石人。由于家境贫寒，史东山十七岁来到张家口，在电报局当报务员。十九岁起，在上海影戏公司绘制电影背景。这样，他涉足影戏圈。一九二五年，二十三岁的他参加“征文”比赛，以电影剧本《柳絮》中选，不久当上导演。不过，此时他尚属初出茅庐。后来，他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名导演。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据云，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喊来的出租汽车之后，这才记起把一件行李忘在轮船的甲板上了！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田汉的大名，对于江青来说，早已如雷灌耳。田汉是南国社的创始人，跟俞珊、黄敬都熟，跟江青的老师王泊生、吴瑞燕也都很熟。江青所演的《湖上惨事》，编剧便是田汉。

田汉在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他参加发起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担任“左联”常委、“剧联”党团书记。

当江青前往田汉家拜访时，廖沫沙正住在田汉家。廖沫沙本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田汉的同乡，也曾在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三〇年五月加入中共。此时，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文革”中，廖沫沙作为“三家村”中的一家受到江青挞伐，那是后话。刘茵所写《繁星闪耀——记廖沫沙》，内中记述了廖沫沙回忆的江青头一回到田汉家的情景，颇为珍贵。只是文中按晚年的习惯称他为“廖老”，其实他当时不过二十四岁罢了。

三十年代，田汉给艺华电影公司撰写剧本，廖老作为他的助手，住在田汉家。一天，黄敬的姐姐俞珊带来一位女士，说是从北方逃难到上海，请田汉为她找个住处。廖老就这样认识了这位李女士。其实，这位女士早已慕田汉之名，想投奔他的门下，这次找上门来，绝非偶然。她与廖老见面后又说又笑，东拉西扯，呱呱啦啦不停。田汉家房子不多，只得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当时，廖老与田汉住到旅馆里去写剧本，妻子又回湖南去了，他在田家分住的房间空着。有一次，江青见廖老回来取东西，便蹇进房间，大模大样地说：“廖先生，我是第一次来上海，没地方住，你们在旅馆写剧本，你这房间空着，就让我先住你这儿吧。”廖老不便拒绝，只得含糊地回答道：“内人不几天就回上海来，她回来前你先住吧。”后来，廖老与妻子搬到别处，不料江青又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家干扰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廖老夫妇除一间卧室外，只有一间厨房，他们对江青冷淡地说：“那只好住厨房了。”

“我先到另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说完她走了，再未登门。江青对那次廖老没有殷勤欢迎她住下耿耿于怀。一九七二年，她竟然气狠狠地对美国记者维特克追叙了三十九年前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足见其度量之小，为人之阴！田汉、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的知情者，难怪“文革”一开始，她就拿“三家村”“四条汉子”开刀了。

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成千上万次用铅字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一九八九年九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公尺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一九二六年底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九年秋由团转党。一九八四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十五位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十五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一九二八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一九三〇年四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

“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为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

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径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重新入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黄敬前来上海寻找江青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俞启威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径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俞启威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径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于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俞启威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启威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径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

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一九二三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工作。

几个月后——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一九六〇年五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莘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莘”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莘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莘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是这样对维特克说的：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

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十月下旬，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干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闻路培德里一四二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离北新泾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某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覃某，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忆道：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厦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

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①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采访。据合，他本名宋秉全，当时用名家分农。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同志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伪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

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正巴不得有一脱身之处。

黄敬也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黄敬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徐明清的老家，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子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大山脚下。如今，那儿成了牛头山水库。

从上海花了二十多元路费，徐明清带着江青来到这个山青水秀的江南小村，如入仙境。江青那紧张的神神经松弛下来了。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子里的亲友都友好地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然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屋。

这里简直是个“保险箱”。四面环山，只有村前一条路。有谁来了，远远的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事，朝山后的小路上一逃，躲进大山之中，纵有几千人马也难以寻觅。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徐明清便回到家乡，躲过灾难。

江青初来时，天天发低烧，双颊红润。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探亲，他是北平军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徐明清请他为江青看病。他断定江青得了肺癆（即肺结核）。经他诊治，江青低烧渐退，肺癆渐愈。

徐明清的父亲也为江青诊治，徐明清的父亲是老郎中，用中草药为江青治病。很快，江青的病也好了。

小俞不时写信来。从信中得知，黄敬离开上海去北平了，仍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在那个远离十里洋场的江南山村里，江青简直过着疗养生活。空余时，打打毛线衣，如此而已。她的脸色由黄转红，人也变胖

在南坳村住了两个多月，江青想离开临海，上北平找黄敬去。她希望和徐明清一起去上海。

徐明清因母亲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况且春节即将来临（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日），希望在家里再住些日子。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小俞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给了她路费，并一直送她到临海汽车站。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走后一个多月——一九三五年三月，徐明清见母亲恢复健康，离开了临海，前往上海。到了上海，徐明清仍去浦东，在那里主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这时，“剧联”的成员樊伯滋曾向徐明清了解江青到哪里去了，徐明清把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了他。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四章 明星生涯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来上海。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径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

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

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活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籟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咳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籟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籟天和魏鹤龄的鼎力推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①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时的心态：

^①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学识》一卷五期。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娜拉》，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

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当时，她曾说：

“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

“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捉摸着。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崔万秋印象中的蓝苹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薪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记》。”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①

^①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际日报》。

崔万秋从一九四八年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一九五二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一九六四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一九六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②

^②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我笑答：“当然，当然。”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洪深向她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曾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说：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我笑答：“当然，当然。”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诸城。”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启用“皓齿”恭维她。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

户。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二十一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樣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娜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千人，难以出“大名”。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进入电通影业公司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

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公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字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

“‘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〇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

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玉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白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界有名之士。’”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周伯勋、吴涓。蓝苹来到之后，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摄，饰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自从主演话剧《娜拉》一举成名，关于蓝苹的种种报道多了起来。她进入“电通”，成为“影星”，更是记者追逐的对象。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之中，笔者以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连载于《民报》的《蓝苹访问记》，还算比较真切地写出当年二十一岁的蓝苹初入电影界时的形象。现照录原文如下：

蓝苹访问

《民报》记者李成

八月四日，吃好了中饭，搭十七路无轨电车到荆州路下来，向西约摸跑了数十步，那用白漆写在黑篱笆上斗大的“电通影业公司”这几个字已映在我底眼睑里了；虽然酷炎的太阳光芒直射着我，满身如雨般淌着汗珠，但因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处所，所以这却使我有“乐极忘悲”之感，只兴奋地向前迈进。

跨进了大门，门房便站了起来问我找谁，我一边用手巾拭着汗珠，一边告诉他要找蓝苹小姐，但他也只应一声“唉”，却不再问我底姓名就溜烟地向宿舍那里跑进去了。过了一会，门房转出来，站在摄影（棚）底门口，用手在招呼着我，于是我就阔步地跟着他走进了会客室。这时，刚巧有一个青年埋头在弹钢琴，蓝苹小姐很起劲地站在旁边练习嗓子。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条子纺绸旗袍，脚上也只穿一双白帆布鞋，连短统反口的袜子都没有穿而裸着。她底脸上既没有擦一点粉，又没施胭脂，当然口红更是谈不到了。还有她底头发也不像‘娜拉’那样卷烫着，却只在前额上留着几根短发（俗呼‘前留海’），其余都是朝后梳着，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样的妖艳与讨厌，而是好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蓝小姐一听到我底皮鞋声，她把头回了过来一看，就好像“小鸟儿”一般活泼泼地向着我迎面跳过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一边满脸浮现着笑容开口说道：

“今天天气特别来得热。唉，这里还有一点儿风，李先生，请坐吧！”

“是的，今天特别来得热。蓝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来挂在椅背上。

“没有什么，空闲得很，因为司徒慧敏先生这几天生病，所以没有拍戏……”她把头低着，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虽然我自己拼着命吊起来嗓子，但台下较远的观众老是听不清楚，所以我近来每天在练习嗓子。”接着她便谦虚地笑嘻嘻说道：“李先生，请指教！”

这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对于戏剧毫无研究，是门外汉，当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来回答她了。

“那可不敢当。前些时候报纸上批评我底台词念得太快了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时常想矫正过来，事实上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底缺点。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办得到了。”

这时，大家都静默无言地对坐着，凉风不时还可以从窗口送进来。于是我就把自己底话匣打开来：

“蓝小姐府上哪儿？”

“山东济南。”

“府上还有谁？堂上大人都健在吧？”

“只有一个白发年迈的老母，父亲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死了，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小弟弟。此外，还有一个可怜的姐姐和她底两个孩子。”

“蓝小姐今年芳龄……”

“一百岁。”她自己不觉破口大笑起来，接着又反问我：“你猜？”

“……”我摇了摇头答她。

“告诉你吧，老了，已经有二十二岁了（指虚岁——引者注），哦……”长叹了一口气：“真的，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一切都完了，不是快要老了吗？”

“哪里？年轻得很，你是有极大的前途的！蓝小姐，进‘电通’已有多少时候了？”我一边勉励她，一边又问她。

“在公演《娜拉》以前，虽然已经进电通了，但那时还是临时演员，完全是试验性质的。正式签订合同是在公演《娜拉》以后。”她说话底声音很低，在她底心中若有所思似的。

“每月报酬多少？可否告诉我？”

“那有什么不可以？很少，只六十只大洋一个月，我只得住在公司里，就是想节省几个钱。因为家里底生活费还需要我负担呢。每月我总得要寄回去四十元，余下的二十元作为我自己底零用。”说到这里，她把托在额下的两手伸张开来，愁眉不展地硬装着笑容：“家里他们除了我以外，谁都没有收入。我的姐姐因为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所以也和我一样没有什么特长的技能。我想自己以后有机会，总得再多学习一点东西，多读点书。”

“蓝小姐对于各报上关于《娜拉》演出底批评有什么意见没有？”

“他们对于我都太客气了，实际上我有什么，完全是瞎闹的，不过我总觉得‘娜拉’底个性太和我相近了，所以我很喜欢演这个脚色。就是对于‘娜拉’底台词，我从没死读过。告诉你，我还只念过两遍，不知怎地，连我自己也都觉得莫名其妙，竟会很自然地从我底口中背出来。不消说，现在我还都没有忘记会背得出来。至于尤娜女士在自由谈上批评我在骂柯乐克的时候，以及觉悟后对于滔佛底反抗态度还欠凶，这是我不同意的。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已经太凶了。还有她批评我在娜拉出走时候的瞬间的高潮表现得不够，这一点我是接受的。虽然我已是用九牛二虎之力拼命提高嗓子和精神，但这大概是因为我演得时间太久而疲倦了的缘故吧，始终只允许我达到这个地步。”她越说越起劲，但她底态度可脱不了像那“小鸟儿”一般天真烂漫。接着她真的好像娜拉已觉悟后似的由懦弱而转为强力的富于理智的反抗精神，把眉头皱了一下，咬紧着牙齿兴奋地说道：“不过我自始至终相信在高唱‘妇女回到家庭去’的声浪中演出《娜拉》，正如吴湄女士所说的，的确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了；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是的，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子底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底生命为男子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

“蓝小姐近来作何消遣？到上海后看过什么影戏？”

“很少出去，因为钱的关系。到上海后，我只看过瑙玛希拉底《闺怨》，虽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总感不到兴趣。还有茂利斯布佛莱底《风流寡妇》，真的我很喜欢那女主角麦唐纳底态度和表情的活泼。”想了一下：“对啦，我记起了，还有我在北方看过凯丝琳·赫本底《小妇人》，虽然她长得这样丑陋，但我也很喜欢她那副天真烂漫、活龙活现的态度和表情。华雷斯皮莱底《金银岛》，我也看过，但这里他底演技却不见得怎样的高明，不过听说他在《自由万岁》里是演得很成功，因为经济关系买不起票；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哈哈！”突然大笑了起来，“真好笑，这些片子还都是轮映到三等戏院，只花两毛钱才去看的。”

“对于国产片的意见呢？”

“从前在济南的时候，看得很多，什么《火烧红莲寺》、《空谷兰》之类的片子，我也以为很

不差，相当有趣味，当然我那时是不懂什么内容和形式的。现在我只看过《女人》、《渔光曲》、《新女性》、《桃李劫》、《姐妹花》、《重归》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员。在我最喜欢的就是阮玲玉，的确她是很会演戏，而且能够扮的角色很广。她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女演员。还有王人美底那像野猫般的姿态和表情，我也很欢喜。的确，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陆丽霞那样，就觉得做作和扭捏了。至于胡萍和胡蝶她们底经验当然是够丰富，修养工夫也很充足的了，但和我都是无缘的：我不喜欢看她们所演的戏，并且她们底演技看起来也老是停止在这步似的，一年一年都是这样，总看不出有什么进步。哈哈，得啦得啦，不要说了吧，真的，我自己发了疯不是！试问我自己懂得什么？居然批评起人家来了，那不是笑话吗？对不起，李先生，请不要见怪，我是瞎扯的，胡说八道的。”她低着头在沉思着，好像在懊悔说错了话似的觉得有点难为情，两颊上绯红着。

“这有什么关系，各有各的意见，谁都可以自由发表。蓝小姐……”不想她等不到我说完，就抢上来说道：“真的，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得。告诉你吧，那真好玩，就是我拍《自由神》的戏，连自由也都莫名其妙。当初我以为是也像舞台戏一样按照顺序系统地拍下去的，不想是无头无尾地在东拍几个镜头，西拍几个镜头，所以我相信自己这次演出一定是一塌糊涂，失败是必然的，成功可不要说了。不过我也并不因此而灰心，我正在想：假使以后有机会，任何性格的角色，我都得要尝试一下。”

“蓝小姐会跳舞吗？”我问。

她就笑眯眯地把头摇，说道：“不会。不过我到过跳舞场一次，那是朋友硬把我拖进‘大光明’戏院隔壁的那所跳舞场去，但什么名字我可记不起来。因为我最讨厌看见那丧心病狂的舞女舞客，所以我只坐了一会儿就独自一个踱了出来。”

“蓝小姐已经结婚过没有？”

看上去她好像很怕羞似的，低着头笑嘻嘻地说道：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还没等她说完话，我就抢上去问她：

“蓝小姐可否把爱人底名字告诉我？”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女人更应该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底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他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蓝小姐进过什么学校？”

“我因为从小便和母亲寄养在姐姐家里，虽然得到姐夫底帮助曾受过高小教育，但从姐夫去世以后，我也就再没有升学的机会了，所以我也只得在家里自修了。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小说。真的什么书都看过，从《西游记》、《红楼梦》起，到《呐喊》、《羔羊》、《虹》，还有从外面翻译过来的小说，现在叫我背还都背得出来。但在我最坏的地方，就是死也不肯看科学的理论书，以前我曾进过王泊生先生他们主持的山东实验剧院，大约有一年多。”

谈到这里，我就向她告辞出来，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大概已经有五点半钟了。……

这篇《蓝苹访问记》，除了真实地写出二十一岁的蓝苹的生活、处境，还写出了她的泼辣，她的勃勃野心。至于她公然向记者所宣称的：“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这是她的“恋爱信条”。她说这番话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此后，她在上海朝三暮四，闹得沸沸扬扬，便是她的“恋爱信条”的“实践”结果。她“根本反对结婚”，为的就是不受婚约的束缚，朝秦暮楚。她所追求的“事业”是当“大明星”，她把恋爱、同居当成通向“大明星”的梯子……

唐纳其人

初入“电通”，蓝苹并不得意。在《自由神》一片中，她所演的是第七号人物。男女主角是周伯勋和王莹。她，只是配角的配角，在影片中没有多少镜头。

演《娜拉》时，她是第一号主角。如今落得个配角的配角，她心中窝囊。虽然她不过二十一岁，却早已懂得“演员不捧不红”的出名诀窍。

江青开始了她新的恋爱。这一回，江青把她的爱，奉献给在上海电影界颇有影响的影评家唐纳，赢得了他的“捧”。

“蓝苹到上海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华龙路的小公寓里，那公寓的二房东是个罗宋女人，下面是一家罗宋大餐馆。她的吃饭问题，天天在这罗宋餐馆里。她的原籍是山东，到上海的目的是投身银幕。当然罗，一个漂亮的女人，何况她又有各项具备的条件，国语也说得也好，早年在山东国立戏剧学校读过书，舞台经验也颇熟悉。当她踏进了电影界以后，第一个男朋友是唐纳。那时唐纳正为《晨报》的每日电影撰文，于是便大捧蓝苹，蓝苹就在这基础上奠定了她艺术的生命……”^①

①雷雨，《女明星时代的蓝苹》，《海星周报》第二十三期，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

这是当年《海星周报》上《女明星时代的蓝苹》一文中，关于蓝苹同唐纳结合的报道。作者已把话说得很明白：蓝苹爱唐纳，为的是借唐纳之笔作为“天梯”，以便能够爬上“大明星”的宝座。

唐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几乎已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

其实，唐纳并不姓唐。他原名马骥良，后来改名马季良、马继良、马耀华，用过笔名罗平。后来客居巴黎，名唤马绍章。

唐纳跟黄晨同乡，苏州人氏，他跟黄晨、江青同岁，生于一九一四年，属虎，甲寅年。

唐纳之“唐”，据云是由于他的奶妈姓唐。父亲马佩甫是铁路职员，给唐纳取了奶名“仁官”。唐纳四岁时，父亲去世。不久，他过继给大伯父马含蒜。

唐纳在苏州私立树德中学上学时，用的学名是马继宗。

他在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上高中。当时，胡绳（即项志述）、袁水拍（即袁兴楣）也在这所中学求学，比他低一届。这时的唐纳，已开始喜爱文艺，思想也转为左倾。他是学校戏团的主要演员，演过左翼话剧《工场夜景》、《活路》、《SOS》等。^②

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人物》一九八九年三期。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到国民党警察局的大搜捕。唐纳也受到警察注意，不得不从苏州逃往上海，落脚表叔陆尹甫处。经陆尹甫介绍，进入上海大陆银行当练习生。

一九三二年夏，唐纳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依然爱好戏剧，成为学生剧团中的活跃人物。唐纳入圣约翰大学读书，英语流畅，中文文笔也不错。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笔姚苏凤是唐纳同乡，约他写影评。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就为《晨报》写些稿子，从此与电影界结下友谊。影评署笔名“罗平”或“唐纳”。由于影评不断地出现在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专栏里，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他也给《申报》的《电影专刊》、《新闻报》的“艺海”、《中华日报》的“银座”、《大晚报》的“剪影”撰文。

唐纳的影评，文笔流畅，而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颇有见地，在读者中很快就赢得信誉。尤其可贵的是，他思想倾向进步，执笔常赞誉左翼电影，抨击那些精神鸦片。

给人留下颇深印象的是，他参加了反击“软性影片”的论争。

那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现代电影》第六期，发表了《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鼓吹只有“软性影片”才是“观众的需要”，说“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宣称“我们的座右铭是，‘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

左翼电影工作者在夏衍等人领导之下，决定迎头痛击“软性电影论”。反击的第一枪，便是唐纳打响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日，唐纳在《晨报》上发表《太夫人》一文，尖锐地批评了“软性电影”。六月十二日，唐纳又发一文，即《“民族精神”的批判谈软性电影论者及其他》。翌日，夏衍便以笔名“罗浮”发表《软性的硬论》，与之呼应……

这下子，姚苏凤便受到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不得不在六月二十八日登出反驳唐纳、夏衍的长文《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从此，唐纳不再为《晨报》的“每日电影”写影评了。

一九三四年秋，唐纳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这时，“艺华”正在拍摄阳翰生编剧的影片《逃亡》。导演岳枫为了使影片增色，决定配上主题歌和插曲，可是无人作词。正巧唐纳来了，岳枫便请唐纳写词。唐纳居然一口答应下来。

唐纳写了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聂耳与他合作，配上了乐曲，使这两首歌广为流传。现摘录《塞外村女》片段，以飨读者：

暮鸦飞过天色灰，
老爹上城卖粉归，
鹅毛雪片片朝身落，
破棉袄渍透穷人泪。
扑面寒风阵阵吹，
几行飞雁几行泪，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
够缴还租未免祸灾。

唐纳长得一表人材，有如“奶油小生”，居然被电通影业公司的导演袁牧之所看中，要他当演员！

那时候，袁牧之正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找不到合意的男主角。在袁牧之心目中，男主人公李梦华是一个贫穷潦倒而又富于痴情的知识分子；他一见到眉目清秀的唐纳，仿佛是扮演李梦华的“本色演员”。虽说唐纳从未上过银幕，而这一回要领衔主演，他又居然一口应承下来。

于是，一九三五年，唐纳从“艺华”调入“电通”，当起演员，同时主编《电影画报》。

多才多艺的唐纳，演戏也演得不错。在影片中，他神魂颠倒地追求由张新珠饰的女主角张小云。特别是在演出失恋时饮毒酒自杀，简直演得活龙活现！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的《影与戏》，这么形容唐纳：

“提起唐纳，大凡是略微关心一些影坛的人，谁都晓得他是一位很活跃的影评人。他，可以说一个身子，半个站在电影圈里，半个站在电影圈外。”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时报》，曾以《青年作家酷嗜电影》为题，简略地介绍过唐纳身世：

“唐纳现年二十二岁（指虚岁——引者注）。原籍苏州。曾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自幼即嗜电影，且爱好文艺，笔名‘罗平’。为文简洁流畅，颇得一般人之好评。当在圣约翰大学二年级时，即大负声望。影界友好多怂恿其实行入电影界工作，唐亦不能自持，乃于前年秋季入艺华公司担任编剧事务。去岁经袁牧之介绍入电通公司，主演该公司声片（即有声影片——引者注）《都市风光》。初上银幕，即大露头角（时其爱人蓝苹亦在该片中充当重要角色）。唐除在该公司担任演员外，并主编电影画报，工作颇称努力。惟任职不久，电通公司即告歇业。本年六月一日改入明星公司，仍担任编剧职务。”

唐纳颇“帅”，一表人材，又多才多艺，时而影评，时而编剧，时而演员，何况在圣约翰大学

学的是英语，能著能译，是一位“评、编、演、著、译”的全才。

不过，唐纳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影评。他是《晨报》影评专栏的主要评论家，与《申报》的石凌鹤旗鼓相当，人称“影评二雄”。

除了以《晨报》为“据点”之外，唐纳还涉足《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时报》等影评专栏。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唐纳的评论对于影片、对于演员的影响：“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如斧钺。”

唐纳的为人单纯、热忱，但性格有点如同吴语一般软绵绵的。他思想倾向进步，活动于左翼电影界人士圈子之中。

从三十年代迄今，人们向来以为唐纳即马骥良，马骥良即唐纳。

其实不然！唐纳是两人合用的笔名。另一人是谁？

当我得悉唐纳挚友夏其言在沪工作，便于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前往拜访。

炎夏酷暑，柏油马路都有点酥软了，我叩响一幢小楼的房门。我以为，倘若夏老不去黄山、青岛避暑的话，定然在家午睡。

出乎我的意料，夏师母告知，夏老上班去了！他和唐纳同岁，也属虎，已是七十有二了，照样天天去报社上班，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

几次打电话跟夏者约时间，他不是接待外宾，便忙于业务。总算他有了空余，与他得以长谈。除了听觉差一点之外，夏老身体甚健，记忆清晰。他谈及了世人莫知的奥秘；唐纳乃马骥良与余其越合用的笔名！

余其越，我从未听说过的陌生姓名，究竟何许人也？

夏其言如此深知唐纳身世，说来纯属偶然：夏其言高中毕业之后，正值刘鸿生开办的中国企业银行招收练习生。夏其言考上了。跟他一起考上的，有个青年名叫马骥善，意气相投，遂结为好友。

马骥善之兄，即马骥良。马骥良常到银行宿舍看望弟弟，跟夏其言结识了。夏其言也随着马骥善喊马骥良为“大哥”，虽然他跟马骥良同龄。

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 Y”，亦即共青团。夏其言呢？正追求进步，悄悄地在读马列著作。正因为这样，他跟马骥良相见恨晚，非常投机。

一天，马骥良神秘地对夏其言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很有学问，可以教你懂得许多革命道理。不过……”

说到这里，戛然而止，马骥良用双眼看着夏其言。

夏其言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说道：“我不怕风险。”

马骥良这才轻声地说：“他没地方落脚，你敢不敢收容他？”

夏其言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几天，上海长乐路拾安坊，多了一位青年“房客”。

正巧，这位青年也属虎，跟马骥良、夏其言同庚。

怡安坊离“十三层楼”不过咫尺之遥。“十三层楼”，即如今的锦江饭店。夏其言的父亲，在那里掌厨。他家住石库门房子，独门进出。

那青年“房客”跟夏其言住一间小屋。此人足不出户，终日闭门幽居，邻居从不知马家有“房客”。所谓“房客”，只不过夏其言对父母的遮掩之词罢了。

“房客”叫小琳，常用的笔名为史枚，真名余其越。此人跟马骥良同乡、同学，总角之交。

（总角之交，即少年朋友。总角，少时所梳之小髻也。）

余其越乃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杨树浦活动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往苏州反省院。

那时，苏州反省院有所谓“假释放”制度：如果有两家铺保，“犯人”可以“假释放”两个月，届时自回反省院，仍旧关押。“假释放”的本意，是让“犯人”体验一下“自由”是何等舒坦，以促使“犯人”早日“反省”。

然而，余其越却趁“假释放”之际出逃了！

余其越请马骥良帮忙。神不知，鬼不晓，他隐居在夏其言家里。国民党警察局急得跳脚，也不会查到夏家，因为在此之前，余其越跟夏家毫无瓜葛。

余其越擅长写作。在隐居，写了不少文章，署名唐纳，由马骥良送出去发表。马骥良自己写的文章，也署名唐纳。于是，唐纳成了余其越和马骥良合用的笔名。

马骥良本来以“罗平”为笔名。常用“唐纳”之后，渐渐地，人们以“唐纳”相称；以致后来变成“唐纳=马骥良”。

余其越跟夏其言朝夕相处，教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他走上革命之路。在余其越的影响下，夏其言于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余其越隐居夏家，唯一的常客是马骥良，以下该称之为“唐纳”了，以适合广大读者的习惯。至于余其越，以下该改称为“史枚”，因为他的真名已被伪警察局记录在案，他改名史枚。

当唐纳跟蓝苹相爱之后，蓝苹也成为夏家的常客。

唐纳、蓝苹、史枚、夏其言是同龄人，然而，不约而同以史枚为长。因为他是“C. P”（共产党），而且学者风度，老成持重，唐纳、夏其言尊敬他理所当然，蓝苹在他面前也颇恭敬。就连她跟唐纳吵了架，也常常要到信安坊来，在史枚面前告状——此是后话……

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

追溯起来，在蓝苹主演话剧《娜拉》时，唐纳便和她相识。那时，唐纳在业余剧人协会负责宣传工作。不过，他们只是相识而已。

关于他们如何由相识发展到相爱，后来客居法国巴黎的唐纳，曾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泽东传》作者R·特里尔谈及。

特里尔如此记述：

他说，他迷上蓝苹，是从金城大戏院看她主演《娜拉》时开始。他发现了她坚强的、激动的、性感的魅力。和她会面，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闷热的晚上，唐纳步行到电通影业公司去，他兼任公司出版的杂志（引者注：即《电通画报》）编辑。霞飞路（引者注：今淮海中路）上挤满了散步者、卖吃食者、互相搂抱的情侣、叫花子等各色各样的人。在那里，唐纳看见蓝苹在霓虹灯下，穿着蓝色绸旗袍，板着刘海头发，拖着改组派的脚步走过来。这是她儿童时期缠足的遗产，是无可救药的。

蓝苹认出他是唐纳，唐纳也知道她是何人。两人都踌躇了一下。唐纳裂嘴微笑，好像一只活泼的猫，蓝苹伸出了她的手。唐纳说，他非常钦佩她演的娜拉；蓝苹说，她久仰他的文名。她对这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左翼文化人，突然讲出一句：“我是革命党人。”对于这位奇异的、武断的、言不择时的女子，唐纳觉得她了不起，对她更加迷恋。

“这事使我非常兴奋。”唐纳回忆当时的情形。“这位从山东来的，富于诱惑力的新进女演员，在霞飞路上，对我宣称她是革命党人。”

也许因为唐纳写的影评左翼色彩很浓，蓝苹误以为他是同志，故初次见面，在霞飞大路上竟唐突地说出自己是革命党人。其实，唐纳和共产党毫无关系；虽然承认他自己左倾。（如前所述，唐纳那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蓝苹到电通影业公司访问唐纳。这时期她是自由的。自从和俞启威分手后，她未和男人同居。她仍然漂流在上海的人海中，她积极地接近唐纳，她的新鲜、活泼的态度，使唐纳陷入情网。

唐纳回忆当年的印象说：

“纵然在上海，像她那样大胆，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胆小怕生的中国女孩。她不是你通常所见的羞答答的中国女孩。主动地和男人谈话，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径，一如男性。啊，她是勇敢的女性。”

当蓝苹、唐纳相继进入“电通”，特别是同在《都市风光》剧组，朝夕相处，由相识而相爱了。

当年的《电影新闻》，这样报道了唐纳跟蓝苹结合的情形：

在电通影业公司，“有一天，有人亲眼看见蓝苹挽了唐纳的手臂，肩并肩的出去，剩下的睁大了眼珠对他们看。”

“当天晚上，他俩没有回来。第二晚，也没有回来……”

“直到第三天下午的六时许，才见唐纳与蓝苹，仍旧手挽手，肩并肩，满面春风的回来。”

“他们一回到公司，就往经理室而去。到晚饭的时分，才和经理马先生回到膳厅。饭吃到一半，马先生立了起来，对大众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女士因意见相投，互相了解，而将实行同居。’说完后，轰雷似的一声，都围住了二人，一半祝贺，一半要他们报告同居前的过程。这一晚的晚饭，就在这样纷乱喧嚣中过去。”

这是一九三五年秋在拍摄《都市风光》的时候。

《都市风光》的编导为袁牧之，摄影师为吴印咸，音乐为吕骥、贺绿汀、黄自。影片中穿插的一段动画，由著名的万氏兄弟设计，即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万涤寰。

这部影片属音乐喜剧片，通过几个公民的眼睛，从西洋镜里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唐纳主演，饰无聊的知识分子李梦华，蓝苹演配角。

就在蓝苹和唐纳同居不久，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的《娱乐周报》上，已有人指责蓝苹的行为了：

“据该公司有人云，蓝苹已经不是一位未嫁的小姐了。在北平，她早已有了丈夫了。如果此事属实，不是要闹出一场醋海潮了吗？好在他们不过是同居而不是结婚，否则蓝苹不是要犯了重婚罪？”①

①三友，《蓝苹与唐纳同居，在北京的丈夫怎么表示》，《娱乐周报》一卷二十三期。

怪不得，蓝苹早就公开声明“反对结婚”！

然而，就在蓝苹和唐纳同居了半年多之后，忽然上海许多报纸刊登消息：蓝苹和唐纳要结婚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半，杭州钱塘江畔，八辆黄包车透迤而来，奔向六和塔。为首的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风度潇洒、西装革履的青年；最末押阵的车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长髯飘拂、礼帽长袍的长者；中间六辆黄包车，三男三女，喜气洋洋。

那青年即郑君里，长者为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三对男女乃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

三对男女朝六和塔进发，为的是在那里举行婚礼。郑君里负司仪之责，手中拿着照相机，兼任摄影师。沈钧儒为上海著名大律师，证婚人也。

到达六和塔前，最忙碌的是郑君里。他让证婚人居中，三对夫妇列于两侧，接连拍了许多照片。

三对夫妇为什么远道从上海至此举行婚礼？

这是“秀才”唐纳的主意：六和塔又名六合塔，高高矗立于月轮山上。唐纳取其“六和”、“六合”之意，建议六人来此举行集体婚礼，当即一致通过。

文人雅士如此奇特的“旅行结婚”，顿时传为新闻，纷纷刊登消息及塔前婚礼照片。

沈钧儒诗兴勃发，于塔前口占一首：

情侣浪游在沪杭，

六和塔下影成双。

瑰丽清幽游人醉，

沉酣风波会自伤。

拾级蜿蜒登高塔，

居高一览钱塘江！

老先生吟罢，诗兴未尽，又作一首：

人生何处是仙乡，
嘉偶良朋一举觞。
到此应无凡鸟想，
湖山有福住鸳鸯。
塔影湖声共证盟，
英雄儿女此时情。
愿书片语为君祝，
山样同坚海样深。

几天之后——五月五日，晚八点，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餐室，又一度成了新闻中心。三对新人在此招待亲友。

新郎一律西装，新娘一律旗袍。“蓝苹的身上是一件新的白地方格的灯笼袖旗袍。小叶蓝地红花的旗袍。小杜是白地红花的旗袍。”

影星汇聚，连“电影皇后”胡蝶也到会祝贺，吸引了众多的记者。

在掌声中，人们要新娘蓝苹当众发表感想。

蓝苹只说了三个字：“很快活！”

晚会在《六和婚礼贺曲》声中结束。

这贺曲由孙师毅作词、吕骥谱曲：

假情郎，
伴新娘，
六和塔下影成双；
决胜在情场，
莫忘胡虏到长江。
喝喜酒，
闹洞房，
五月潮高势正扬，
共起赴沙场，
同拯中华复沈阳。

次日，上海各报又纷纷刊登消息，有的甚至用半版篇幅详加报道。

向来关心报纸的唐纳，读着大报、小报，秀气的脸上漾着微笑。

他的笑，只有他知，蓝苹知：他真诚地爱着蓝苹。在蓝苹之前，虽说他也曾追求过别的姑娘，但那只是追求、恋爱而已，并无其他。正因为真心实意地爱着蓝苹，所以他不愿只是同居。一而再，再而三，他向蓝苹提出要求结婚。然而，遭到了蓝苹的坚决反对。她，不愿意结婚……当他得知好友赵丹、顾而已都有了心上人，提出了“六和塔婚礼”的建议。赵丹、叶露茜、顾而已、杜小鹏、唐纳，已经五票通过。迫于孤立，蓝苹只得点头——唐纳还编造了一条理由，一旦正式结婚，他可以向苏州老家索一笔钱。

然而，蓝苹只是答应举行婚礼，却绝不签署婚书。

唐纳无奈，依了蓝苹。

这样，在三对新婚夫妇之中，唯独唐纳、蓝苹是没有婚书的！

唐纳是笔杆子，跟各报社广有联系。他煞费苦心，广请记者。“六和塔婚礼”在那么多报纸上登了报道，唐纳出了大力。

唐纳得意地翻阅着大报小报，用剪刀一篇篇剪下婚礼报道，精心地贴成一本。

他想，这些婚礼报道，不就是印在报纸上的“婚书”！成千上万的读者都知道蓝苹跟唐纳结婚了，这比“婚书”的威力还大——难道你蓝苹能够撕掉这些印在报上的“婚书”？！

唐纳笑了！

可是，唐纳笑得太早了！

婚变使唐纳在济南自杀

六和塔婚礼结束后，蓝苹和唐纳相处尚可。蓝苹曾随唐纳回他苏州老家住了半个月。那时，蓝苹跟唐纳的生母、嗣母相处，也还算可以。

可是，回到上海环龙路住所之后，蓝苹就不时和唐纳发生口角了。

口角迅速升级，以至酿成轰动上海的“唐蓝婚变”新闻……

那是“六和塔婚礼”整整两个月后——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晚八时，蒸汽机车冒着黑烟、喷着水汽，疲惫地拖着长长的“平沪快车”（那时北京称北平），驶进济南站。

从车上下来一个疲惫的男人，他的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梳，个子修长，一身西装。他的手中除了一只手提包之外，别无他物。

下车之后，他雇了一辆黄包车。

“先生，上哪家旅馆？”

“不上旅馆，到按察司街二十七号。”

彤云密布，下起淅淅沥沥的冷雨，衣衫单薄的他在黄包车上打了个寒噤。

黄包车刚刚在按察司街二十七号前停下，他就急急跳下了车，砰砰连连敲门。

门开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出现在门口。

“请问，蓝苹小姐在吗？”

“先生贵姓？”

“我是阿仁！”

“喔，妹夫，快请进！”

来者阿仁，便是唐纳。阿仁是他的小名。

这儿是蓝苹的家。唐纳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岳母、姐姐，他什么礼品也没有带——他是在极度仓促、惶恐之中跳上“平沪快车”，赵丹和郑君里送他上车……

“云鹤不在家！”蓝苹的母亲、姐姐，这样答复专程赶来的唐纳。

“她上哪儿去了？”

“她不在济南！”

“不在济南？她在哪儿？”

“她没说，俺不知道！”

“不知道？她走了多少天了？”

“十几天了！”

当唐纳不得不告辞的时候，雨更大了。黄包车早走了——车夫以为已经送他到家。

冰凉的雨点，打在他消瘦、白皙的脸上，他反而觉得舒坦一些，清醒一些。

雨水和夺眶而出的泪水，混在一起。

他浑身湿漉漉的，走进商埠三马路济南宾馆。

茶房赶紧让他住进楼下五号房。

很快地，茶房发现这位先生有点异样：茶房把一盆热水端来，放在他面前，他竟然双眼发直，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雨，通宵下着。五号房的灯，通宵亮着，从敞开的窗口望进去，茶房发现，那位上海来客在灯下写信，一边写，一边不时抹去脸颊上的热泪……

翌日，那上海房客一早就出去了……

大清早，唐纳敲开了蓝苹家的门。

蓝苹真的不在家！

尽管蓝苹的母亲、姐姐已经再三说明蓝苹不在济南，痴心的他还是不信。中午、下午，他又

去敲按察司街二十七号的门，依然不见蓝苹的影子……

他快地独自踟躕于济南街头。

忽然，他记起那部他跟蓝苹一起演出的影片《都市风光》。在影片中，他饰李梦华，追求小押店主的女儿张小云，失恋后喝下一杯又一杯药酒自杀……

他不由得步入药店，买了一磅消毒用的酒精。他又买了好几盒红头火柴。

晚上，他脸色惨白回到济南宾馆，就连茶房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也毫无反应。

茶房见他神色不对，特别留意起来。

晚八时许，茶房见他歪倒在地，桌上撒着没有药头的火柴杆——他喝下了那一磅消毒酒精和吃下许多红色火柴头，已不省人事。

茶房喊来了黄包车，把唐纳送往小纬二路万达医院急救。

吴启宥大夫赶紧给唐纳注射解磷剂。

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吴大夫通宵守在唐纳床边，三次注射解磷剂……

茶房在唐纳的房间里，找到一封遗书。那是他昨夜含泪写成的。

人们读着唐纳这封“二十六日夜远处传来鸚鵡啼声和着雨声时”于济南宾馆写给蓝苹的信，才知道他因遭蓝苹的遗弃而自杀。

摘录唐纳遗书如下——

阿苹，我最亲爱的：

想不到你竟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匆！

带着万分之一的侥幸，“也许还没走”的希望，我跨上了车，整整二十八个小时，过去一切甜蜜盘踞了我的脑海——在电通，我们初恋的时候，我写过“你再不睡就对不起我”的留条；在倍开尔路（今惠民路——引者注），我们有过通宵的长谈，在街头漫步，一直到深夜二时，我才陪你绕过一条黑黑的弄堂送你门口；在麦克利路（今临潼路——引者注），因为要看画报的校样，隆冬的夜未央，我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你给我披衣穿袜的一种说不出的怜惜；在南洋路（今南阳路——引者注），外面下着大雪，没有木柴，我和你用一大叠报纸生起火，当你病得最厉害的那夜，屋里一点水也没有，你的“给我水呀，我要喝水呀”的可怜的哀求；在福民医院里，你一定要我休息一下，睡在你满身痛创的身旁；在临到苏州去的前几天，你伤心的流着泪，说只有你的妈妈不欺骗你。我当时痛苦得哭泣了。你就立刻向我道歉：“我说错了，纳，我下次不了！”在苏州，我生着气，想回申的时候，你就流着眼泪，婉转的叫住了我；我从南京回来，你是那样紧搂着我。阿苹，呵，想不到这些竟成了我的心底最锐利的尖！临走的时候，你说要买山东绸给我做衬衫，你还指指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引者注）橱窗里陈列的拉领衫，要我买几件去游泳时穿，你还说过苏州时要买批把回来，你还说要送我一个表。在你领到薪水以后，你告诉我顶多一个月就回来。快到一星期，你来信还说十号左右回来。后来又说明因为天太热，等下了雨来。阿苹，一个月来，我几乎无日不望着你会有意不告诉我日子，要使我惊喜你突然的归来。阿苹，深夜梦回的时候，我揣想你这时也许在辗转反侧。清晨街上小女孩的叫唤，我以为是你回来了，在窗下叫我。你上次从苏州突然赶来时不也是出乎我意外地这样在窗下叫我吗？记得你那次来，我是怎样的惊喜，怎样的快慰。你说，我好像永远绕在你身旁哭，阿苹，你这个时候想像我是在怎样地痛苦！一个月来我希望你的回来，比希望中头奖要超过不知多少倍。在公司里，茶房叫我听电话，我希望这是你打给我的。有时我望着天，看着远远的北方，有云堆在那里，我希望这时济南正在下雨，你在整理行装，预备回来了。有时我从公司里出来，我想这时你正在屋里等我，我偏跑东跑西地到朋友处闲谈，想使你也多些等人的痛苦。我回家的时候，望着屋里的灯光，我猜想你一定正在和之静他们畅叙到后，我推！I 的时候还存着这样的希望，然而照例是给我一个失望。自然，我想这些小失望将来总有偿付的一天，我打算在你回来的时候，拧你的小嘴，重打你的手心，呵你痒，要你讨饶。但是阿苹，现在呢？‘这一个月来的希望是被击得这样的粉碎！……

从你回家（指回济南——引者注）后，一方面想减少寂寞的痛苦，一方面想在回来时夸耀，我是尽了我的负重，我写好了三个剧本，筹备了一个公演，还有很多。朋友们说这时我正可玩玩，没有人管，可是我没

93有。这一点是对得起你也对得起我自己的。

我想丢了家，丢了名誉地位和所爱好的电影事业，追随你去……但是已经迟了，你姐姐告诉我已经走了十多天了。

我本想努力找到你，但是苍海茫茫，我上哪儿去找？

沦落异乡客邸，雨，老是在铅皮上滴着，现在只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现在谁是真正爱我的人？谁能再真正爱我像你一样？

我死，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可也没什么害处，我再能作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我死了，我相信只有使你更发奋，更奋力，因为可以常常使你遐想，常常使你追怀的人，现在，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别的遗憾，只是没有见到你最后的一面和那两个圆圆的笑窝！

王泊生使蓝苹大失所望

唐纳自杀于济南，消息传出，轰动了京、沪、鲁的报刊。

众多的读者异常震惊：这位“六和塔婚礼”的筹划者，为什么在婚礼后的第六十天就要自寻短见？

其实，就在《六和塔婚礼贺曲》迴响耳际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人们通常称为“蜜月”的时候，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他们婚后的住所，已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了。

唐纳和蓝苹在争吵的时候，常常到长乐路信安坊，各自在史枚面前，夫说夫有理，妻说妻有理。史枚在他俩心目中却如同长兄，史枚毕竟是地下党员。

蓝苹跟唐纳吵架，其中的主要原因，据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娱乐周报》，蓝苹说得颇为冠冕堂皇：“自己在上海，度着跑跑舞场、吃吃咖啡的颓废生活，感到环境移人，意志消沉。所以。离沪北去，参加救国运动的工作……”

蓝苹的“台词”，比唱还好听。

电通影业公司在拍完《都市风光》之后，支持不下去了。唐纳于六月一日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在编剧股当秘书。蓝苹则与明星影片公司签署了合同，准备在《王老五》一片中饰王老五之妻。

就在从“电通”转往“明星”的时候，蓝苹忽然说母亲生病，要去济南探视。

五月底，唐纳在上海车站送蓝苹上车。

火车徐徐启动之际，唐纳挥动双手，滚下热泪。他的耳边，响着蓝苹的声音：“不要难过，六月十日我就回来！”

不料，蓝苹一去不复归。任凭唐纳等得心焦性急，一封一封长信催她，一连寄去十几封信，她却不理不睬……

蓝苹究竟在济南干什么？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辛报》所载张牛的“济南特约通讯”《蓝苹和王泊生》，披露了蓝苹在济南的若干情况：

“一个朋友告诉我，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以前实验剧院的同人名义，临时凑合举行三个独幕剧的联合公演了。”

“实验剧院解散后，所有人员你东我西，很少有大家齐聚在一块儿的机会。不想这会也巧，因蓝苹（李云鹤）的回家探母，王泊生忽然兴起，经过好几天的‘热炒热卖’，就凑合着演出了。”

“这次联合公演的消息，是很诧异的。在事实上说，也许是很勉强的。因为曾经骂话剧不是艺术的王泊生，也会在《婴儿杀害》里扮演了一个卖破烂货的，这不是很使人惊异的吗？”

“公演日期，是本月七日。卖座的纪录，打破了历次公演的盛况。这也许是蓝苹的魔力吧，王泊生一定要破涕为笑了，当场就挂出了牌说‘十号晚再演一场’。和我同去的朋友说：‘王泊生卖了蓝苹了。’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公演的节目是菊池宽的《父归》，朱春舫的《一副喜神》，还有山本有三的《婴儿杀害》，由李一非、吴瑞燕、王泊生分别导演。蓝苹在《父归》里饰女儿，演得比别人好。在《婴儿杀害》里饰女工，也很卖力气。”

“值得附笔的，是在公演前，近蓝苹的人问起她：‘畸说你和唐纳结婚了，生活上觉得怎样？’她很爽快的回答：‘那不过是开玩笑而已。’问的人当时一愣，想：怎么女明星也拿同居马马虎虎的呢？玩笑是随时随地随便可以开的，大概蓝苹女士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吧。”

原来，在蓝苹看来，“六和塔婚礼”，“那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然而，唐纳在上海，却翘首以待，一片深情在等待她的归来。

《大光明周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蓝苹在济南演出的内幕：

蓝苹“与唐纳的事发生之后，回济南去住了一个相当时期。因为生活有问题，曾向王泊生借尸还阳的‘山东省立剧院’接洽以演剧补助。可是王泊生是个著名的吝啬鬼，不念师生之谊，也不对她刮目相看。三天戏的代价，只送给她廿元。在上海已经变了红的蓝苹哪里还会将这区区之数看在眼里呢！她一怒而加以拒收……”

蓝苹本以为，这次演出，她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钱。结果，大失所望。此后，蓝苹在济南销踪匿迹。

就在报上连接登出王卓所摄蓝苹在济南历下亭含笑伸腰、在大明湖畔依树凝思之类照片之际，蓝苹女士早已不知所往……

她想以“得脑膜炎死了”赖帐

六月二十三日，唐纳正在上海环龙路家中，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以为是蓝苹南归，唐纳喜出望外，赶紧开门。

门口站着的是二哥郑君里。前额沁着豆大的汗珠，手中拿着一封信。

刚一进屋，郑君里就对唐纳说：“三弟，蓝苹托我转给你一封信，你赶紧看一下……”

蓝苹托郑君里转这封信，她大抵已经充分估计到这封信的“威力”——唐纳读了信，照他的脾气，一定会跳脚，会发疯，会跳楼……郑君里在旁，会劝住他的。

蓝苹声称“说不定这是我最后一封信”，正因为这样，读着这封信，唐纳的脸色由红转灰，由灰转白。

蓝苹的信，是这样写的——

纳！当你看到这封信，为了我走起来顺利起见，筹划好久的这件事，迟迟到今天才告诉你，我想你是明了我的苦衷的。

自从我跑进影图，言行不一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了。我苦恼，我绝望，我想毁自己，可是我遇到了你，你使我暂时消灭了我所有的苦恼，但是更深的矛盾却也在这里生了根。我不愿林黛玉式的忧愤死，我知道怎样使得我言行一致，我更知道怎样使我自己死得有价值些，因此我决绝的离开你，还有那个大的诱惑——风头、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在我计划回家的那几天里，我竭力企图和你过几天快活日子，可是你那几天的脾气却特别的坏。有时你非让我下不来，而且使我非常伤心。虽然在搬家时候，我忍不住和你闹过几次，可是过后我马上懊悔了，懊悔得想痛哭。我曾经在雨地里走了很久很久，那种悲哀是说不出的。我想我和你分别，我想起你所说的——我是固执的爱着你；我想起南洋路——这些使得我心跳，像是跳在咽喉里似的一样闷塞；浑身剧烈的抖着，一步都走不动了。后来叫车到阿丹（即赵丹——引者注）家去的，这个是我永远不能忘掉的。

其实呢，你那些天的坏脾气给了我很大的便利，现在想起来真是应该感谢那个坏脾气。不然，我也许永远永远沉埋在那环境里了……

我呢，爱事业是超过爱人，这个我是坦白的告诉过你了，所以牧之（即袁牧之——引者注）的话是对的。“要是你们两个没有一个屈服，将来一定是个悲剧。”

XXXX 缺少教员，请了很多朋友去，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人家差不多已经走光了，只有我，还有点犹豫的我，迟迟在现在才走。纳，不要悲伤吧。在将来的新生活里，我们这种矛盾会自然而然消失的。

说不定这是我最后一封信……

关于我这次的走，你也许会说我太自私，但是我的话是早讲在头里了。在你初恋我的时候，我曾经警告过你，爱我是痛苦的。你却说你愿忍受这个痛苦。接着我还说过，如果在必要的时候离开了你，可别恨我呀。你说，不会的。纳！想来不至于忘了吧。就结婚，我也曾说过于你，是不利的，却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经济，逼我们走上这条路。为了应付你的社会关系起见，我不能不想一个法子补救。想了又想：是有一个法子，就是说我死了。这样，又可以应付你周围，说是于我以后的生活，也不无补益。纳！反正我是离开这个环境了，就算死了吧。希望你不要骂我做事走绝路。我认为一个人必须走一条路，同时也应该绝了所有的路，免得犹豫和退却！

和你这信，同时发许多消息，说我得脑膜炎死了。关于我的没有死，只有你和君里知道。希望你让他保守秘密。我相信他是可以做到的……

上海银行债，我相信我宣布死了，是不会累在你身上的。我想赖了！

读罢蓝苹的信，唐纳的冷汗浸湿了上衣，冰凉地贴在脊梁骨上。

唐纳这才明白，怪不得蓝苹早就口口声声说过：“爱我是痛苦的！”

她真是想得到，做得出，想用“得脑膜炎死了”，赖掉她在上海的欠债！

郑君里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唐纳的一举一动。

久久地，唐纳用双手捧着脑袋，心痛如绞。须知，就在刚才，他还写了一首思念蓝苹的诗呢！唐纳抓起桌上的诗笺，一把扯得粉碎。

他霍地站了起来，对郑君里道：“二哥，事不宜迟，我要火速赶往济南，抢在她出走之前！”

“行，我马上给你去买火车票，你收拾一下。”郑君里也站了起来，说道：“我顺便把这消息告诉四弟。”

郑君里说的“四弟”，也就是赵丹。

六月二十五日，郑君里和赵丹一起送唐纳上火车。他俩千叮万嘱唐纳：“到济南看一下，马上就回来。明星公司有好多事等着你呢！”

“旗手”的心病所在

“蓝苹死于脑膜炎”的消息尚未见报，而“影星唐纳自杀”的消息却各报竟载了。就连南京的《中央日报》也刊登了《轰动济南之唐纳自杀事件》。

唐纳总算“不幸中之大幸”：由于茶房发现得早，大夫抢救及时，在二十八日晨八时终于清醒，脱离危险。

第一个赶到万达医院看望唐纳的，是文友马吉峰。马吉峰的笔名为马峰，曾与张春桥一起在济南的《国民日报》编副刊《燕语》，也曾与张春桥一起创办“华蒂社”。唐纳在文坛交游甚广，跟马吉峰有点文字之交。

上午十一时，经吴启宪大夫检查，以为唐纳已无危险，可以出院。马吉峰当即喊来黄包车，拉着唐纳前往纬三路东鲁中学宿舍马家歇息。

唐纳异常怠倦。午饭后，倒头便睡。正在酣梦之中，忽听见蓝苹之声。

唐纳一惊，霍然坐起，睁眼一看，站在床前的并非蓝苹，却是蓝苹之姐。

原来，趁唐纳午睡，马吉峰跑到蓝苹家，把唐纳自杀的消息告诉蓝苹的母亲和姐姐。她们大吃一惊。

蓝苹的姐姐赶紧拎着一篓苹果，跟随马吉峰风风火火来到东鲁中学。

“唐先生，妹子实在对不起你！”蓝苹的姐姐再三向唐纳道歉。

“只要你能把你的妹妹叫回来，我就什么也不计较了！”唐纳说道。

直到这时，蓝苹的姐姐才说：“唐先生，如果你能原谅我的妹妹，我愿照实相告……”

唐纳非常诚恳地说：“如果我不原谅她，我就不会到济南来了——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接她回上海，我们重新团圆……”

蓝苹的姐姐看着在一旁陪坐的马吉峰，犹犹豫豫，欲言又止。

马吉峰看出不便，就借口给唐纳冲牛奶，走开了。

直到这时，蓝苹的姐姐才在唐纳耳边，说出实情：蓝苹到天津找小俞去了！

如五雷轰顶，唐纳顿时呆若木鸡，半晌讲不出一句话来！

哦，怪不得，蓝苹早就把话“讲在头里了”：“如果在必要的时候离开了你，可别恨我呀！”

哦，怪不得，蓝苹只愿跟他同居，不愿正式结婚！

唐纳在跟蓝苹初恋时，蓝苹从未讲起过自己的婚姻历史。直到同居之后，唐纳才从当年蓝苹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事那里听说起小俞……

幸亏蓝苹的姐姐一再说，她马上打电报到天津，要蓝苹火速回济南，唐纳这才宽心了点。

他连连催道：“你快去打电报！”

蓝苹的姐姐起身告辞。

她走后，唐纳的心中充满愤恨之情。他这才发觉，自己一片痴情，受人欺骗，受人愚弄！

他奋笔疾书，给二哥郑君里写了一封长信，向他痛诉蓝苹之狡诈、虚伪，济南之行的可悲、可叹……信中说出了蓝苹出走的真正原因，说出了她究竟躲到何方。

正是这封信，后来成为“旗手”的一块心病。“十·八”抄家，以郑君里家为真正目标，就是要抄查这封信。张春桥受“旗手”之托，几次三番要郑君里交出来的，也正是这封信。因为

“旗手”曾听唐纳说起，给郑君里写过如此这般的一封信，早就记在心中，恨在心中……

“旗手”除了追缴此信之外，据香港《大公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江青百般寻觅，“小俞”何许人也》一文，也提及“旗手”追缴郑君里头其他与“小俞”有关的信件：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晚七时半，北京电视台播映了江青昨天（九日）出庭受审的详细实况。一市民争相观睹……法庭宣读郑君里给江青的书信，信中提到了‘小俞’与她有书信往还的事实。人们立即敏感到‘小俞’，就是江青千方百计要查抄书信中的主要人物。这个人是谁已有一些说法，但最后仍有待将来写江青外传的人解答了。”

给郑君里寄出了长信之后，唐纳出了一口闷气，心境总算平静下来。本来，他猛一听说，蓝苹去找小俞，他气得要马上离开济南；可是，当蓝苹的姐姐说能召回蓝苹，他又心软了，在济南等待着……他的性格的软弱，正是导致了他的爱情的悲剧。

他在悲伤、痛苦、激愤却又夹杂想念、企待之中，坐立不安地在马吉峰家度过了一天。

蓝苹终于和唐纳重归上海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行文至此，不能不提一下“小俞”——黄敬的行踪。

一九三五年秋，原本是旁听生的俞启威，正式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跟北平学界蒋南翔、姚依林等认识了。但是，这时他仍未接上党组织关系。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俞启威和姚依林等成为学生领袖。这时，俞启威为了便于在外活动，改名黄敬。

据当时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担任领导工作的陈伯达告诉笔者，黄敬在“一二·九”那天，还未恢复组织关系，翌日被确认为中共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

一九三六年四月，黄敬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学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一九三六年五月，作为北平学联的代表，黄敬来沪，住在八仙桥女青年大厦。五月底，黄敬出席了在上海圆明园路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借用那里作会场）召开的全国学联成立大会。

黄敬来上海时，临时改名“黄文山”。他和胡乔木、吴砚农、刘江陵、张惠民五人组成了筹建

全国学联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小组，由他任组长。

沙千里在他所著《漫话救国会》^①一书中，这样回忆道：

①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简称“全救”。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即“五卅”纪念日的第二天，在上海开幕。大会共开了两天。

会议是在上海博物院路（引者注：今虎丘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一间会议室举行的。会场可容纳几十人。这个地方是由吴耀宗安排的。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

出席会议的代表：北平的代表有黄文山（黄敬）、刘江凌（陵）、陆瑾、李家宗（董毓华）……在成立会之前，曾在潘大逵家召开筹备会议，由沈钧儒主持，黄敬发了言。

真是无巧不成书：

蓝苹等三对新婚夫妇五月五日在上海招待亲友时，是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餐室，而那时黄敬正住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内！

蓝苹等三对新婚夫妇的证婚人是沈钧儒，而黄敬来沪却又正是和沈钧儒商议筹备成立全国救国会！

黄敬对蓝苹和唐纳的婚恋清清楚楚，而唐纳根本不知道蓝苹的前夫就在上海。就在咫尺之内！黄敬悄然和蓝苹见面，劝她离开上海回北平。她毕竟跟黄敬有着很深的感情，决定以回济南探望母亲为借口，离开上海，离开唐纳。唐纳呢，全然被蒙在鼓里！

蓝苹的姐姐对唐纳说，蓝苹去天津了。其实，她在北平！

翌日——唐纳处于高度兴奋之中。

一大早，马吉峰就拿着一张报纸进来，高声呼喊：“唐纳，唐纳，看报，看报——你成了济南的新闻人物啦！”

唐纳一瞧，嘿，“唐蓝事件特刊”！

唐纳接过报纸之际，马吉峰神秘地笑了。

那“特刊”全文刊登了蓝苹写给唐纳的最后一封信，唐纳二十六日写给蓝苹的“遗书”，还有唐纳在自杀之际致郑君里、袁牧之、赵丹、徐怀少的一封长信……

唐纳抬起头来，马吉峰仍在神秘地笑着。

唐纳恍然大悟，正是他面前的这位“文友”把这些信件“捅”到报社去，印出了这份“特刊”！

唐纳哭笑不得，只好由他去了……

唐纳细细地看着“特刊”，读着他“二十六日夜远处传来鹧鸪啼声和着雨声时”写下的“遗书”，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正在恍惚之际，马吉峰说有客人来了。

唐纳丢下报纸，站了起来，以为蓝苹来了。

出乎意料，却是郑君里从上海专程赶来！

原来，唐纳自杀以后，茶房除了在他房中找到致蓝苹的信之外，还找到致郑君里等的信。人命关天，济南宾馆当即按信封上的地址，给郑君里发了电报。

郑君里接到电报，奔往赵丹家，大家都为唐纳自杀惋惜不已。他俩一商量，决定由郑君里赶往济南，料理唐纳后事，而赵丹则赶往大律师沈钧儒先生处，要求他为唐纳之死申冤。

郑君里含泪踏上北去的火车。刚到济南，他直奔济南宾馆，方知唐纳已经脱险，当即破涕为笑。

他终于找到马吉峰家，兄弟团聚，悲喜交集。

“昨天我还寄信给你呢！”唐纳对二哥郑君里说道。

“信里讲些什么？”

唐纳附在郑君里耳边，说出了蓝苹姐姐告知的消息。

郑君里也楞住了。这位“六和塔婚礼”的主持人，怎么也想不到，“新娘”蓝苹如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蓝苹来了，我要当面跟她算帐！”唐纳愤愤地说。

“三弟，”你千万冷静。”郑君里年长三岁，为人处世到底比唐纳老练、沉着，他叮咛道：“你千万不可当面戳穿蓝苹的隐秘，她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说得出、干得出的女人。如果你不愿再跟她和好，我们现在就回上海去；如果你还要跟她共同生活，那你就别声张，当作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

唐纳无言以对，久久地缄默着。半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过天津，经德州，蓝苹接到姐姐的电报，终于从北平赶来济南。

当天下午，蓝苹在姐姐陪同下，唐纳在郑君里陪同下，在东鲁中学宿舍见面。

向来健谈的唐纳，此刻嘴巴像贴了封条。

向来伶牙俐齿的蓝苹，一脸尴尬，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

双方僵持着。

“阿蓝，回上海去吧！”郑君里打破了难堪的沉默，说道，“阿蓝，你不是对三弟说过，等下了雨就回上海。济南已经下过雨了，你该回上海了！”

“你们先回去吧。我收拾收拾再走。”蓝苹说道。

“不，我们一起回上海。”郑君里一手拉着唐纳，一手拉着蓝苹，要往外走。

蓝苹抽回了手，说：“今天就走？”

郑君里斩钉截铁一般说道：“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蓝苹拗不过郑君里。当晚，他们就踏上了驶往上海的火车……

“唐蓝事件”满城风雨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唐纳·蓝苹合高记》；

七月二日《大公报》：《唐纳蓝苹，昨已携手回沪》；

七月二日《立报》：《表演一幕悲喜剧后唐纳蓝苹昨晨抵沪》；

七月四日《大公报》：《唐蓝珍闻？》；

七月四日《娱乐周报》：《六和塔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唐纳在济南自杀》；《唐纳蓝苹和解回沪》；蓝苹“导演”的这部“悲喜剧”，成为上海一大社会新闻。

唐纳和蓝苹返回上海之后，借住在南京路上的一家饭店。《大公报》记者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记者于昨晚七时半，接到了唐纳的电话以后，便驱车急赴XX饭店。一进门，就看见那个一向很好动而又顽皮的蓝苹，她还是那副顽皮的神气，不过精神很萎顿。房间里虽然开了风扇，她虽然只穿了件很单薄的黑绸旗袍，但她还只是满口嚷着热。

“记者一走进门，便紧紧地和唐纳握了握手说：‘应当恭喜你们，看见你们两个一块回上海来。’

“唐纳听了这句话，只是很深沉而又轻微地笑了笑，但那是一个愉快而又满意的笑啊！”

“唐纳用了半嘶哑的嗓子和记者谈话。记者问他什么时候碰见蓝苹的，什么时候离开济南的？他说一路上没有好好地睡觉，所以嗓子变得哑了。他是二十九号会见蓝苹的，当夜便乘平沪车直回上海。

“唐纳又说，这一次上海许多朋友都很关心他们，他都很感激。尤其是朋友中有人特地赶到济南，这真是使他感谢不尽的……”

也在这个当口，面对记者，蓝苹女士慷慨陈词：“离沪北上，参加救国运动的工作，后来知道唐纳自杀的消息，便即赶回济南，和他同回上海来了……”

蓝苹所说的“参加救国运动”，其实也就是回北平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当时，黄敬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的指示，正在北平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郑君里呢？当他在大东茶室里惬意地品茗之际，记者追来了。

郑君里只笑眯眯地说了这么一句：

“唐纳自杀，只要来问我好了，我什么事情都知道。”

可是，说罢，他除了笑之外，什么话也没说。

他是一个嘴巴颇紧的人。回沪之后，他才收到唐纳从济南寄出的那封信。

一点也不假，他是个“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人，然而，他不过说说笑笑罢了，从未对人透露蓝苹去天津的底细。

恰恰因为郑君里对“唐蓝事件”的“什么事情都知道”，后来“旗手”非置他于死地不可……蓝苹和唐纳闹得满城风雨，记者们蜂拥到他们借寓的饭店。

不得已，她跟唐纳悄然离开上海，在苏州唐纳老家小住几日，然后搬到上海法租界华勋路（今汾阳路）又开始同居生活。

当时的报纸，对于“自杀案两主角”，作了如下评论，倒是勾画着两人不同的性格：

“唐纳——他虽然具有着很前进很积极的思想，但是在性格上，却显得非常的软弱。对人总是笑嘻嘻的。没有看见他发过一次脾气。”

“蓝苹，他的这个恋爱对手的个性，却正同他相反。”

“一个豪放而带着孩子气的姑娘。在她的生命中，是没有畏惧，没有屈服的。刚强、豪爽。简直有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风度。”

“她还有着是一个非常热诚的性格。只要性情相投的人，不必有多少次的会面，她就可以熟悉得像多年老友一般的无所不谈。”

“关于她童年时顽皮的事迹，她说得最为起劲。每当冬日之夜，几个人围坐在火炉旁，她竟会毫不疲倦滔滔不绝地谈上一两个钟头。”

“大概在她的生活过程中，所受的刺激太多了。神经衰弱的病症竟降临到这么一个天真；热诚的姑娘的身上。一些的刺激，都足以引动起她神经的反应……”

唐纳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人们对他的印象如此，而他实际上也确如此。

蓝苹却有着她的隐秘。这个看似“天真、热诚”的女人，却有着颇为复杂的背景……

“唐蓝事件”，甚至引起陶行知的关注。为此，陶行知写了一首诗《送给唐纳先生》：

听说您寻死，
我为您担心！
您要知道，
蓝苹是蓝苹，
不是属于您。
您既陶醉在电影，
又如何把她占领？
为什么来到世界上，
也要问一个分明。
人生为一大事来，
爱情是否山绝顶？
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
谁也高兴听喜讯。
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
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写不比燕子，
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
如果拖泥带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

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
把一颗爱她的心，
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想说给您听，
为个人而活，
活得不高兴；
为个人而死，
死得不干净。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
才值得我们去拼命。
若是为意气拼命，
为名利拼命，
为恋爱拼命，
问我们究竟有几条命？①

①自行知著，《行知诗歌集》，大孚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版。

陶行知的诗，写得恳切、真诚，今日读来，仍发人深省。

当然，即便在“唐蓝事件”的报道满天飞的时候，谁也未曾提及“小俞”来沪之事——他化名“黄文山”出现在上海，谁也不知道他就是蓝苹的前夫，就连沈钧儒也不知道！事隔半个多世纪，笔者在查阅有关全国学联和救国会的史著时，反复核对黄敬在沪的时间、地点并访问了有关当事人，这才终于弄清蓝苹出走上海的真正内幕……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六章 声名狼藉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唐纳和蓝苹总算有了暂时的安静。唐纳埋头于写作。他从评论转向创作。这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建一厂、二厂。二厂的人马，大都是从“电通”转来的。二厂的编剧委员会由欧阳予倩主持，唐纳、卢敦协助。

此刻，他充分发挥他的创作力。才花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写成了剧本《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紧接着，他又致力于写作剧本《陈圆圆》……

设在天津的《大公报》要开辟上海版，聘请唐纳为影剧记者兼影剧版主笔。

于是，唐纳写了许多影评。他继续参加反对“软性电影”的论争。当“艺华”拍了“软性电影”《化身姑娘》时，唐纳参加起草《向艺华公司当局进一言》的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民报》的《影谭》副刊上，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正直。

朋友有难，他也挺身而出。他的好友夏其言向笔者长谈唐纳其人时，说及一个有趣的故事：夏其言当时正与一位姑娘相爱，而姑娘因家庭穷困曾被迫与一位大资本家之子订婚。当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装成一个律师，夹着一个公文皮包，来到那资本家家里，陈说利害。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使那资本家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订婚婚约……如今，夏其言年逾古稀，他指着他的夫人笑到：“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很感谢唐纳热情相助……”

一向不甘寂寞的蓝苹，比唐纳更加忙碌。她脚踏电影戏剧两条船，一心一意朝着“大明星”进军。她明白，尽管经过“六和塔婚礼”和“唐纳济南自杀”两出闹剧，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然而在影剧界，她毕竟不过是三、四流的演员，明星的地位不是争风吃醋、打打闹闹

所能确立的，却在于演出的实绩。

说实在的，论话剧，她只在《娜拉》中挑过大梁。此外，不过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演过小木匠的妻子罢了。

就电影而论，她不过在《自由神》和《都市风光》中演过不起眼的角色，还从未演过主角。尽管她目空一切，就连“电影皇后”胡蝶也不在她的眼里。然而，胡蝶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提任电影主演，已经拍了几十部电影。她凭《自由神》、《都市风光》这两部影片的次要的配角，能跟胡蝶匹敌？

她终于挤进“联华影片公司”的《狼山喋血记》摄制组。这部影片由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主角刘三由刘琼饰演，而蓝苹饰演刘三的妻子。

蓝苹好不容易争到了“第二主角”的地位。不过，在影片开拍之后，蓝苹才知道，这个“第二主角”徒有虚名。就连导演费穆为她而写的《蓝苹在（狼山喋血记）中》一文，也不得不这么说：

“这里我只介绍蓝苹女士。其理由是蓝苹女士所演的角色，是最容易被观众忽略的一个……”

“在《狼山喋血记》中，差不多是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这种场面多数是一个镜头的场面，很少连续到三个镜头以上……”

虽然，导演的文章本来想夸奖蓝苹的演技，可是说来说去。却成了叫观众不要“忽略”那“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出现“一个镜头”的女演员。

其实，每一个电影导演的目光都是很尖的。导演们深知，演员的成败，将影响影片的成败。导演总是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担任主角。对于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导演们斟酌再三的。蓝苹可以拉人写影评，把她吹得天花乱坠，可是却难以征服一个导演——因为导演首先考虑的是影片的成败。

看来，蓝苹虽然算打进电影圈了，可是凭她的演技，离“大明星”的宝座还远着呢。

她又想在话剧舞台上杀出一条路，她毕竟本是话剧演员，何况已在《娜拉》中争得主角。

就在这个时候，《赛金花》话剧剧本的发表，蓝苹大吵大闹要演主角，又在影剧界掀起一场风波——她是一个永不安分的女人！

这场风波发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杂志六卷四期，里面推出了新创作的“国防戏剧”剧本《赛金花》。

作者的名字，是上海影剧界人士所陌生的：夏衍！

虽说在今日中国不知夏衍其人其名者恐怕无几，然而，在《赛金花》剧本发表之际，人们确实不知“夏衍”何许人也！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界》第一期上，刊载了《（赛金花）座谈会》，就连影剧界台柱人物洪深、于伶、凌鹤，也不知“夏衍”为谁！

据说，夏衍乃“北方的新作家”！

其实，“夏衍”——沈端先，早在一九三二年，便已打入上海电影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他不断地化名：他第一次到明星影片公司出席编剧会，化名“黄子布”；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署名“丁一之”；他改编茅盾小说《春蚕》为同名电影；署名“蔡叔声”……他发表《赛金花》剧本，第一次用笔名“夏衍”，当然难怪读者不知其人了。

夏衍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写作《赛金花》的经过：

“其实，我写这剧本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触动。当时我独居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除看报外别无他事。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了赛金花晚年的一些不幸遭际，特别是在一篇杂记中看到她入狱室时对革命志士沈草的一段讲话，的确使我产生了当时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远远不及一个妓女这样一种感想。这也就是我在最后一幕中抑制不住的对她所表示的同情。这个剧本算是我的第一个多幕剧……”

《赛金花》剧本发表后，尽管剧作者系“无名之辈”，但看得出作者的功力。那传奇的色彩、

变化跌宕的剧情，马上引起影剧界的注意。

蓝苹一看，争着要演《赛金花》主角。虽然“八字还没有一撇”，当时导演人选都尚未确定，她就请一位“公哥”在《时事新报》上抢发消息，以求“先入为主”：

“有许多团体要排演它（指《赛金花》——引者注），那自然是好现象，但怯于场面的伟大，角色的众多，所以有好多团体便因为经济及人才的不够，而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许多心余力怯的团体中，比较具体地有实现希望的，便只有蚂蚁剧团。”

“蚂蚁剧团以前曾演过好几次戏，成绩虽不能算怎样的好，但认真的态度却是够使我们佩服的，所缺少的，便是没有好的导演人才，能够统率这些戏剧爱好者。”

“现在，他们决心来排演《赛金花》了，排练的费用预备二千元，以便在布景、道具上都不致太寒酸，因而失去真实性。至于赛金花这个角色，则预备请蓝苹来担任。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扮演赛金花，想来成绩当然也不致错的。”

“至于导演等人才，则也想向外界聘请云。”

不过，光是抢发消息，想“占山为王”，也未必那么容易。

渐渐地，局势明朗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经过筹备，已准备上演《赛金花》了。

就演员阵营而言，业余剧人协会是够强大的了，拥有王莹、金山、郑君里、赵丹、施超、胡萍等，蓝苹也是其中的一员。

令人不解的是，业余剧人协会居然在报上发出广告“招聘赛金花的扮演者”！

业余剧人协会的女演员不算少，为什么还要招聘女主角呢？蓝苹不是早就声言要演赛金花了吗？

毛病就出在演员阵营太强：蓝苹要演赛金花，王莹也要演赛金花！

王莹和蓝苹曾一起演过电影《自由神》，此刻为了争夺《赛金花》主角翻了脸！

业余剧人协会无奈，只得向社会招聘女主角——这样王莹、蓝苹的矛盾也解决了。

然而，王莹、蓝苹剑拔弩张，谁来当女主角，谁就会受到王莹、蓝苹两边夹击，谁也受不了！就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导演章泯、于伶得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原来是沈端先，于是便把矛盾“上交”到剧作者那里。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出于无奈，我出了一个糊稀泥的主意，认为可以分A、B两组，赵丹和蓝苹，金山和王莹，让他们在舞台上各显神通，这个设想章泯同意了，而于伶则面有难色。”

“因为于伶知道蓝苹不论做戏还是做人，都有一丝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而要她担任B角，她肯定是要大吵大闹的。后来事态发展果不出于伶所料……”

真的，蓝苹不屑于充当B角！她依旧坚持，赛金花应当由她来演。

就在王莹、蓝苹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政变”：金山、王莹从业余剧人协会中拉出一支人马，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这个新剧社已暗中与金城大戏院签订合同，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

尽管在十一月十五日，蓝苹、赵丹、郑君里、唐纳等业余剧人协会会员，在大东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报界陈明《赛金花》的主角纷争经过……然而，四天之后，“四十年代剧社”还是照样上演了《赛金花》，女主角为王莹，男主角李鸿章由金山饰演。

《赛金花》上演后，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轰动了上海。

蓝苹在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纠纷中败北。不过，各报竞载“赛金花纠纷”公案，蓝苹又成了闹剧中的主角……

不过，从此蓝苹恨透了王莹。后来，当她成为“旗手”，便在“文革”中置王莹于死地。这是后话。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

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

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

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一九八二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

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当蓝苹在一九三五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五月，由济南来到了上海。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蓝苹在崔万秋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随笔之类；三月十五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张春桥来上海之后，落脚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三二四号“红屋”。那里本是世界书局发行所，后来被张静卢的上海杂志公司所取代。张静卢为上海出版界巨头，他的自传便以《在出版界二十年》为书名。张春桥在张静卢手下，当一名校对员。张春桥常因分不清错别字和标错标点符号，受到老板的批评。

张春桥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崔万秋，其中的缘由是复兴社搭了桥。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在济南发起的“华蒂社”，隶属于国民党复兴社。

崔万秋呢？他是复兴社的上海头目——因为“军统”本来便是复兴社特务处。

张春桥写了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遭到鲁迅的严正批判。鲁迅发表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痛斥了“狄克”。张春桥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信末，张春桥给鲁迅留下了回信的地址：“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天坛编辑部转我吧！”张春桥跟崔万秋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太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活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外，可说寥寥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

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挥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 DDS 咖啡馆聚会。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的“军统”头目沈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写下了自己目击的几个镜头：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整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及：“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关于分居，她这么说：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

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他们不断地到，治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蓝苹也并不讳言她跟唐纳之间的打闹。她在那《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一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指“六和塔婚礼”——引者注）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蓝苹的公开信，活脱脱地勾勒出她的泼妇骂街的鲜明形象。

据后来的江青说，三十年代的蓝苹是“硬骨头”，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她，真不知天底下有羞耻二字！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听说蓝苹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妈”尚在，“阿妈”是深知蓝苹内情的。我去寻访这位历史的见证人。

我在上海闹市区复兴公园附近，找到了蓝苹、唐纳当年的住处。那是二楼的亭子间，十来个平方米而已。

蓝苹当年的房东，其实是二房东，是个资本家，叫许慕贞。

房子尚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前这儿住过什么房客，有过什么二房东了。

我托好几位朋友代为寻觅。费尽周折，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我终于找到了那位“阿妈”——当年许慕贞家的保姆、蓝苹的好友秦桂贞。

竟有那样的巧合：秦桂贞也属虎！这样，蓝苹、唐纳、黄晨、史枚、夏其言、秦桂贞六人同年。

秦桂贞一头银灰色短发，常州口音，说话有条有理。在一间小屋里，她跟我长谈，讲述五十年前的情景：

“那幢房子，是许家租的。我是佣人，住在三楼亭子间。隔着一层楼板，下面的亭子间就是蓝苹跟唐纳住。那时候，我喊蓝苹‘蓝小姐’。我跟她同岁，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

秦桂贞记得，“蓝小姐”因为觉得那个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来，来的那天，只带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屋里放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那都是许家借给她的。

没几天，蓝苹就跟秦桂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时，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阿妈”。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秦桂贞发觉，蓝苹怎么不吃水果？

“没钱呀！”蓝苹把双手一摊。

秦桂贞悄悄把东家买的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秦桂贞还发觉，到了月底，蓝苹常常一回家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

“吃过晚饭了吗？”秦桂贞问。

“没饭票了！”蓝苹答道。

那时候，蓝苹在饭馆搭伙，三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喝西北风。

秦桂贞到东家的厨房里，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在秦桂贞的印象中，唐纳斯斯文文，讲话软绵绵，有点“娘娘腔”。他常常坐在那里写东西。秦桂贞大字不识，看不懂他写什么。

蓝小姐讲起话来呱呱呱呱，笑起来咯咯咯咯，有点男子汉的味道。只是她的脾气变化无常，喜怒无常。

“一个苏州人，一个山东人，他们俩在一起真‘热闹’！”秦桂贞一边回忆，一边笑着。

半夜，秦桂贞常常被楼板下“阿桂、阿桂”的呼喊声所惊醒。

蓝苹在喊她。

秦桂贞一听，就知道他俩在吵在打，赶紧下楼。

每一次充当“和事佬”、“调解员”的，总是阿桂。

在蓝苹跟唐纳分居、唐纳搬走之后，那亭子间里的闹剧仍不时“演出”。

唐纳仍常来，他俩仍吵仍闹。

最使秦桂贞吃惊的是，蓝小姐常常“动武”——她“武斗”。

“一个电影演员会这么凶，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佣人还不如！”凭她的直感，秦桂贞这么感慨道。蓝苹究竟为什么跟唐纳离异呢？

蓝苹成了破坏章泯家庭的“第三者”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蓝苹、唐纳再度成为上海滩上的新闻人物：距唐纳上次在济南自杀——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后整整十一个月，忽然从上海吴淞传出消息，唐纳跳海自杀！

幸亏被人及时捞起，送往吴淞医院抢救。口吐白沫的唐纳，总算又一次免于死……

消息传出，又轰动了上海报界！

报上报道唐纳二度自杀，只是提及蓝苹遗弃了他。其中详情，外人莫知。

直到六月十四日，记者们获知在尤竞家发生的一幕悲剧，这才了解唐纳跳海自杀的真正原因：尤竞，亦即于伶，章泯之友。那天，于伶家仿佛成了“临时法庭”——那时章泯借他家办理离婚手续。

章泯，上海话剧界声望很高的导演。他还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创作过许多剧本。另外，他也是一位艺术理论翻译家，曾与郑君里合译过《演员自我修养》等书。

章泯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四川峨眉人。他于一九二九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理论著作《论悲剧》、《论喜剧》，在戏剧界颇有影响。

赵丹称章泯为“严师诤友”。章泯死于“文革”中的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一九八〇年二月春节时，赵丹写下《怀念严师诤友章泯》^①一文，内中回忆道：

^①赵丹，《怀念严师诤友章泯》，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大地》。

章泯原名谢韵心，是我参加左翼剧联组织的单线联系人，但凡我思想上有什么疙瘩，或是什么大事的决定，都听他的。此后虽然剧联组织宣布解散了，然而我们一直还保持这种关系。他是我的严师诤友。

他为人正直、严肃，不苟言笑，待人诚恳，绝少低级趣味。他是党内的一位理论家，在同志间有威信。他也写过一些剧本，但在介绍世界名著与戏剧理论方面的建树更大。我也正是从他那里才第一次听到史丹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瓦格坦柯夫、梅耶荷特、泰伊洛夫、雷因哈特……这些艺术大师的名字，也才得知在话剧领域内原来也有这许多不同的派别，并且各个的主张自成体系，他们之间又往往相抵相悖。……

一九三四年早春的一天（引者注：应为一九三五年），金山陪同章泯来找我，邀我参加易卜生的《娜拉》的演出。一开头他们就说：“我们不能总停留在喊几句口号，流出凡滴眼泪的表演水平阶段了，我们要提高左翼戏剧的演技水平……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这样，我们就在《娜拉》的排演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起史丹尼方法了。老实说，在这之前，我完全是“瞎猫碰死耗子”，只凭一点直感在演戏，能有这样一次有目的的学习机会，真是珍重如宝……章泯同志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人。他非常尊重别人的创造和劳动，他与演员一同工作，完全取平等探讨的态度，总是从理解演员的创造意图、向往和可能出发，善于将演员的创造意图纳入到他自身的导演工作中去，成为他再创作的起点……他最蔑视一个人的自满和沾沾自喜的低级情操。他不止一次地教育过我。“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每一次的创造，都只是一次艺术上的探索，一个重新起步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什么成功或是失败可比。”

从赵丹的文章之中，足以看出章泯在戏剧界的崇高声望。

章泯，本来有着幸福的家庭：妻子萧琨女士是著名的诗人萧三的胞妹，和他是结发夫妻。结婚多年，感情不错，他们已有几个子女。

然而，由于一个比章泯小七岁的“第三者”插足，使章泯神魂颠倒，家庭崩溃。萧琨忍无可忍，只得与章泯离婚。

离婚仪式在于伶家举行。章泯和萧琨双方亲友到场作证。

章泯脸色铁青，当着众亲友，在离婚书上签字，然后把孩子们领到自己一边——孩子归他抚养。

萧琨大哭。颤抖的手，执着颤抖的笔，在离婚书上签字。泪水浸湿了纸头。写了好几分钟，她才写好名字。

孩子们挣脱了章泯的手，扑到萧琨怀中。顿时，哭声响成一片。

章泯上前拿起离婚书，一扭头，走了……

那个造成夫妻离婚、母子离异的“第三者”，不是别人，正是蓝苹！

蓝苹早就认识章泯。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上海成立“无名剧人协会”（又名“无名剧社”），当时叫李云鹤的她就参加了。左翼剧联指派了尤竞（于伶）、章泯来指导这一剧社。这个剧社组织两次公演，李云鹤都参加了。

顾而已、赵丹记得，一天晚上，他们去观看无名剧演出的《锁着的箱子》。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顾而已。赵丹看来，那个剧社演技平平，但是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演员，不论对白、动作都还可以，似乎受过专门的训练。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女演员叫李云鹤……

一九三五年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筹排《娜拉》时，章泯作为三位导演中的一位，跟蓝苹朝夕相处。这时，赵丹也和那位改名为蓝苹的女演员第一次同台演出。

不过，那时的蓝苹，只是把话剧看作一块跳板，要从舞台跳上银幕。所以她跟唐纳同居，希望借助唐纳在影评界的影响发迹。何况唐纳的结拜兄弟袁牧之、郑君里、赵丹都是电影界的顶梁柱，都会助她一臂之力。

电影却是块放大镜，演员的才、貌，在银幕上，纤毫毕露。蓝苹貌不惊人，演技平平，在电影界成不了“大明星”。

她又打话剧的主意。她找章泯，为她主演《赛金花》出力。

王莹夺走了《赛金花》。蓝苹再入电影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她终于争得电影《王老五》一片的女主角。该片编剧为蔡楚生、导演费穆。蓝苹在影片中扮演王老五之妻。

这一回，不像《狼山喋血记》，女主角是名符其实的，镜头很多，绝不是“隔几百尺片子，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

蓝苹期望着《王老五》上映，会使她在影坛名声大振——这是她平生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使蓝苹大失所望：《王老五》完成以后，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

“审查老爷”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大为不满，说什么“中国是没有汉奸的”！胳膊拧不过大腿，编导只得删剪了两本影片（亦即剪去二十分钟影片），使全片大伤元气，变得残缺不全。这部影片一直拖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才在上海上映，那时日军已占领上海。电影院观众寥寥无几。

蓝苹在电影界老是“打不响”，再一次寄希望于舞台。话剧毕竟“立竿见影”，排演几天之后，便可跟观众见面。

她终于打章泯的主意了。她深知，一旦有了章泯这把梯子，她就可以爬上舞台明星宝座——因为章泯是上海举足轻重的话剧导演。

她再也不顾什么章泯比她大七岁啦，章泯是有妇之夫啦……

她白天在拍《王老五》，夜里跟章泯鬼混。

章泯正在筹备排演俄国十九世纪著名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大雷雨》，蓝苹博得了章泯的欢心便出任女主角——扮演卡嘉邻娜……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唐纳写了一个剧本，托钱千里交给蓝苹。钱千里是电影导演，跟赵丹、顾而已、朱今明是江苏南通崇敬中学同班同学，也是唐纳好友。

本来，送一个剧本，犹如邮递员送一封信，普普通通。然而，钱千里在无意之中，却在蓝苹家里见到章泯！

当时的《影与戏》，作了如下报道：

“钱千里从来没有去过。那天去得太早，大约蓝苹还没有起来。钱千里敲门敲了很久，以为她昨夜拍戏拍得太晚，现在还没有回来。本来打算走了。哪晓得蓝苹又轻轻地开了门，伸出一个头来。钱千里就把一个剧本交了给她。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就顺手推了门进来。哪晓得章泯正睡在床上，钱千里弄得有点难为情，两人互相点了点头，钱千里就轻轻地走了……”

五月二十二日，唐纳知道这件丑闻后悲愤欲绝。

于是，五月二十七日，怒气填膺的唐纳在吴淞跳入波涛之中

蓝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跟章泯公开实行同居。

章泯夫人萧琨实在无法容忍，终于与章泯离婚。

“蓝小姐”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蓝苹，害得唐纳跳海，害得萧琨夫离子散。这时的她，不过二十三岁而已。这时的她，已有

过三个丈夫，已入过党、坐过牢、写过自首书，已上演过“六和塔婚礼”、“唐纳济南自杀”、“争夺《赛金花》主角”和“蓝苹、章泯同居”这么四出轰动上海的闹剧……在生活的舞台上，她已经演得够淋漓尽致的了！

生活，生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各式各样的灵魂。

然而，就在蓝苹的第四出闹剧进入高潮之际，她居然在《光明》杂志发表了《我们的生活》一文。文末注明的写作年月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正是唐纳跳海前的十多天。

“演员的生活像谜一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章一开头，蓝苹就故弄玄虚。

在文章中，蓝苹除了大谈演员“身体的训练”、“丰富的知识”、“操纵自如的精神活动”之类。忽然写下了这样的“醒世名言”：

“因为戏剧艺术本身的艰难，再加上现社会许多不利于我们的客观条件，一个演员的生活是很容易有着以下的危机的。”

“生活的糜烂——这糜烂的生活是演员的艺术之最大的敌人，它毁灭着演员本身及他的艺术。一个演员在目前这样社会中，是很容易走上糜烂的道路的，这一半是由于那恶劣的环境促成的，不过演员个人的自暴自弃也是重要原因。环境固然可以影响个人，同时个人也可以改变环境。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的阶段。将自己溶化在纯正、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她的话，说得是那么漂亮，那么动听。

她并非后来成为江青、成为“旗手”，这才说大话、假话、谎话。她年轻时，就已经大言不惭了！难怪连她自己也说，“处于言行不一的深深的痛苦之中”——这倒是一句老实话。

她的朝三暮四，还不光是“生活的糜烂”。她是一个攻于心计的女人。她每“爱”一个男人，都是为了实现她的一着棋。

夏其言清楚地记得，一天，当蓝苹跟史枚、唐纳、他一起闲聊，蓝苹随口说了一句“名言”——

“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

这，大抵就是蓝苹为人处世的“诀窍”。正是这句“名言”，她征服一个又一个男人，朝着“高居人上”的目标走了一步又一步棋。

不过，她的棋走到丢唐纳、取章泯这一步，她的真面目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即便在当时那样的上海，她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

就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章泯与萧琨被蓝苹拆散夫妻之后，翌日，《时代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为《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

虽然半个世纪过去，迄今重读此文，仍觉得作者分析颇为精辟，入木三分，把蓝苹的灵魂暴露无遗。大抵由于担心报复的缘故，作者没有署名。但是，作者如此敢言，抨击蓝苹的丑行，颇为难得。

现全文照录，以飨读者。看得出，这位作者对于蓝苹，是相当熟悉、了解的：

大都市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住在大都市里的青年男女，那干出来的事，无论如何也会带一点神秘性的。在不久的以前，报纸上曾刊载过女演员被强奸的新闻，但事后据悉，那是事先计划这样作的，因为要使那部影片被人注意，才想出这种打官司当宣传的妙法来，这里面还带了一点生意眼。

出风头，成了都市的生活条件，因之每个人都在想法子出风头。据说蓝苹和唐纳这次交恶，其中也有着特别作用的。

蓝苹，本来是一个貌既不惊人，而又没有相当地位的女人。但是她对于自己的前途，是颇为关心的，她觉得在大都市里，假使不引起人的注意，是没有出路的。可是，自己又的确没有惊人的地方，虽然在《娜拉》一剧中演出，是颇博到好评，究竟不能像别的女人一样。那时候，她更想在电影界中露露头角，苦的却是没有人替她捧。这个问题一直苦闷在心里。

侥幸，那个时候，唐纳正在感到女人的需要，蓝苹又是一个扮演过“娜拉”的，对于男人，她是颇有把握的，而且她也知道唐纳在过去电影界里是曾以写影评出过风头的。她知道仅使利用唐纳，也许可以使自己在电影界红一下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两个人很快地毫无条件的就结合上了。她的原意，是想唐纳可以捧她成为红星。

那晓得希望并不变成事实，蓝苹当时是颇为苦恼的。后来她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她曾回到济南去，表示和唐纳分开。但据说这里面有原因的。蓝苹知道唐纳那时正热恋着她，一定会演出什么惨剧来的。那稿子报纸上一登，自己不是可以大出风头吗？所以，唐纳到了济南，开始她拒而不见。果然，唐纳闹了自杀的把戏，报纸盛传，她以为密计已酬，便决心跟唐纳回到上海。

谁知报纸上虽然登过，蓝苹的电影地位，并没被人注意，因之使她感到格外灰心，更明白唐纳已经是无用的了。她便转移念头，想在话剧界露头，不能不先被人注意，于是蓝苹的计划又来了。

她看准章泯在话剧界上，是颇占势的。她下个决心，想以爱情来感化章泯，希望章泯替她吹嘘。果然章泯可中了她的计，不但抛弃了共过患难的糟糠之妻，更不顾了许多孩子，死恋着蓝苹。蓝苹的企图是想章泯的妻子一定会吃醋，和她演了一番什么反戏，报纸一登，她不是便可以乘机出了风头吗？又谁知这个计划，又失败，竟引起唐纳的自杀，而反遭到许多人恶感的批评，这在蓝苹是意想不到的！

蓝苹的爱唐纳，爱章泯，都带有副作用的。可惜唐纳一点不明白，居然以命来争，想不到硬性的影评人的出路是如此，真使人会感到特别的失望。

蓝苹和唐纳的交恶是如此，蓝苹和章泯的结合也是如此，这应当谁都想不到的吧！

这篇评论，除了作者不知蓝苹的北平之行，未能准确分析蓝苹离沪北上之外，可以说是蓝苹在上海滩混了两年多的一份“小结”。作者压根儿没想到蓝苹日后会成为“旗手”，却可贵地看透了她的本性。

至于《青春电影半月刊》七月号对蓝苹的抨击，虽然只短短几句，火药味却够浓的：

“蓝苹的脾气很骄，架子很大。有人说，‘谁讨了这位女人，前世里总是作了孽。’由这句话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她一点轮廓了吧！”

“最近她和唐纳闹翻，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牢骚文章，原因是她另有所欢，爱上了章泯。不过害得章泯和他的夫人萧琨实行离婚，这一点在道德上讲起来，蓝小姐手段未免太辣。尤其他的夫人萧琨和章泯已有孩子了。”

萧现在和章泯离婚之后，只身离沪，前往延安，投奔胞兄萧三去了。

萧三是毛泽东的密友，《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①一书就是他写的。此书在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九年再版。再版时，萧三在序言中写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①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

“曾荣幸地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在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离别十多年后的三十年代末期，复在延安相处六年余，过从颇密。以后在阜平，在平山西柏坡……我备受阳光雨露的哺育。”

终于告别大上海

舆论越来越不利于蓝苹。她的不道德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谴责。

蓝苹我行我素，依然跟章泯公开同居，而且在报上放出空气：“悲剧闭幕，喜剧展开。蓝苹章泯，蜜月旅行。”

然而，在影剧界，稍有正义感的人，都对蓝苹的行径嗤之以鼻。

就连演话剧时，蓝苹刚一步上舞台，台下喻的一声，人们议论纷纷，对她说三道四，剧场秩序顿时乱哄哄的。

电影厂的导演们对这位又做又辣却又没多大本事的演员，也直摇头。

蓝苹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离她而去。

她形单影只，感到空前的孤立。瞻望前景，不寒而栗。她自己毁了自己。

她明白，她已不可能在银幕上或者舞台上成为一颗“红星”。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她无法在上海立足，想溜了。

就在这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中华大地。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烧，处于绝望之中的蓝苹，决计离开上海，她筹划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一天，吃过早饭之后，秦桂贞照例来到蓝小姐的亭子间，替她扫地、拖地板。

秦桂贞发觉有点异常，蓝小姐在那里收拾东西。

“蓝小姐，你要搬家？”秦桂贞问道。

“远走高飞！”蓝苹眉飞色舞地说。话刚出口，她立即压低了声音，对秦桂贞说：“阿桂，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你要替我保密，对谁都不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蓝小姐回山东老家了。”

“还回来吗？”秦桂贞问。

蓝苹摇了摇头。她一边从抽斗里捧出一堆照片，扔进小皮箱，一边对秦桂贞说：“阿桂，你不要扫了，反正我今天就要走了。”

“什么时候走？”

“等天黑了，不声不响地走。”

秦桂贞放下扫把、拖布，拿出刚发的工钱——她每月的工钱只有两元！

她上街，想给蓝小姐买件纪念品。

她花了两元钱——一个月工资买了一本照相册。她想，蓝小姐那么多的照片，需要用照相册贴起来。

当她把照相册送给蓝苹，蓝苹高兴得紧紧搂住秦桂贞，连声说：“阿桂，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

当天晚上，蓝苹吃了秦桂贞端来的蛋炒饭，穿着一件蓝布旗袍，悄然拎起那只黑色的皮箱，消失在夜幕之中。

蓝苹在上海神秘地消失了。她的闹剧终于拉上帷幕。

蓝苹究竟何往，人们茫然无知。

直至一九三八年元旦，《戏》杂志的《男女明星近况如何》一文，才用几行字报道了蓝苹的行踪：

“蓝苹，平常高谈阔论，思想偏激，今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与政府军相同的站在民族战争的最前线，蓝苹为之大大兴奋。听说在二个月之前，蓝苹即已离沪赴陕北，希望一见毛泽东，并报名在‘红军大学’念书……”

哦，“希望一见毛泽东”！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七章 奔赴延安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从上海来到延安，从蓝苹变为江青，是她一生的转折点。

关于她是怎样由上海进入延安的，向来众说纷坛。

传说最多的，是她经重庆进入延安。

后来细查这一说法的根源，乃是依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这是一本严谨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页，写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中华儿女》一片：“同年九月（引者注：指一九三九年），‘中电’又完成了《中华儿女》，由洪伟烈摄影。这是沈西苓抗战时期编导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电’，担任编导委员，即着手拍摄《中华儿女》，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于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该书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饰演《中华儿女》中刘二嫂一角的是蓝苹！这就是说，蓝苹离开上海之后，曾到重庆参加过《中华儿女》一片的摄制。

于是，说她从上海经重庆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据了。

不料，那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〇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刘二嫂一角由“蓝苹饰”改成了“康健饰”。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的女演员。

随着这一笔误的更正，种种关于江青由重庆进入延安的传说也就失去了依据。

也有人说她经武汉去延安，那是根据当时上海其他文化人进入延安的路线而作出的判断，难以证明江青也是走这一路线。

笔者采访了关键性的当事人徐明清之后，也就廓清了这一历史迷雾……

江青前两次来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回来上海时，开初找过徐明清，后来失去了联系，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记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于一个名叫莫仲乔的人的出卖，便衣警察来到浦东，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敌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说要小便，进入学生何淑君家里，悄悄告诉这个学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赶紧转告王洞若！”这样，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关押了三个月之后，被解往杭州。经党组织和陶行知先生多方营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释出狱。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出狱后，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的领导人丁华、王洞若。王洞若是她过去在南京晓庄师范时的同学，也曾在“晨更工学团”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一九三三年介绍入党的，这时成了党组织领导人。她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之后，问起了江青。她这才知道，在她入狱那段时间里，江青不仅在上海演话剧，而且演电影，“蓝苹”成了上海滩的“名演员”。不过，“蓝苹”出名，多半并非因为她的演技，倒是因为她在电通影业公司。跟编剧、剧评家唐纳闹恋爱、然后又吵离婚，一唐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那时，上海大报、小报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纳在杭州六和塔举行婚礼的消息，转眼间，又纷纷刊登江青离沪北上，唐纳追到济南，在济南宾馆自杀却又被救，唐纳、江青双双重返上海……

王洞若告诉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对她都有看法，不过，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这时她的党组织关系并未恢复，也没有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她曾对王洞若说：“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好‘灰色’。”

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经很难在上海开展工作，加上敌人已经抓过她，知道她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七月，“东工委”向上海临时工委要求给西安增派干部，以加强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王洞若考虑到西北方面需要干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作。

买好火车票之后，徐明清听人说江青“瘦得像个吊死鬼”，便决定去看看她。

那时，唐纳刚和江青一起从济南回沪不久，“唐蓝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徐明清打听到江青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找到了那里。那是一座楼房的底楼，一间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纳在那里。徐明清记得，唐纳梳着油光可鉴的小分头，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讲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屋里只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徐明清跟唐纳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不熟悉，话不多。她告诉唐纳：“我是蓝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离开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车站见一面。”

徐明清说着，拿出火车票，把明天离沪的时间、车次告诉唐纳，并给江青留了一张字条。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东过夜。

第二天，十多个学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车站。到了那里，不见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员”，大约一定很忙。

火车快开了，徐明清看见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跑过来。细细一看，竟是江青。她真的“瘦得像个吊死鬼”，跟一年多前离开临海时大不一样。

“一冰，你上哪儿去？”江青问她。

“我去西北。这一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江青又瘦又黄，徐明清叮嘱她要多多注意身体。

江青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有苦难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

火车开了。她们只说了这么几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挥动着手臂。

此后，她与江青没有联系。她没有给江青去过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处。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后，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东北军中任中共妇女支部书记，不久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后来担任中共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她的这些党内职务，都是秘密的，中共处于地下状态。她的公开职业是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主任——这倒是她本来的专业，因为她在南京晓庄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

过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带着一只小皮箱，说是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出来，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

来者正是江青！

博古同意江青进入延安

一别又一年，徐明清发觉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此行专为找她而来，就在徐明清那里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园里。

徐明清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说是王洞若告诉的。江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过，在那里认识王洞若，并知道王洞若是中共党员。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后仍与王洞若保持联系，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记起一年前离开上海时，王洞若曾跟她谈起江青：“李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也许会好些。”在江青来西安之前，王洞若从上海写信告诉了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当徐明清问起唐纳，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一言难尽！”

江青不愿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当时，徐明清并不知道江青跟唐纳闹翻了，何况“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局面动荡，电影界萧条……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王洞若那打听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离开上海，在济南住了几天。

江青见了徐明清，说出了真正的来意：“一冰，我想请你帮个忙。”

尽管那时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还是叫惯了老名字。

“帮什么忙呢？”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去学习，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问她带了介绍信没有，江青摇摇头。徐明清所问的介绍信，亦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江青这时打开了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影集说：“这就是我的‘介绍信’。”

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贴着江青演话剧、电影的许多剧照。徐明清从未看过江青演的

话剧、电影，很有兴味地看着，看罢，倒是觉得这本影集可算“介绍信”——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在当时还算是进步的。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后，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汇报。危拱之是叶剑英夫人，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女干部，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跟徐明清有着经常的工作联系。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带到八路军办事处谈一谈。因为当时党中央进驻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艰苦，知识分子不多，十分欢迎知识分子投奔那里。

于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黄包车，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来到办事处。徐明清一看，邓颖超同志正坐在那里办公。徐明清跟邓颖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绍给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相册递了上去。

邓颖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说了一句：“嗨，电影明星呀！”

这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跟江青第一次见面。

邓颖超事忙，没有多谈，说是这样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来。

此后，江青到八路军办事处又去了几次，徐明清没有陪她去。据江青说，她在那里见到了博古（即秦邦宪）。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江青进行口头审查。江青谈了黄敬，谈了由黄敬介绍在青岛加入中共。

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到北大街幼稚园，面带喜色。她告诉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进延安！”

就这样，江青进入延安。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徐明清的回忆，把江青如何从上海进入延安，说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过王洞若——徐明清——博古，从上海——济南——西安，进入延安的。

至于江青为什么要从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当时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时代大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黄敬去了延安！

黄敬也去了延安

虽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为这样，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黄敬化名黄文山来沪，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江青姐姐发来电报，江青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约之子李葆华。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华调离北平。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中共的苏区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会议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

“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五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

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①

①海伦·斯诺，《延安采访记》，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五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②

②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一九七九年五期。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

四月二十三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四月三十日，抵达延安，“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五月二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就在这次会议上，黄敬结识了毛泽东。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五月二十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五月二十日离开延安的。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据他回忆，黄敬此行与他同行。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是从西安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北行，朝延安进发。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仍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她从未骑过马，勉强骑了上去，十分艰难地前进，总算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开重要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据江青自云：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里想绝对不能在他們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不时夹杂着“吹牛”的成分。诸如“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全体都出来迎接我”之类，便属“吹牛”。

不过，由此倒可以确定江青到达洛川的时间——因为洛川会议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辆卡车，终于来到延安。

由此，也可以确定她到达延安的时间，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第一次见到延安的宝塔山，见到延河，见到旧城墙，见到南门上刻着的“安澜”两字，江青都显得新鲜、激动。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间，这跟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别。没有自来水，只能在混浊的延河中洗衣。苍蝇飞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马桶。漫天风沙代替了上海滩舞厅里的香风。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①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和江青差不多时候来到延安的，还有上海的女演员李丽莲。她参加过四十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也在由夏衍编剧、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压岁钱》一片中，饰演过张曼一角。

江青来到了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这倒不是审查她作为电影演员的历史，因为她随身带着的那本剧照相册以及李丽莲都足以证明她确是上海的影、剧演员，而且所演的戏、电影一般都是属于左翼的。

问题在于她的党籍。她深知，进入延安，党籍是至关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是，这年七月，当黄敬被捕、她仓促逃往上海之后，就跟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尽管她来上海时，所接触的田汉、徐明清都是中共党员。黄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在北平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所以后来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领导职务，而江青在上海却没有恢复党籍。正因为这样，她从上海来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时，并没有带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也正因为这样，她进入延安，要求恢复党籍，中共组织不能不对她进行审查。有人说“江青”是毛泽东为她取的，这不符合史实。因为她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之初所写的自传，便署名“江青”（原稿现存在中央档案馆），当时毛泽东还不认识她。

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九至十月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九、十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六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说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的到来，使她欢欣鼓舞。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后一个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

她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样，她离开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那时，王观澜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部、科二级制。陈云、李富春为正、副部长。

王观澜准备与徐明清结婚。他与她是同乡，上中学时认识。王观澜家在临海城里。徐明清家在农村，上中学时进县城。进城后她在女子师范上学，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上学，虽然都在临海县城，但是男女分校，本来不见得会相识。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学包玉珍，是王观澜家邻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认识了王观澜——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后来，王观澜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乡之情，也就越来越接近。一九三七年底，王观澜和徐明清在延安结婚。结婚仪式很简单，当时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顿饭，毛泽东、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都来吃饭，就算是“婚礼”。

结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党校学习，恰巧班上有个男同学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谁喊了一声“徐明”，两个徐明一齐答应。哪儿寄来一封给徐明的信，两个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为了区别于那个“男徐明”，王观澜给妻子的名字加了一个字——“清”。王观澜说：“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明又清，多好！”从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对笔者说：“现在，有的书上说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组织上调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组织部报到时，介绍信上写的名字也是徐明。我的改名，中央党校的同志们都知道的——因为两个徐明在党校曾传为笑谈。……”

徐明清在中央党校学习期满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妇女科副科长，科长为长征女干部张竞秋。后来又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

进延安之后，江青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找过徐明清。她们之间，仍叫惯了“一冰”、“李鹤”。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江青初到延安，领导上为了考验她，曾派她到农村做调查工作。那时，陕北农村中流传着顺口溜：“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汤，臭虫称大王……”这顺口溜形象地勾画出当时陕北农村生活的艰苦。来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陕北农村的表现还算可以。

为了审查江青的历史，组织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当时为江青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关部门。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临海、西安跟江青的接触，如实写了江青的情况。诚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历史问题时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党的关系，是实事求是的。”

这就是说，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十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不过，黄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达山西太原，向周恩来、刘少奇、彭真汇报工作，十一月进入山西五台县（太原东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台之间，是否曾去过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过延安的话，则正好是十月。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黄敬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

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浙江绍兴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九、十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以解决。这样，她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员

江青离开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东郊桥儿沟。那里一座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堂，如今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所在地。中共党校的学员，一律都是中共党员。进入党校学习，意味着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中共中央党校最初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在红都瑞金成立。

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到达陕北时，中共中央党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董必武为校长。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二月，中共中央党校迁入延安桥儿沟天主堂。五月，罗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这年十一月，当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学员已多达四、五百人。

据当时的校长李维汉回忆：

“学员不再按原工作性质编班，也不再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十五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

“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党中央也在这里设了一个‘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①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青被编在第十二班，亦即“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

中共中央党校设有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江青到了党校，很快成了活跃分子。俱乐部的主任是李剑白。当时，男“歌星”要算工任重，他唱《大刀进行曲》博得一阵阵喝彩；女“歌星”则是跟江青同班的许明，她唱《松花江上》，催人泪下，由此得了个绰号叫“松花江上”。生活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

据郭潜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嗤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上空忽地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那时的延安，除了蒋介石飞机前来轰炸之外，难得听见飞机的引擎声。

那是一架苏式的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山脚下简陋的机场上。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在那里迎候。

这架飞机是远从莫斯科飞来的，途中曾在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加油。飞机是由苏联驾驶员驾驶的。

从飞机上下来三位要员，即王明、康生和陈云。

王明离开中国已经六年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一起从上海坐船赴苏，十一月七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康生比王明稍晚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陈云则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此时，和王明、康生同机回国。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的。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如前文所述，江青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

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年长十六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二十岁，即一九一八年，那时江青不过四岁。康生在一九二四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二十六岁，而江青只有十岁。即便相识，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

康生在十七岁那年（一九一九年）在诸城和胶县陈家大户陈玉帛之女陈宣结婚，生一子一女。后来来到上海，结识有夫之妇曹轶欧。康和曹，一个抛弃了前妻，一个抛弃了前夫，结合在一起。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三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李维汉这么回忆：

“我离开中央党校后，即由康生接任校长。一天夜里，他把我找去，说：‘你应该办移交！’我说：我不知道是你来作校长，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现在就可以交，印章和文件在校长秘书罗青长手里，教务处是王学文管的，管财务的有五人小组，每月开支由小组审查签字，有问题再找我。康生没有纠缠，说：‘不必另办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来了。这就是我在中央党校最后的工作。以后听说，康生一进学校就宣布罗迈（引者注：即李维汉）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八章 趁虚而入

初识毛泽东

关于江青如何结识毛泽东，曾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

传说之一，是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

这一传说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徐明清不是跟江青一起进入延安，而是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月才到那里，不可能在“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去见毛泽东。

另外，笔者在采访徐明清时，她说她没有带江青去见过毛泽东。虽说王观澜跟毛泽东颇熟，去见毛泽东时不可能随便带一个陌生人同去。

传说之二，是上海《文汇报》前总编徐铸成的《萧桂英进宫》一文：^①

^①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我有一位朋友，是中共的老党员，抗战初期就在陕北打游击。他说，他在延安住过的那段时间，曾有幸看过那位过气影星的京戏，演的是《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萧恩的是解放后主持戏改工作的阿甲（十年动乱中大受批斗，可能这也是“罪状”之一）。据说这两个。旗鼓相当，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为秀丽。

据说，也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出戏，她跳进龙门，受了特达之知。据说“明皇”那天也去参加晚会，看了这出戏大为激赏，很鼓了几记巴掌，这就使台上的桂英大为感动，大受鼓舞。她灵机一动，第二天即去找那位‘李芝英’，说是自己对文艺问题，有些心得，想当面求教于“导师”；“李莲英”也看到这是他讨好国宠的好机会，三方心里相投，一拍即合。从此，就‘一朝进入深宫（其实是窑洞）里……’。

徐铸成所说的“过气影星”，就是江青。“李莲英”，则指康生。

跟江青同台演出的阿甲，本名符律衡，江苏武进县埠头镇人氏。他自幼酷爱京剧，亦喜绘画、书法。教过书，做过工，当过编辑。一九三八年初，从山西临汾进入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不久，担任鲁迅艺术学院评剧研究团团团长，和江青同台演《打渔杀家》。据云，演出时康生为江青敲边鼓。

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陈绍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被糟踏了的人》。

陈绍禹即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飞回延安的，欢迎晚会当然也就在此后数日。然而，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是由崔鬼编导的，他在一九三八年春才进入延安，不大可能在欢迎王明的晚会上演出《被糟踏了的人》。

崔鬼也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同乡，而且又同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同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他进入延安后，参加了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成为中共培养文艺干部的学校。首任院长为毛泽东，后来由吴玉章、周扬担任院长。崔鬼编导的话剧《被糟踏了的女人》，由江青演女主角。崔鬼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中共。还有一种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看江青主演的话剧《锁在柜子里》时，注意起江青。

又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①，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书作者查考，似应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本书作者查考延安资料，查出“七·七”一周年大会，鲁艺演出三幕歌剧《农村曲》，主演为了里；然后演三幕话剧《流寇队长》。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采访翟林椿。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妆。”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

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至于传说之三，那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香港星辰出版社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珠珊著《江青秘传》。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珠珊”^①，即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据朱仲丽告诉笔者，“珠”即“王”、“朱”也，由王稼祥和她的姓组成；“珊”也是“王”字旁，“珊”乃两人之书也。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采访。

《江青秘传》中这么写及毛、江初识：

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地方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许多平房；最近又添建了新屋和新窑。学员们全是中共党员，来自国民党地区、各个根据地和各方面军。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流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一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酗酒大醉殴打成性的逆境；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

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沸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来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而江青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

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在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以朱仲丽的说法比较准确，即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之后，曾短期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据当时曾与江青共事的钟华女士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告知笔者：

“原厅长徐特立调中央工作，新调来的厅长是陈正人。陈厅长到职不久，又来了一位女干部，即是由蓝苹改名的江青。她来后不久，就到延安县去视察教育工作。当时听说她是个老党员，她下乡时陈厅长还照顾她给个毛驴骑。回来后她向陈厅长汇报工作时，受到表扬。我当时也认为她这么个从大上海来的明星到延安后很快就下乡，是值得佩服的。因为当时延安乡下卫生条件很差，我下去时都发怵。这说明她刚到延安时还是可以的。没多久她被调走，调走的原因是延安准备成立平剧团，江青会演平剧（京剧）”

“趁虚而入”的机会

走笔至此，该写一写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

贺子珍比毛泽东小十七岁——一九一〇年中秋时节，出生在江西井冈山之侧的永新县城，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她的奶名叫“桂圆”。父亲贺焕文曾花钱捐了个举人，当过江西省安福县县长。

贺焕文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之后，贺焕文娶广东梅县姑娘温土秀为续弦。温氏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受哥哥贺敏学影响，贺桂圆、贺银圆也分别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

贺桂圆自取了“自珍”之名，意即“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填表时，别人误写为“子珍”，也就用“贺子珍”为名。

贺银圆改名“贺怡”。

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调往江西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这年八月，她随哥哥贺敏学和王佐、袁文才一起上了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在会见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首脑们时，惊讶地发现，内中居然有一位瓜子脸、大眼睛、挎着盒子枪的十七岁姑娘——贺子珍！

在共同的战斗中，毛泽东跟这位俊俏的江西姑娘产生了爱情。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谭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回忆：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①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

此后，贺子珍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

后来，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嫁给了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贺怡最初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结婚，翌年八月解除婚姻关系。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和毛泽覃结婚，当时毛泽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贺子珍和毛泽东婚后，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参加工作。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当时战争正忙，出生不久，只得寄养在龙岩一户老百姓家中，给了十五枚银元作抚养费。后来，贺子珍托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龙岩寻访，据告，孩子已不在人世。贺子珍得知，泪流满面。

第二个是儿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长汀，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贺子珍把毛毛交给毛泽覃、贺。冶夫妇，因为他俩当时被留在江西。毛泽覃把毛毛寄养在瑞金一个警卫员家中。后来，毛泽覃在一九三五年四月阵亡，毛毛亦不知下落。

第三个孩子也是儿子。一九三三年早产，由傅连璋接生。这孩子没有成活。

第四个是个女儿。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生于贵州，生下后就送给当地老乡，以四枚银元为抚养费。后来渺无音讯，不知是否成活。

第五个也是女儿。一九三六年冬出生于陕北保安，是唯一成活的孩子。孩子小名“娇娇”。那是因为她出生时又瘦又小，邓颖超抱着她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也就称她为“娇娇”。一九四八年，当她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名“李敏”。

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贺子珍希望不要再生孩子，希望参加工作、学习。娇娇才四个月，就被托养在老乡家去。贺子珍来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待着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她在“抗大”过着集体生活。

这时的贺子珍，显得精神振奋，心境愉悦。

一场意外的打击朝她袭来：她在长征中生孩子，失血太多，而营养又严重不良，从此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回，她晕倒在“抗大”的厕所里，不得已被送回家中。

回家休养后，又发生了两桩令她不快的事：

一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进入延安采访，多次访问了毛泽东。史沫特莱带来一位女翻译，名叫吴莉莉。采访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引起贺子珍的误会，对那位女翻译十分不满。

关于吴莉莉之事，李德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①中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①李德，《中国纪事》（一九三二——一九三九），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〇年版。

一九三七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引者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

位妻子。最初的妻子叫萧月华，在瑞金跟他结婚，并一起长征到了延安）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在一九三八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由康生（引者注：应为黄敬）介绍她入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

李德回忆录中提及的“吴莉莉”，史沫特莱称她为“章莉莉”。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序曲》中，这么写及章莉莉：

第一天他（引者注：指李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提及的“章莉莉”，以及李德提及的“吴莉莉”，其本名叫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生于一九一一年。她的英文名字为 Lilg，被译为“莉莉”或“丽丽”。她并未加入中共，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时，她在西安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三七年初赴延安考察，并客串表演戏剧，又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

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

再说，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办”，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趁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十一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她终于搭上了飞机，飞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在那里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在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仍给她发过电报，去过信，劝说她回延安。可是，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并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①。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①关于“三流演员”，如果说胡蝶、阮玲玉、赵丹是一流，俞珊等算是二流，那么她算是三流也恰如其分，特别是新电影而言，她还没有主演过一部有影响的电影。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

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深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此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教师。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得到重要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

“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二十四岁的江青，终于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一九三八年秋”。朱仲丽说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①，该书记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

①《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支黑乌鸦（引者注：指日军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塌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塌，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去吃晚饭。她在路上见到

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①。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

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有些关于江青的传记称江青进延安后便入“鲁艺”，那是不确的。“鲁艺”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开始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房子。后来迁至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迁往延安东郊十余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址。

据现存的《鲁艺通告》载：“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在《鲁字第十二号通告》上，记载着该校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在“教务会议”及“训育会议”的参加者名单中，有江青。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一九四〇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生了女儿李讷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〇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〇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九章 红都主妇

第三次面临审查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①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大江南北》杂志。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①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宣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〇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①一九九〇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来往。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①（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采访于北京。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

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①：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②此处似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③，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③此处指王弢，当时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在天津工作，改名王林。王弢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弢介绍加入中共的，因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一九七七年十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扭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高手。

午后，我去服伺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

“唉，江青是我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一些。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一阵儿心事，冒一两句。“我跟你讲，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非常形象地勾画出当时的情景。

江青无法求助于毛泽东，就求助于她的那位同乡——康生。

康生这人，向来心狠手辣。他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可是，他对江青却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

康生又一次保江青过关。用朱仲丽的话来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后来，康生甚至把谁告发她、告发些什么事情，都告诉了江青。当江青“露峥嵘”的时候，那些曾经向中共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也就一一受到了狠狠的报复。

变娇变骄了

生了女儿李讷，又过了政治审查大关，江青的地位日渐巩固，日益得意起来。小心翼翼的“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了。

她开始呵斥身边的小保姆。

她在屋里装了电铃，动不动按电铃，支使公务员、警卫员做这做那，服侍她。

她对伙食要挑挑剔剔了，关照炊事员该这么做，该那么烧。

她越来越娇，也越来越骄。

她不再那么“腼腆”。她像得意的“公主”一样，出现在延安的舞会上。她不论地面如何高低不平，总是能够保持优雅、熟练的舞姿。这时，她成了全场的注意的中心，人们在悄悄议论着：“哟，你瞧，到底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她显得益发得意了。

她喜欢骑马。本来，她不会骑马。正因为这样，她在从西安到洛川途中，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她不得不骑马时，显得神情异常紧张。如今，她把骑马当成一种很好的消遣，喜欢在延安招摇过市。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哟，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睽睽聚焦的目标一样。

周恩来的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在众多的照片上，周恩来总是曲着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坠马所致。坠马之际，江青在侧。

关于周恩来坠马，有着种种传说：

其一，“在延安，有一次江青要跟着周恩来出去。一条狗突然从路边窜出，吠叫着扑过来。江青惊慌失措，拨马便逃。那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她的马撞到周恩来的马上，周恩来一头摔下来，右臂就摔断了。在延安医治无效，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①

^①一九九〇年二期《啄木鸟》。

其二，“有一天下午，周恩来要去党校上课，江青建议毛泽东让她一块去。她想骑马，也可能想让听众看到她同周恩来一起来，她认识毛泽东之前，在那里是谁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两人骑马回来时，周恩来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后紧跟。比周恩来小十五岁的江青（引

者注：应为小十六岁）不像周讲了那么长的课很累，图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来坐骑的后蹄。周的马直竖起来，把中国未来的总理摔在硬实的地上，右臂折断，落了终身的缺陷。”②

②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其三，“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地回到了延安。周说毛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她有关。”③

③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其四，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第二十四章《到苏联疗伤》载，周恩来坠马，是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着牙关。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这一段记述，是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蒋泽民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当时在场的另一警卫人员王来音一九七九年六月口述材料而写成的。这一段记述，没有提及江青。

其五，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笔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了该馆研究人员米世同。他在此馆工作多年，据他回忆，一九六五年成仿吾回延安时，他曾问及关于周恩来惊马事。成仿吾的回忆，谈及一些重要史实，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更准确些：

周恩来惊马，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他去中共中央党校，为的是给“华北联大”师生送行。

“华北联大”即华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该校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等部分师生组成，共约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决定，该校到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因此，该校一宣告成立，师生们便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七月七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华北联大”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泽东前去作报告，号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七月十日，周恩来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西北处小沟坪。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都住在杨家岭。杨家岭离小沟坪不远，中间隔着延河。

那时，延河水涨，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带着警卫员，过了延河。过河之后，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恩来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达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警卫员火速前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当夜，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至翌日毛泽东气消，她才敢回去……

成仿吾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可供参考。他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

除了喜欢跳舞、骑马之外，江青独自在家时，抽起烟来。她在上海时，已经会抽烟，不过偶尔抽抽。这时，遇上烦闷之际，她便抽烟，只是不大在人前抽烟，因为当时陕北年轻女人很少抽烟的。

江青并非“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个性倔强。在“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之后，她渐渐显露“本色”，不再对“老板”言听计从了。那时，她在陕北，一直称毛泽东为“老板”。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跟毛泽东发生口角。

本来，夫妻之间，意见不一，争几句、吵几句，也不足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顾场合，在工作人员面前，跟毛泽东争吵。毛泽东毕竟是领袖，江青这样哗啦哗啦地当众吵架，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时，毛泽东会大喊一声：“闭嘴！”一听这话，江青才收敛了一些。

最使毛泽东不悦的是，她骂他“土气”、“土包子”。其实，这句话倒是反映了她灵魂深处对延安的鄙视，她还是向往上海那十里洋场的“明星”生活。

在充满“土气”的陕北生活了将近八个年头，江青终于有机会重返那灯红酒绿的所在……
借牙病飞往重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半，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热闹非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前来机场接客的人是经过周密研究的。内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傅学文、陈诚等，也有民主人士，有郭沫若、章伯钧、张澜、谭平山、左舜生，还有那位沈钧儒……几十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摆弄着照相机镜头。

下午三时半许，一架银色专机从天而降。舱门打开之后，一位穿着蓝灰色中山服、个子魁梧的人物，手持白色巴拿马帽，挥动着，向人们致意。

“毛泽东！毛泽东！”他的出现，使机场沸腾了。

陪同毛泽东一起由延安飞往重庆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先生，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此行，为的是和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史称“重庆谈判”。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山洞林园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洗尘。

宴会结束之后，毛泽东便下榻于林园。

林园有三楼三底的西式房子四幢。毛泽东住在二号楼。蒋介石也住在林园，跟毛泽东比邻而居。据云，为的是便于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重大政治活动，与江青无干。可是，她竟在毛泽东去重庆之后，也去重庆了！

江青去重庆的借口，乃是“牙疼”。她的龋齿发炎，这本是小毛病罢了。不过，“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她哼哼唧唧不已，非要去重庆治牙病不可。毛泽东总算同意了，只是说好了条件，即在重庆不能公开露面。

于是，她搭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带着女儿李讷，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在她来到重庆时，毛泽东已从林园迁至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而江青则和李讷一起住在张治中家桂园。她，“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里出来的人，是一位标致的青年妇女。”虽说她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毕竟引起张公馆里知道内情的人的注意。她结识了张治中夫妇，逗着张治中的四小姐张素秋玩。”

在重庆，她的身份当然瞒不过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她逢人便要指指牙齿，说自己是为治牙病而来，似乎也生怕别人议论。

她在重庆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毛泽东成为万众注目的人物，成为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她感到她的地位随着毛泽东而猛然升高，已成为中共“第一夫人”。特别是听张治中手下的一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使她兴奋了好几天；遗憾的是，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尽风头，而她却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出现在记者们那照相机镜头前。

她当然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

一个多月前——七月一日至七月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六位参政员，即褚辅成、黄

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博斯年，由重庆飞往延安参观、访问。内中的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一见江青，被毛泽东婉拒。

左舜生此人，跟毛泽东同庚，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左翼团体，李大钊为会刊《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左舜生为评议部主任。不久，内部分化，左舜生倒向右翼，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一九二五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一九三〇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他和崔万秋颇熟。一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他是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参政员访问延安的。

从延安归来，左舜生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①，内中谈及希望见江青一面：

^①左舜生著，《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引者注：即李讷，当时五岁）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然而，江青却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唐纳拒见江青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②

^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一九四二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虽和陈珊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千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天苍苍，海悠悠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唐纳和陈璐在沪生下了儿子红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唐纳离沪赴重庆。

陈璐和红儿留在上海，据云陈璐改嫁盐商。一九四八年，陈璐曾在《国魂》一片中担任角色。

《国魂》由上海永华公司出品，吴祖光编剧，卜万苍导演。

据夏其言告诉笔者。解放后陈璐曾带红儿找他，求他看在老朋友唐纳的面上，给红儿安排工作。夏其言把红儿安排在《文汇报》资料室工作。后来。转到了安徽工作。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一九四四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村晋用》一文报导：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不过，另据报导，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事情会是那么凑巧：在电影《中华儿女》中演刘二嫂一角的，正是康健（演刘二哥的是赵丹）。

《中国电影发展史》版，把康健误为蓝苹，以至造成蓝苹经重庆进入延安的误传。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

“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矶）回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借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会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①

^①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

“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引者注：指江青），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引者注：应为重庆谈判时），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①

^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一九八八年六期《书林》。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

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谈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另外主人给他介绍别人。”②

②陈纪滢，《巴黎幸遇唐纳》，台湾《传记文学》四十五卷六期。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照着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萍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事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写信慰问赵丹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一架从延安飞往重庆的飞机，由于气象恶劣，中途临时降落在西安。翌日，才飞抵重庆。

飞机上坐着周恩来。他是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由重庆飞抵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然后又返回重庆。回重庆时，周恩来的专机上多了一位临时搭乘的乘客，那便是江青。

又是借口牙病，江青再度飞往重庆。

这一回很高兴，她得知郑君里在重庆，打电话约见他，郑君里倒是来了。

从郑君里的谈话中，她得知赵丹不久前离开重庆到上海去了。她未能见到赵丹，感到颇为遗憾。

赵丹，跟她同台演出过话剧《娜拉》，也同台演出话剧《大雷雨》。在《娜拉》中，赵丹演娜拉的丈夫赫尔茂，而在《大雷雨》中，赵丹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卡塞琳娜一角由蓝苹饰演。在举行六和塔婚礼时，唐纳和蓝苹、赵丹和叶露茜，是三对新人中的两对。

当蓝苹奔赴延安之后，赵丹和叶露茜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队长为应云卫，队员有郑君里、徐韬、王为一、沙蒙、顾而已、朱今明等。演剧三队四处宣传抗日救亡，从上海沿沪宁线到苏州、镇江、南京演出，又溯长江而上，到武汉演出。一九三八年，赵丹来到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华儿女》一片的拍摄。

一九三八年四月，社重远出版了《盛世才与新疆》一书。赵丹读了这本书，以为盛世才真的“开明”，真的“思才若渴”，便和叶露茜商量去新疆，还打算从那里去苏联莫斯科。

这样，一九三九年六月，赵丹、叶露茜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以及电影界人士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一起取道兰州，前往迪化。

出乎意料之外，一九四〇年五月，赵丹和徐韬在迪化突然被捕。原来，盛世才并不那么“开明”！

叶露茜被迫从迪化返回重庆。等待三年，赵丹渺无音讯。道路传闻，赵丹死于迪化狱中，重庆各报纷纷载赵丹友人悼念赵丹的文章。

在极度痛苦之中，叶露茜得到桂苍凌的同情。他是江西庐山人，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加入中共，翌年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然后去日本留学。一九三七年回国后，仍从事左翼戏剧活动。单身的他，和叶露茜结合，南下云南昆明。桂苍凌，后来以笔名杜宣闻名。

一九四五年四月，赵丹在被囚五年之际，终于获释。他来到重庆，知道妻子改嫁，追往云南……无奈，他已晚了一步！

赵丹返回重庆不久，便去上海，主演《遥远的爱》。

就在这时，江青再来重庆。她从郑君里那里得知赵丹不幸的经历，便修书一封，寄给上海赵丹，表示慰问之意。

江青此信，在二十年后，惹出一番意想不到的风波。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香港《大公报》刊出唐琼的《江青给赵丹的一封信》一文，讲述了内中曲折传奇的故事：

江青写的信，简直是定时炸弹，时效可长达三十年之久。

江青为了找回她三十年代给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几封信（引者注：江青给赵丹的信写于一九四六年），不惜以权威的特务手段，抄他人之家，并先后迫害郑君里、顾而已致于死命，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自缢于奉贤干校，赵丹曾名列抄家对象第二号。

最近看到袁鹰的《写在送赵丹远行归来》那篇悼念文章，才第一次知道江青曾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写给上海赵丹的一封信，并且即登在上海的报纸上。

袁鹰说，一九四六年春，他初次当记者（引者注：二十二岁的袁鹰当时任上海《世界晨报》记者），有一天，总编辑安排他访问赵丹，他俩在 DDS 咖啡馆畅谈了一下午。赵丹从三十年代初上银幕，讲到抗日的号角声中走向大后方，从新疆的五年铁窗生活讲到回重庆，又回上海。他对我这个小记者虽是初次见面，却一点也不见外，娓娓道来，如叙家常。

就是在那个咖啡馆，赵丹顺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那是江青不久前从重庆寄给他的信。袁鹰忽然想起这件事后，描述道：“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和工作，对他在新疆的遭遇表示同情，祝福他愉快、成功云云，信是写得够动人的……”他曾在访问的稿件中，引用这封信的全文。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六年，这封信使赵丹吃了不少苦头。办案人员拿着那张剪报，恶狠狠地地质问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这是什么政治阴谋？要老实交代。

他俩重逢（一九七七）后，提起往事，赵丹指着袁鹰的鼻子说道：“幸亏我当时完全忘了，要是我想起来，坦白交代，你可要更加触霉头了。”

江青写给赵丹的信，究竟什么内容？《世界晨报》不易查找，笔者倒是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查到了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全文。

编者为此信加了标题《蓝苹致书慰问赵丹》，副题为《从坏处想到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

编者加了一段按语：

“毛泽东夫人江青女士，战前以蓝苹的艺名蜚声于上海艺坛，她在电影方面曾演过《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现在还留在观众的脑际。在《大雷雨》中，赵丹便是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极博好评的。”

以下是江青给赵丹的信的原文：

阿丹：

世界上是有着许多不合乎人们主观愿望的现实，这次，我满以为会看见你，可是恰巧我来不久之前，你离开这雾的山城，君里告诉了我一点你的情形，还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从照片上看还是那么天真热情，几年的苦难没有磨掉，这点是可贵的，也是朋友们高兴的。早些年当你知道你们去了这样一个地方（引者注：指去新疆迪化），我真觉得奇怪，不久又听到你们受难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为你们着急担忧，据我知道，能够营救的方法，朋友们是都用了，可是，后来我们绝望了，我觉得黑暗将你们吞没了。去年无意间听一个朋友说，在一个宴会上看到你！我不信，而这个朋友又不认识你，无法证实，结果问了别人，才知道真真是你，并且仍然在工作着，这多么叫朋友们高兴啊！

对于你这次苦难，过去为你着急而且惋惜，现在则又替你欢喜，不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你增加了这份人生的经验，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添了一份财富，从坏处想好的方面，人会愉快的，朋友，你说对不？

我这次来重庆是专门为了治牙病，几天之后我就回去。我希望将来看见你的时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创造，你有比以前更加年青与坚强的工作精神，并祝你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共同奋斗的伴侣！

紧握你的手！

江青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夜

其实，就江青写给赵丹的这封信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公之于众的，发表这封信，并无“政治阴谋”可言。二十年后追究赵丹“为什么要把江青的信登在国民党统治的报纸上”，其实大可不必。

关于江青两次去重庆，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曾回忆道：

“江青两次去重庆，不知买了些什么，竟花了几百万法币来报销，我坚持不批。江青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说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只要她讲清买了什么。当时，毛主席就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大。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下子掀翻桌子，拂袖而去，边币撒了一地。……”

另外，笔者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东南日报》上，见到一署名江青的诗《收获的季节》。此江青是不是彼江青，不得而知。照录于下，供读者鉴别：

收获的季节

江青

我坐在田野的樟树下，

成熟的稻禾呵

款待我以最后的芳香……

我眷恋地环顾四周，

我的友人们都忧郁地低垂着头，

在蒸热的傍晚的微风里，

悲哀地摇拽着而沉闷地叹息：

“啊，不久我们就要离开

这阳光与土地，

不久我们就要离开呵

我们的诚恳的友人

温情的眼睛与手臂，

不久我们就要填进粮户的仓库呵

那深邃的黑暗的囚牢……”

农夫踏着迟重的脚步来到田里了

他也是忧郁地低垂着头，
被太阳，风和雨，
改变了颜色的笠帽下，
棕色的，瓦罐一样的脸
半边涂着夕阳，
额上，深刻着长久忧愁的褶皱……
他悲凉地疼惜地叹息着，
棕黑的宽大的手掌满握着禾穗……
啊，收获的季节稻禾是忧郁的，
收获的季节农人也仍然忧郁……

江青从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飞回延安之后，没有再去重庆。那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发生的突然事件，吓坏了她！那天，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以及获释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从国外开会归来的邓发，同乘一架运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十二点半，途经兴县时，撞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黑茶山上，全部遇难……江青庆幸她早已回到延安，没有搭乘这一班飞机。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国共谈判终于破裂，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被炮火撕毁。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内战全面爆发。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延安上空出现成群的飞机，机翼上漆着青天白日标志。炸弹倾泻而下，浓烟冲天而起。延安结束了平静。

屈指算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已经近九年。这九年的生活虽说是艰苦的，但毕竟是安定的，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平静地度过。说实在的，江青进入延安以来，还没有经受过战火的洗礼。就在国民党的飞机涌向延安的那一天，胡宗南部队的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人，分两路朝延安发起了攻击。

炸弹在毛泽东窑洞附近爆炸，猛烈的气浪朝窑洞袭来，震碎了门窗玻璃，把家具震得吱吱咯咯响。毛泽东毕竟久经战火的考验，对于隆隆飞机、轰轰爆炸声，置若罔闻，依然在窑洞里工作着。江青带着李讷躲进防空洞，大声地唱着歌，借歌声壮胆。

面对胡宗南部队的强大攻势，毛泽东避其锋芒，于三月十九日放弃延安。从此，江青跨上马背，随着毛泽东开始过着动荡的战争生活。

这时，由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为两路。刘少奇、朱德率一部分中共中央委员进入晋察冀解放区，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受中共中央委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则留在陕北作战，组成中共中央前委。

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如前所述，意即“离得胜”。

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任弼时化名“史林”，取“司令”的谐音。陆定一化名“郑位”，取“政委”之谐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每逢行军休息，周恩来总是活跃人物，他会用外国人讲中国话的腔调讲“吃花生仁不吃花生皮”，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江青已是主席夫人，不再当众唱一段，倒是出谜语给大家猜。七岁的李讷在江青的熏陶下，此刻成了“名角”。李讷会唱京戏，来一段《打渔杀家》，一派江青风度，会博得一片掌声，连毛泽东也夸奖她：“讷讷成了我们陕北小名旦罗！”江青呢，在一旁用嘴哼《隆格里格》，用这“口琴”代替京胡，为李讷伴奏。听见毛泽东夸李讷，她得意地笑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带着孩子行军诸多不便。毛泽东和江青商量，让李讷随着中央机关一些家属、子女一起，东渡黄河，到山西去。组织上安排李文芳照料李讷。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致长子毛岸英的信中，这么写道：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引者注：即毛泽东次子毛岸青，当时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这里提及的李讷“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便是指李讷托寄在山西。李讷画的画，使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中得到欣慰。

毛岸英是一九四六年从苏联回到延安的。他随中共中央宣传部撤离延安，来到陕北瓦窑堡一带。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江青的职责仍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有一次，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靖边县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十几户人家，贫农薄老汉腾出两间半窑洞，其中一间给毛泽东和江青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要开会，只能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毛泽东要江青避开，因为这个会议是军事会议。江青不得不搬到别处去睡，被臭虫叮得浑身又红又痒。江青憋了一肚子气。在她看来，要她搬出去，要她回避军事会议，无非是那“约法三章”在起作用。

对这类事，江青非常敏感。有一回，毛泽东起草好一份电文，她想看一下，毛泽东当即收了起来，使她颇为难堪。

在不断的宿营、行军、再宿营的流动生活中，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总算得到暂时的安定，一直住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

杨家沟也是一个小村庄，但是比王家湾要大，二百来户人家。看中这个小村，是因为小村不靠大道，来往的人不多，不易暴露目标。另一桩原因，是小村里有个“扶风寨”——地主庄院。这“扶风寨”在陕北那穷山沟里，是难得的“豪华型”窑洞。屋外，一排玻璃走廊，颇有气派。屋里，那窑洞四壁，竟漆着浅绿色油漆！那炕的四周，居然还雕龙刻凤……毛泽东和江青，就被安排住在“扶风寨”里，住了四个月。这个连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小村，一时间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一九四七年底，就在这个“扶风寨”，中共中央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毛泽东反反复复，改了好多回。最后交给江青誊清。毛泽东关照她在誊抄时，要做到“五不”，即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这清楚表明，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份报告，以求付印时不错一个字。这篇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确实，这篇报告极为重要。毛泽东指出，中国已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在这里，毛泽东把蒋介石称为“匪帮”了，毛泽东笑谓，蒋介石咒骂共产党为“共匪”，骂了那么多年，一次又一次地“剿匪”，如今轮到“原物奉还”，称“蒋总统”为“匪”了！

毛泽东断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确实，毛泽东已稳操胜券。此后，才一年多时间，中共便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城南庄的惊险一幕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离开了米脂县杨家沟。江青随行。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乘汽车来到了山西兴县城西十五里的蔡家崖村，那里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司令员贺龙热情欢迎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住在蔡家崖一座大院里。这时，毛泽东的卧室里，放着一张单人沙发——在那样的小村子里，沙发是稀罕之物。据云，是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的。

四月一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对干部们讲话，这便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四月二日，毛泽东在蔡家崖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即席作了讲话。据当年《晋绥日报》编辑纪希晨告诉笔者，他当时正好坐在毛泽东左边，作了详细的记录。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根据纪希晨的记录整理而成的。

四月十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从山西进入河北西部的阜平县，住在城南庄。江青和他住在一起。在那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会议，开了十天左右。就在会议不久，发生了一桩重大的意外事件，差一点使毛泽东遭到谋害，江青也受了一场惊恐。后来，在“文革”中，江青无端嫁祸于聂荣臻……

由于这一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的缘故，所以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卫士阎长林在《毛泽东生活散记》^①一文中，李银桥在《卫士长谈毛泽东》中，都谈及此事。当然，由于事隔多年，彼此的回忆有些出入。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夜里，毛泽东起草通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清晨，毛泽东工作毕，卫士李银桥给他服了安眠药，照料他就寝。这时，江青正起床，她住在毛泽东隔壁房间。聂荣臻也起床了，散步回来，遇上江青。聂荣臻住在后面的一排房子里。毛泽东刚刚入睡，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声。这里离北平不大远，跟延安不同。在陕甘宁边区，敌机一入境，马上用电话通知延安，那里老早就拉空袭警报。而这里只能在看见敌机时才拉警报，听见警报声时敌机已光临了。

卫士李银桥和警卫排长商量着“该不该叫醒老头”。他 OJ 背地里称毛泽东为“老头”。叫他吧，他刚睡下，说不定为了喊醒他而发脾气；不叫他吧，敌机突袭，情况紧急。

他俩犹豫不决，便向江青请示。正好，聂荣臻也派范秘书来。商量的结果是不叫醒毛泽东，而是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找了一副担架放在毛泽东门前。一旦情况紧急，马上把他从床上放在担架上，抬往防空洞。

空中出现三架敌机，兜了一个圈子，走了。

其实，这三架是侦察机。到了八时多，警报又响了，来的是轰炸机。

卫士们也摸透敌机的脾气，知道这一回来者不善，也就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倒很坦然，一边穿衣服，一边还要抽烟。

“快快快，走走走！”听见敌机轰鸣声越来越响，江青尖着嗓子喊叫。

毛泽东仍要吸烟。这时，阎长林、李银桥、石国瑞、孙振国四卫士不管三七二十一，架起毛泽东往外跑。

聂荣臻也赶来了，指挥大家去防空洞。

他们刚出门，脚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颗炸弹一齐落在毛泽东屋前。只是炸弹没有爆炸，

尾部的陀螺在飞快地旋转着。

毛泽东回头，要看看那炸弹。卫士们簇拥着他朝防空洞迅跑。

这时，又是一批炸弹扔下来。这一回炸弹猛烈爆炸，把毛泽东住的院子炸得黑烟冲天。

如果毛泽东晚一步离开那里，那就有性命危险……

事后才查清，最初丢下的三颗炸弹，幸亏是“哑弹”——国民党兵工厂里的工人不满于国民党，往炸弹里装了沙子！

事后才查清，城南庄潜入了国民党特务，名叫孟宪德，当时担任军区后勤部所属的大丰烟厂副经理。在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前，孟宪德已在那里。他最初想谋害聂荣臻，就收买了军区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只是未得机会，刘从文没有把毒药撒在小伙房军区首长们的菜里。”

这时，孟宪德得知毛泽东住进城南庄，就把毛泽东住房的方位密报保定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迅速送往北平，敌机就前来轰炸毛泽东住房……

此案被破获后，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公审大会，宣布当场枪毙孟宪德、刘从文。

江青明知是国民党特务作案，事隔二十年，在“文革”中却诬指聂荣臻“谋害”毛泽东，欲置聂荣臻于死地……

不过，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笔者在一九八九年采访陈伯达时，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

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

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便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他被突然押送秦城监狱时，他在监狱门口大呼“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狱警不知他做过什么“好事儿”，向上汇报，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记起阜平城南庄的一幕，陈伯达当年为了救他确实做过“好事儿”。毛泽东关照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宽待陈伯达，因此陈伯达在那里生活上得到特别优待，吃得比家里还好……

由于在阜平县城南庄发生那意外事件，毛泽东随即迁往阜平县花山村居住。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迁往平山县西柏坡。江青也随毛泽东来到那里。

在西柏坡，毛泽东紧握着刘少奇、朱德的手——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

到达西柏坡的第四天——五月二十九日，周末，西柏坡的打谷场上举行欢迎舞会。

入夜，在汽灯的照耀下，毛泽东跳得很开心，江青成了打谷场上最活跃的人物。几百个人围在打谷场四周看热闹。

这时，已是国共大决战的前夜。从七月开始，辽沈战役打响。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铺天盖地。毛泽东坐镇西柏坡指挥这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西柏坡这原本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从此载入史册——因为它是继延安之后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一九四八年岁末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下了著名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开头，毛泽东便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第十章 初露峥嵘

飞往苏联疗养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虽然江青通宵未眠，却异常的兴奋。向来很讲究作息规律的她，这一回“规律”完全被打乱了。

江青随着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河北涿县火车站时，已是二十五日凌晨两点。

喷着水汽的火车头，带着七、八节车厢，正在车站待命。虽说江青当年往返于京沪之间，火车没少坐，这一回却头一次乘软卧车厢。上车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滕代远，各占一间软卧房间。

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市，全歼守敌十三万余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毛泽东任命黄敬为天津市市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黄克诚。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傅作义率部起义。

毛泽东的专列，从涿县驶往北平。

一路上，毛泽东也显得兴奋。他说：

“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别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别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①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涿县离北平不远。清晨，专列便驶抵北平清华园车站，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共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已在车站迎候。

毛泽东坐进美国三十年代生产的一辆道奇牌小轿车，直奔北平西郊。从此，毛泽东和江青便下榻于那里香山的双清别墅。

就在毛泽东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五时，毛泽东出现在西苑机场，上万人拥集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在那里检阅了部队。一些外国记者听说毛泽东出现在北平西苑机场，纷纷报道毛泽东“飞抵”北平。其实，毛泽东是坐火车前来北平的。

《人民日报》出版号外《毛主席飞抵北平》。北平震动了。中国震动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最鲜明的标志。

江青也为此而兴奋。这意味着，她已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

进入北平之后，毛泽东加倍的繁忙。他要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他要会见各界人士，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要着手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在这时，就在进入北平一个来月，江青走了，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北平。……

江青上哪儿去了呢？

她带着女儿李讷以及警卫员、护士和一位俄国大夫，坐火车到沈阳，再从沈阳转往大连。在大连机场，一架苏联派来的专机正在等候她。

她要去苏联。她说她身体不好，要去苏联检查。另外，要带李讷到苏联做切除扁桃腺手术。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北平有那么大的医院，那么多的大夫，她看不上眼。她要去苏联看病，借此去国外开开眼界，休养一番。她从未出过国，而那时出国，诱惑力最大的是“老大哥”苏联那里。

她终于得以成行。她第一次坐上专机，尝到了“第一夫人”的尊荣滋味。

到达莫斯科，她被安排住在斯大林在市郊的别墅。离开穷山沟，一筋斗翻进青云里，江青得意极了。

据朱仲丽回忆，江青无大病。苏联医生的检查结果是除了官能性神经过敏之外，没有任何器

质性疾病，用不着住院治疗。于是，她就在苏联疗养院疗养。

李讷做了切除扁桃腺手术，很快就出院，随江青一起疗养。苏联很尊重她，因为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安排她到南方海滨，住进疗养院高级房间。对于她来说，从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到一九四九年春进入北平，在山沟沟里生活了十二个年头。如今，三十五岁的她，可以尽情享受一番，苦尽甘来了。

在苏联疗养期间，江青最为高兴的事，是见到了斯大林。

那是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访问苏联。

斯大林接见了刘少奇，同时也接见了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

在宴会上，江青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见她那么年轻，以为她会怯场。她，演员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高举着酒杯，像朗诵台词一般清楚地说道：“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辞，脸上浮现笑容，说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高举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饮而尽。

贺子珍顾全大局

江青在苏联的待遇，跟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可谓天渊之别。

一九四六年，王稼祥来到苏联治病。他的夫人朱仲丽是医生，陪同他一起去莫斯科。王稼祥的腹部被国民党飞机炸伤，他是躺在担架上进行艰难的长征。

王稼祥到苏联后，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竟被关在远离莫斯科的一个疯人院里！娇娇，也在苏联。

王稼祥跟贺子珍是老战友，听到这消息异常震惊。他随即向苏方交涉，要求会见贺子珍。最初，他得到苏方的答复是：“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于是，王稼祥设法让妻子朱仲丽以医生身份去探望贺子珍，也被苏方拒绝。

经王稼祥再三交涉，苏方才不得不同意把贺子珍和女儿娇娇送来莫斯科。

相见之时，贺子珍热泪纵横，哭诉她的痛苦经历：原来，失去爱子，加上又得知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双重的打击，使她陷入极度苦闷之中。她又身处异国他乡，言语不通，举目无亲，于是形成了忧郁症状。苏方却把她当成“精神分裂症”，把她送进疯人院。贺子珍受此酷虐的另一原因则是由于女儿娇娇。她当时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工作。娇娇来苏联后，生了一场大病，她不能不全力照料娇娇。娇娇还未康复，国际儿童院院长就要她上班。她和院长发生争吵。苏方院长斥骂道，“我把你关到疯人院去！”

疯人院里的生活如同监狱。贺子珍在伊万诺夫市疯人院苦度岁月。她想念女儿娇娇，可是，她却见不着娇娇。无尽的思念和内心的痛苦，日夜折磨着这位当年叱咤井冈山的女红军。

王稼祥的再三交涉，才使贺子珍跳出了苦海，结束了疯人院两年多的囚禁。临去莫斯科之前，娇娇回到了她的身边。

见到被剃成光头（疯人院里的病人一概如此）、憔悴、目光忧郁的贺子珍，王稼祥的心震颤着。她连讲话都结结巴巴，因为在疯人院里多日没有讲话，何况已多年没有人跟她讲中国话。

王稼祥问：“你今后怎么办？”

贺子珍这一句话倒讲得很干脆：“回国！”

王稼祥深深知道，如果她再滞留在苏联，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然而，她又有着她特殊的身份，回国该怎么办？

王稼祥发电报给毛泽东，讲述了贺子珍的情况和要求。

毛泽东迅即回电：“同意回国。”

就这样，一九四七年秋，贺子珍带着娇娇，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来到了哈尔滨。

她回国后不久，苏方把毛岸青也送回来，跟她生活在一起。

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娇娇也给毛泽东用俄文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给娇娇写了回信。怕信太慢，他又加发了一份电报：“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毛泽东派人前往东北，把娇娇接到了西柏坡。

娇娇的到来，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娇娇给贺子珍去信时，总是谈及毛泽东的近况，转达毛泽东的问候。

一九四九年，当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石家庄时，在那里见到贺子珍胞妹贺信。毛泽东曾对贺。治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①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毛泽东没有说清楚“按中国的老传统办”是怎么个“办”法。不过，他表示“让贺子珍到这里来”。

贺怕去东北接贺子珍，打算让贺子珍和毛泽东重逢。她们坐火车来到山海关车站时，被两个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人所阻挠，告戒贺子珍不能去见毛泽东。贺子珍明白，有人从中作梗。

贺子珍在天津暂住。

一九四九年盛夏，江青正在苏联疗养，毛泽东曾指派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往天津，看望贺子珍。阎长林是这样回忆的：

八月初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进办公室一看，娇娇正在沙发上坐着，毛主席先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

我们到天津，来到了市委招待所里。在这里，娇娇看到了她的妈妈。贺子珍同志一见了娇娇，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忙拉娇娇的手，把娇娇搂在怀里。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

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闲谈。贺子珍同志问了毛主席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我也讲了毛主席在战争中遇到的一些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看来，贺子珍同志也非常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贺子珍同志还对我说：“我带着娇娇到苏联去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回来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几句，事后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说到这里，她再也讲不下去了。^①

^①阎长林，《毛泽东生活散记》，《东方纪事》一九八七年一、二期合刊。

阎长林带着娇娇回到北平，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阎长林也谈及了贺子珍对往事的一段回忆之言。

毛泽东听罢，说道：“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这样，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通过娇娇的来往，互通信息，并致问候。但是，“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她已不可能再和毛泽东恢复过去的夫妻关系。

这样，贺子珍后来由天津前往杭州。

一九五〇年，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嫂嫂李立英曾联名给毛泽东去信，提及工作安排问题。

毛泽东意识到这封信的用意，在复函中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这“顾全大局”四字，表明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期求。

于是，贺子珍在杭州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从此，她长期在南方工作、居住——在杭州，在南昌，在上海。她出于对毛泽东的挚爱和真诚，确实做到了“顾全大局”，没有使毛泽东为难。

由于贺子珍顾全大局，江青的夫人地位完全巩固了。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一九四九年秋，当江青从苏联回到北平时，毛泽东已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搬入中南海。

中南海位于北平的故宫西侧。那里有北海、中海、南海三海，中南海指中海和南海。所谓“海”，亦即湖。中海、南海都是人工开凿的。中海开凿于金元，南海开凿于明初。有了“海”，沿“海”建殿阁楼台，湖光激影，风景秀丽，成了皇家禁苑。

北平和平解放后，周恩来曾仔细巡视了中南海，建议选定中南海为中共中央和未来的政务院的所在地。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选择。于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毛泽东迁入中南海丰泽园。丰泽园在南海之畔，建于康熙年间，原是康熙及其后的皇帝讲礼的地方。

江青带着李讷到了北平，小轿车接她直奔中南海。她平生头一回进入风光秀丽、曲径通幽、古色古香、绿树掩映的当年皇家禁苑，如入画中。进入丰泽园，跨过三座汉白玉石栏杆桥，一座坐北朝南的朱红小院便出现在眼前。那里叫“颐年堂”，如今成了毛泽东召开核心会议的地方。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常在那里跟毛泽东碰头。

从会议室往东，穿过一条小走廊，那便是当年皇家的“菊香书屋”。

北平刚解放时，第一个住进菊香书屋的是林伯渠。

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林伯渠住的是北屋。不久，东屋和南屋分别安排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临时休息之处——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住在北平香山，每天进城办公，在此休息。五月，当毛泽东正式迁入中南海，整个菊香书屋都安排作毛泽东住所。从此，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定居，直至一九六六年八月。

毛泽东住在北房东头的两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卧室。

江青被安排住在北房西头的两间屋里住。她和毛泽东的住房之间隔着一间门厅。

东房五间，中间的一间也是门厅，成为毛泽东一家的餐厅。东房靠北两间是办公室，靠南两间是会客室。

西房五间，中间一间是过道。南头两间是值班室和工作人员办公室。北头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

南房五间，中间一间是穿堂。其余四间是毛泽东子女住房。

菊香书屋四面二十间屋子，构成四方形的封闭小院。中间的院子里铺着草坪，种着树，南北、东西两条小路从院中央穿过，交叉成“十”字。把院子变成“十”字。

菊香书屋是老房子，红漆斑驳。毛泽东叮嘱行政部门，不必重新油漆，只是打扫了一下，就搬了进去。只是院内原本没有厕所，没有暖气设备，行政部门在那里建造了卫生间，安装了取暖锅炉。

虽说菊香书屋无法跟斯大林的别墅相比，但是比延安的窑洞毕竟好多了。江青住进菊香书屋，在北房跟毛泽东相对而居，这意味着她完全是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不必担心由于贺子珍的回国而造成对她的夫人地位的威胁。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开始，北平恢复原名北京。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此后不久，江青受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公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具有崇高的声望。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当她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一起去欢迎她。十月一日，她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十一月，宋庆龄因事要从北京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显然，江青是很恰当的人选，因为对方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前去送行。江青兴高采烈，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执行此次公务她“代表毛泽东”，亦即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在社会场合露面。

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副职，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挂一个虚衔，但她毕竟有了一个党内的正式职务。按她的级别，是够不上配备专车的。仗着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她有了轿车，进进出出方便多了。

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看到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主席，她也跃跃欲试，企图染指政治。她的最初的尝试，那便是批判电影《清宫秘史》。

《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完成的影片，编剧姚克，导演朱石麟，由舒适饰光绪皇帝，周璇饰珍妃，唐若青饰西太后，洪波饰李莲英。影片完成之后，便在香港上映。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五月，《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上映。江青虽然息影多年，仍关注着电影界的动向，曾调看了许多影片，内中包括这部《清宫秘史》。

江青看了《清宫秘史》，认为此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

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了自己的“观后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于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会议上，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发话了：“《清宫秘史》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应该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对这位文艺处的副处长之言，不以为然。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还发表了与江青相左的意见。胡乔木此人，自一九四一年起便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跟毛泽东接触颇多。江青可以用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去吓唬红墙外面的人，却无法镇住陆定一、周扬、胡乔木这样资深的人物：当年转战陕北时陆定一“郑位”（政委），与毛泽东朝夕共事，而周扬则早在三十年代便已是上海文化界的中共领导人。

这时，江青深有“人微言轻”的感触。

不过，她对电影依然关注。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文化部在颁布《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四个暂行办法，加强电影管理，同时又成立了“电影指导委员会”，加强电影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等，江青也被列为委员。另外，这天还成立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

对于《清宫秘史》的批判未能如愿，江青又抓住了另一部电影《武训传》。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受到清政府嘉奖，封为“义学正”。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精神。一九四四年夏，陶行知在重庆遇见电影编导孙瑜，送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给他，建议他拍《武训传》。

事隔数年。一九四七年，当孙瑜从美国回国，正值南京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着手筹拍反共“勘乱”片。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阳翰笙知道孙瑜对武训有兴趣，建议他把剧本《武训传》写出来，交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以抵制拍摄“勘乱片”。这样，孙瑜写出了《武训传》，于一九四八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赵丹饰武训。

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战火酣烈，南京岌岌可危。中国电影制片厂经费困难，停

拍《武训传》。

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购置了《武训传》的摄制权。经过一番曲折，直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才终于完成，于一九五一年初上映。

这样一部历时三年，从国民党时代开拍、到共产党时代完成的影片，作者为了使影片切合新形势，一头一尾，加上一位女教师的旁白：

“今天，我们解放了，我们的政府给了穷人充分受教育的机会，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睁眼的瞎子。今天我们纪念武训，要办好我们的义学，扫除文盲，提高文化。”

“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几千年的苦难和流血斗争，才在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组织之下，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得到了解放！我们纪念武训，要加紧学习文化，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编导尽量把这样一部构思、创作于旧时代的作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之后，最初的三个月，《武训传》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

《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一九五一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江青看了《武训传》。仿佛众人皆醉她独醒，她看出了《武训传》存在“严重问题”。

她又一次向毛泽东吹风。

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毛泽东的意见，使江青万分欣喜。她有了“尚方宝剑”，便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跟上一回一样，江青只是说出毛泽东的意见，并没有说明这是谁的话。

周扬仍不以为然，以为那是江青再一次挑刺，便顶了她一句：“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一九五一年的形势，已经与一九五〇年不同。一九五一年，文艺界已经从建国之初的忙乱中走过来，开始抓批判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不拿枪的敌人》。

二月十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四月，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开展批判。

于是，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四月二十五日，《文艺报》发表贾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打响了批判《武训传》的第一炮。

五月十日，《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头上。同日《文艺报》还发表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报》在五月十五日、十六日转载了《文艺报》上批判《武训传》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机关报注视着电影《武训传》。四天之后——五月二十日，异乎寻常的情况发生了，《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事隔二十六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时，人们见到这篇社论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书屋。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

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中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扭转乾坤，成为全国解放后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纷纷登报公开检讨。就连郭沫若也牵涉进去了，因为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

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

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

周扬也只得顺应潮流，八月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 and 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八月二十六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桩颇为得意的事。那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总共十三人，江青以“李进”之名，参与其中。

这十三人是：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①委宣传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①平原省，一九四九年设置，一九五二年撤消，包括鲁西、豫北、冀南等地。

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

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其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武训传》。

平心而论，电影《武训传》在那样大动荡的岁月中艰难地拍摄，就影片本身来说，确实显得粗糙，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然而，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原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对影片大加鞑伐。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革”恶性膨胀。

一九八五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由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

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一九五一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①

①《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十二期。

江青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颇为得意，“锁在云雾中”的“奇峰”，终于“偶尔露峥嵘”。她借助于毛泽东权威，一下子使周扬、夏衍这班当年她的上司纷纷检讨，使那个给唐纳写诗的陶行知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使赵丹也尝到她的厉害。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实际上成为这个调查团的领导。她开始探头探脑，越出“约法三章”的禁规，尝试着干预政治了。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在初次“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江青显得那么忙碌。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江青点名批判了电影《荣誉属于谁》。

九月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江青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九月六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无奈，在十二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议“武训历史调查团”就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面之际，在一九五二年二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云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马上组织大夫会诊。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经大夫

诊断，她患慢性胆囊炎。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接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划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〇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据江青对美国维特克说：“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俞平伯，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就写出了《红楼梦辨》一书。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红楼梦简论》。

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着手写文章，批评俞平伯。

这两个“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二十七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二十三岁。他是山东单县人，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员。

两位“小人物”写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试图投寄给《文艺报》。他们先给《文艺报》去信，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他们的老师表示支持，把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九月号k。

江青读过的小说不算多，但是《红楼梦》却读过几遍。她对h时）克曾说过：

“《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记不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之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老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

江青很有兴味地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大为赞赏。她把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以为不错，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以为自己直接给《人民日报》下指示，要他们转载，似乎过于郑重其事。他让江青出面，转告《人民日报》。

于是，江青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报社恭候江青的到来。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九期，说毛泽东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周扬以为，《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建议改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于是，《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还加了由主编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着中国的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引者注：除山东《文史哲》九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外，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予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

才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厉批评《文艺报》。

紧接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贯彻毛泽东指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由俞平伯又牵扯了胡适，全国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毛泽东的信，表示对于“小人物”的挑战精神的支持，表示对于学术权威的见解可以开展讨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对“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学术意见作出了“裁决”，这

显然不妥，特别是那时形成了一边倒。对俞平伯全盘否定，并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左”的倾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九八六年一月，借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出面，作了一番讲话，对一九五四年那场批判，重新作了评价。

胡绳指出：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一九五四年这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便是江青。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制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归朝！

毛泽东的信中，回溯了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这使周扬意识到：江青不可小视！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一章 又入云雾

“政治夫妻”

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子，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

“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钴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了，把她的子宫颈癌彻底治好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

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骄杨”风波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与众不同的是，别人下海，要么赤足，要么趿双拖鞋，走过沙滩，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软底鞋脱下。这是因为她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她不愿意

给别人看到。

她只会“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一九六二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她怕声音，据云，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的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摄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玩厌了扑克，她开始养猴、玩猴。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几个会诊，明几个为她进口药品……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中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

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夫人李淑一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夜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句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如本书第一章写及的那样，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注：指《虞美人》），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夫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这封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

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然而，一九六二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五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

贺子珍的庐山风波

就在“骄杨”风波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极度不快：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贺子珍南下之后，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贺海峰住在一起。

她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她担任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便于她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儿子毛毛——毛岸红。在长征开始时，三岁的毛毛无法随她和毛泽东长征，只得交给留在当地的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贺信夫妇。红军开始长征后，毛泽覃和贺怡不得不把毛毛托寄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覃在游击战争中战死。当时，贺拾刚刚生下一子。

一九四〇年，贺信在广东韶关被捕。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怡，终于使贺怡来到延安，而贺怡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①据她回忆，她陪同贺。冶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时年八十六岁。

贺怡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怡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亿，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①

^①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纪实》。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②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党史研究》。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〇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陶铸的老朋友。一九五

五年冯白驹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翁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①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①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七月九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二十二年阔别，二十二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

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这迄今仍是一个谜，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即便她远在杭州，贺子珍刚一上庐山，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风波

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一九五九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

这么一来，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一九四五年十月，米瑞晟给他土造的三号手枪。他说，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十五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

一九四八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五十六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五十六元。下同）；

一九五一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三百九十万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八万元；七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五万元。

李干卿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但觉悟不高，转变不快，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工作态度不够积极，上班忙于烧水喝茶，在公安处工作期间，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一九五四年七月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李便说：“有人暗算我。”说已给他妹妹（引者注：指江青）写信反映等等。

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对李干卿的审查，深深激怒了江青。她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听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汇报，哭道：

“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①

^①鲁公宣，《齐鲁一动》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陈伯达则帮腔道：

“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引者注：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②

^②鲁公室，《齐鲁一动》，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急急如律令。翌日，从北京派出三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济南。

几天之内，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分处处长曲和钧，保卫股股长史殿安，全部被捕。除张国峰病重外，其余六人于四月二十九日被用专机押往北京。

病重的张国峰受到日夜折磨，六月三十日便死去。被押往北京的六人，受尽酷刑和屈辱。

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这桩案件才得以平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委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这才为审查李干卿引起的风波降下大幕。

李干卿未能住进中南海，只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底路过济南时，在专列上见他一面，算是给了江青一点面子。

江青之姐李云霞倒是在中南海长住。李云霞的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王博文，另一个在山东游泳淹死，王博文随李云霞也住进中南海。

“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一九九〇年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老式房子里，笔者拜访了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顾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极拳专家，但又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在一九三四年便加入共青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任区长。

大抵由于他具有老革命、老武术家双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艺高强的人，因此几度进入中南海，为中共高级干部教拳。

顾留馨最初的“学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时，胡志明说及他在战争中曾从马上摔下来，受过伤，中国能否派一位太极拳拳师前来教他打太极拳，以拳术疗伤，贺龙主管体育，他回国后经过调查、选择，选中了顾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拳师。

从此，顾留馨颇受重用，回国后，教过贺龙，教过叶剑英，教过邓颖超，以至教过宋庆龄。消息传进江青的耳朵，她也请顾留馨教太极拳。在顾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动作近乎舞蹈。不过，她倒很守时，总是准时前来学拳。这样的体育疗法，使江青的体质有所加强，这样，在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感而发，提倡老年人学打太极拳，一时间，向顾留馨学太极拳的高级干部纷至沓来。

打太极拳使江青尝到体育疗法的甜头，于是，她打乒乓球，打台球。从一九五九年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中首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来，乒乓球热席卷中国。江

青早在上海当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此时也投身于乒乓球热之中。她常抽杀，球技颇“凶”，属于“进攻型”。

她的游泳姿势虽差，不过，游泳是夏日最好的运动，她也就不顾游泳不如王光美以及右足六趾之类不快之事，不时下海。

这么一来，进入六十年代，江青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建议，进行“文化疗养”，看戏、看电影。

后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她在北京看戏，在上海看戏，在杭州看戏。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六十年代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她进行“文化疗养”，确实看了不少戏。一九六二年三月，她在杭州养病：像《虹霓关》、《大五花洞》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觉，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三年后批判此剧，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后话。

“体育疗养”、“文化疗养”果真奏效，江青经再三检查，癌症的警报解除。她舒了一口气，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继续着她五十年代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宏业”。

跟王光美比高低

正在这时，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使江青颇为嫉妒。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养比江青高得多。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采访王光美时，她正在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赠英文原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倚，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即现今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八年五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一九三六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一九三八年九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儿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一九四五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

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任卫生部部长）。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一九四六年八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一九四八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九真一女一子；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革”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此是后话。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偏烈，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王光美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江青从幕后走到了前台，“约法三章”对于她的约束力即将失去！康生开创“索隐式”批判恶例

就在江青要跟王光美一比高低的那些日子里，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在向“左”偏航。

就在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前夕，工人出版社忽然接到通知，要求赶印六百册小说《刘志丹》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

会上，不仅散发了小说《刘志丹》，还印发了两封信——那是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在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扬的两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批评上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

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制造舆论，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指的便是小说《刘志丹》。

虽说对小说《刘志丹》作了“宣判”的是毛泽东，而制造这起文坛冤案的幕后策划者则是康生。

刘志丹，著名的红军将领，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一九三五

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率红军长征到了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见到刘志丹红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遂决定进军陕北，以陕北作为根据地。

刘志丹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阵亡于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此后，刘志丹一直被作为革命先烈纪念。

一九五六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要出版一批革命烈士传记，内中有一本《刘志丹》，约请李建彤写。

李建彤确实是很合适的作者，因为她是刘志丹的弟媳，很熟悉刘志丹的事迹。她的丈夫刘景范当年担任陕甘军委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

经过两年的准备，李建彤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写《刘志丹》。写了一稿又一稿，写至第六稿才得以出版。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工人日报》还连载了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第二卷第一部分。

本来，刘志丹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经战死，年仅三十三岁，关于他的小说不会有什么麻烦。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刘志丹》问世之后，有人向康生报告：“小说字里行间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这下子，使问题复杂化了。

高岗，曾参与陕甘边区的创建，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一九三六年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此后，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和饶漱石遭到批判，被认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同年八月，高岗自杀身亡。

小说《刘志丹》中的“罗炎”，被说成是高岗。康生抓住了这一点，一下子就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

康生把这一“严重情况”向毛泽东反映。正在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把这一“严重情况”视为“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于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了那么一番话。

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于是，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

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此案不断升级。

刘景范被打成“反革命”。

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消职务，“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也遭到牵连，也被撤职，以至入狱……

此案直至经历了十七个年头之后，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经邓小平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七九年第五十三号文件，才终于得以平反。

文件认为，《刘志丹》是一部较好的革命文艺作品，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写作是正当的，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秘密反党集团”。在写作过程中接触的人，全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反党”关系。

文件批驳了康生，也批评了阎红彦，指出康生强加给这部小说的罪名，是制造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特别指出，小说中的罗炎，并不是高岗。《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不是党史，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隐式的方法硬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这种索隐式的批判方法，应当铲除。

文件还认为，应当实事求是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小说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陕甘时期的某些材料，也不应定为“为高岗翻案”。

所谓“索隐”，亦即附会，亦即影射。把小说《刘志丹》索隐成是“为高岗翻案”开了一个恶例。

此事给了江青莫大的鼓舞。此后，她运用康生的“索隐式”手法，把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成“为彭德怀翻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江青意识到形势对她颇为有利，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约见了齐燕铭。齐燕铭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此时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文化部部长。江青向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茫然，不知江青这番话有何来历——是江青自己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论职务，江青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只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怎可以“训示”齐燕铭？

此后不久，江青居然召见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须知，当时陆定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江青又一次向他们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部长们居然无动于衷，对于这位颐指气使的“第一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

部长们又一次忽视了江青的“能量”。江青下决心要大干一场——她结束了“疗养生活”，插手于中国政治了……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二章 江记“样板”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拾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〇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柯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叫他照登的。

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此后，在俞铭璜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内中写及：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璜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①

①惠浴宇，《写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璜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也是诸城人，比江青年长十二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写了诗、散文、杂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他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正在这时，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一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在文中，他写道：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

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组织俞铭璜写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八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忽地翩然光临上海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一九五八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

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

①《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恬恬地发“指示”。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这天两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一九八七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①

①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文汇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树《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在看中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沪剧《红灯记》不久，江青于一九六三年秋，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一九三九年九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的张家洪（剧中称“沙家浜”）留下三十六名伤病员（剧中为十八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依托茫茫芦苇荡，跟日军、伪军以及“忠义救国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沪剧毕竟局限性很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能够听懂。江青仍要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以树为“样板”，推向全国。这一回，江青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一团。

一九六四年元旦，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一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江青

对他们说：“坚决按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江青对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似乎特别热情。江青曾特地到后台去见赵燕侠，说了一番“火热”的话：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这番话出自“第一夫人”之口，顿时使赵燕侠受宠若惊。

在排练时，江青特地从上海调来沪剧中演阿庆嫂的演员，辅导赵燕侠。京剧跟沪剧，毕竟是不同的剧种，赵燕侠借鉴了沪剧中的表演，但并不照搬。赵燕侠说：“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顿时大为不悦。

后来，发生了“毛衣风波”，赵燕侠终于被江青所冷落了：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沙家洪》（引者注：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京剧《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来沪演出，江青已物色了阿庆嫂B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B角阿庆嫂彩排时，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穿得少，第二天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剧团团长一起，给赵燕侠送去了两件毛衣，说：“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深知江青喜怒无常，不敢穿，便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

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即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此后，赵燕侠被点名批判，赶下舞台，进牛棚，下干校，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换了别人。①

①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漩涡”》，《新民晚报》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要改《沙家浜》。”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一九六三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①

①江青，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童祥苓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一九六六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一九六九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①

^①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一九九〇年二期。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江青有了“资本”。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六月四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一番和“大写十三年”相悖的话：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二十九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妹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齐燕铭主持开幕式，沈雁冰致开幕词，彭真致闭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陆定一作长篇讲话。可以说，主管宣传、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八月一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同样显示了对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重视。

其中的高潮，是六月十七日、二十三日两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周恩来在六月二十三日接见了各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这是她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在漫长的二十七年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更为重

要。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多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多个话剧团，不一定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一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使举座皆惊。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由康生出面，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张春桥“挂帅”改《奇袭白虎团》

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山东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应江青之邀，进入了中南海。

江青很关心来自她家乡的京剧剧组，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用她跟剧组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来说：“《奇》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这个戏准备请主席看，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剧组接进中南海，就是为了商讨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袭白虎团》树为“样板”——一旦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一鼓掌，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在江青会见《奇袭白虎团》剧组时，她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怎么忽地把上海代表请来呢？待江青点明之后，《奇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江青要此人“挂帅”，主持《奇》剧的修改工作。

山东的戏，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这位四十七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哦，原来他并非上海人，却是道地的山东人——他乃山东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了上海代表。

张春桥此人，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笔者一九六三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之后，便多次听过张春桥做报告。他思路清楚，讲话干脆，从不罗嗦，一口气讲两、三小时，滴水不漏。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员。他给上海各报写文章，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笔、山东同乡崔万秋颇熟。前已述及，据沈醉回忆，他在崔万秋家见到过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他也“在崔家见过穿整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不过，张春桥当年是否跟江青有过来往，不得而知。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三、四个月，张春桥也从上海来到延安。后来，他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而该报社社长兼总编则是邓拓。

一九四九年，当红旗在上海城头飘扬，穿着一身草绿军装的张春桥，成为华东新闻出版的副局长。不久，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参与上海机要。一九五五年，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接替陈毅，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这“政治秘书”，听来不过是秘书，却比报社总编辑更为接近权力核心。须知，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为柯庆施起草种种报告，发言稿，随柯庆施出席种种会议。一九五九年夏，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张春桥便随柯庆施出席了会议。后来，张春桥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来沪住进锦江饭店，第一次跟张春桥见面，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随同柯庆施来的。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俱乐部。此后，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她尚未发现张春桥特殊的“才干”。正因为这样，江青在上海组织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找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没有把任务交给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江青要在上海抓“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跟柯庆施的联系日趋频繁，跟张春桥也就三天两头见面。不过，此事苦了张春桥，简直是用其所短，避其所长！因为张春桥擅长写文章，“大批判”，舞“棍子”，而对京剧却一窍不通。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

张春桥却深知，巴结“第一夫人”，乃是官场晋升的一条捷径。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使江青欢喜。他只得急就章，从不听京戏的他，不得不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躲在家中“速成”。

柯庆施毕竟是坐镇上海的大员，诸事冗忙，虽说他“亲自抓样板戏”，但只能倚重于张春桥，代他过问。于是，张春桥跟江青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青看中这位山东同乡。正因为这样，请张春桥“挂帅”，主持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江青接见《奇袭白虎团》剧组，说了一番意见：

“这个戏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战斗故事，但艺术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实和艺术概括是不同的。艺术概括应比生活更高，要概括当时整个形势和时代精神，艺术创作政治第一。这个戏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朝鲜人民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要照顾到两国的关系，我们谦虚一点好。”

张春桥变得颇为忙碌。江青让他“挂帅”改《奇袭白虎团》，又要他“过问”《智取威虎山》剧组，按照毛泽东看戏时说的意见修改。如此这般，连张春桥自己也说：“我成了京剧书记了。”伸手“抓”《海港》

上海锦江饭店马路对面，是一座棕色面砖的典雅的美国风格建筑。这是闻名于上海的“兰心

大戏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建造于一九三〇年。在当时，是上海豪华型剧场。解放后，改名上海艺术剧场，仍居于上海一流剧场之列。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海艺术剧场华灯如画，热闹非凡，迎来了一批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石西民、王一平等。就连观众，也不是普通的观众，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部。

他们聚集上海艺术剧场，不是开会，却是观看上海淮剧团上演的淮剧新戏《海港的早晨》。淮剧，又名“江淮戏”，流行于苏北、安徽和上海一带。虽说淮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毕竟流行区域有限，影响也有限。这天，嘉宾盛赞《海港的早晨》，刘少奇等还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成了上海淮剧团历史上的难忘的一日，难得的殊荣。

淮剧《海港的早晨》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是因为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黄浦剧场看过这出戏。周恩来赞扬这出戏，说道：

“感谢你们演了这个好戏，你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舞台上反映青年问题的戏有《年青的一代》、《社长的女儿》、《千万不要忘记》……说明当前教育青年的重要性。”^①

①葛昆元，《江青一伙插手（海港）我见我闻——记上海滩剧团李晓明谈话》，《上海滩》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耳中。频繁出入于上海的江青，不声不响混在普通观众中，连看了三次淮剧《海港的早晨》！

正忙于“京剧革命”、正忙于树“样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她手中正缺乏“工”，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写码头工人的。

刚刚结束了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江青惦记着淮剧《海港的早晨》，忽忽匆匆又赶往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跟上海艺术剧场只一步之遥。

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剧李晓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突然，有一天团里通知我：下午到锦江小礼堂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已是八月里，气候相当炎热，我一走进小礼堂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参加她召开的座谈会。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开口就是惊人之语：“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一个国际主义的题材。这就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我一听，震惊不小，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这时又听到江青说：“在剧场里，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说罢，她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她说，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国许多地方，任务就是看戏，挑选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改编成京剧。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写解放军的也已选定《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淮剧《海港的早晨》。

她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确定改编这个戏，她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其实，所谓调查，只是看了戏后，她到码头上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第三，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后，她才拍板而已。

从此，淮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

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挂帅，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负责，组成领导班子，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郭炎生，何慢、杨村彬，导演杨村彬。

“上峰”如此看重，编剧们焉能不卖力？才两个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便问世，着手排演，由重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一九六五年三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请江青审看。江青看罢，

竟大为不满，说道：“你们怎么搞的，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去写英雄人物？这出戏改坏了，必须重编！”

江青一句话，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第二天，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指定由他挂帅，另组班子，重起炉灶。于是，换了编剧，调来淮剧原编剧李晓明，导演亦换人。江青认为“童芷苓动作太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从宁夏京剧团调来李丽芳演女主角。

不过，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怎么改，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张春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请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审看，剧名改为《海港》。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又是摇头。江青说，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无奈，“京剧书记”遵命，又得避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如此这般，经过江青“指点”，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洪》、《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另外，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洪》。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①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①后来，从一九六七年起，又增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京剧《杜鹃山》，但人们已习惯于称“八个样板戏”。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作出了“成绩”，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三章 “文革”序幕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横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蓬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伴”。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

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

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询语：

《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终于露面的。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一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一毛^①对笔者说，那时张春桥简直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张春桥三天两头召见陈虞荪，向他下达种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记录。陈只得用脑子硬记，一离开张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一毛，由全一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①本书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采访陈虞荪，同年九月十一日采访全一毛。

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戚本禹和关锋助了“三通鼓”

南北对垒，毛泽东离京南行。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

^①

^①笔者自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些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谈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①

^①引自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回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②这一谈话纪要于一九六六年一

月九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吊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中。他含冤离世之际，年仅四十四岁！

②笔劄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十七日对田家英夫人董边的采访。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誉，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戚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言”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

“‘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戚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说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前往苏州请“尊神”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以二十一天的神奇速度，建成了这座小礼堂！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共候补委员不过一百六十一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二百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的了。

建造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此后，把上海作为“基地”，把锦江饭店当作“营寨”的江青，也就看中这座小礼堂。一回回接见“样板戏”剧组，一次次“内部观摩”电影，都在这里进行。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虽说名为“座谈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是她一个人。比起她在上海抓“样板戏”，组织写作两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个小小的座谈会的分量似乎更重。两个多月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当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二月，毛泽东在武昌，此后坐镇杭州。林彪则住在苏州。江青呢，下榻于“上海基地”。

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她是从上海到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的罗瑞卿之后，林彪在军内更是说一不二了。林彪的直线上升，在于他不断地“鼓吹”毛泽东。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江青，她正要作为一颗“新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兴起，她要借助林彪之力托起。当然，林彪也明白“第一夫人”的分量，借助于她，对于林彪的进一步上升也至关重要。就这样，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

用江青的话来说，她的苏州之行，是前去请“尊神”。此言颇有来历：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霍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霍白音呼吁去除陈规，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撒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文章，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解放军这“尊神”。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

笔者在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刘志坚将军。他感慨万千，用一口湖南话向笔者细叙“文革”往事，他的夫人刘莱瑛不时在一旁加以补充。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不久担任红四军政

治部主任。他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他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他担任总政副主任时，主任是肖华上将。肖华，十二岁入团，十四岁入党，十八岁就当上“少共国际师政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总政的日常事务由刘志坚负责。正因为这样，叶群的电话打到刘志坚那里。

叶群转告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跟部队向来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回怎么忽地要“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了呢？

早在延安的时候，刘志坚就认识江青，只是看不惯她“挖墙脚”，对她印象不好，没有太多的交往。

前不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崇武海战作战有功人员。崇武海战发生在这月十四日凌晨，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猪潜艇“永泰号”。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罗瑞卿，说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于是，罗瑞卿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遵命，指示《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算是多年以来，刘志坚跟江青有了第一次间接的工作联系。就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一个多星期，罗瑞卿就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撤消了总参谋长职务……

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肖华去，肖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参加。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应当去。

这一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也就定了下来。另外，除这四名正式代表外，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肖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

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

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就这样，二月二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尽管出入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刘志坚一行六人却换上了便服，因为“座谈会”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穿军装进出那里反而显眼。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①这封信的原文是写给“绍萱、燕铭同志”，此时却被改成致延安平剧院。平剧，即京剧。延安平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平剧《逼上梁山》，是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剧。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齐燕铭所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被免除，所以此信也主动删去了他和杨绍萱的名字。另外，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也被删。删改后的信曾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信，才根据毛泽东手稿恢复原貌。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达延安饭店。此人并非部队干部，似乎与部队文艺座谈会

无关，却介入了这一座谈会，表明此时他已成了江青的亲密伙伴。

他便是张春桥。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一九六三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派他来接刘志坚，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那里。丁香花园，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设在那儿。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乃学习雷锋之意。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显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在这样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问，他们有没有带窃听器，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六人，张春桥依然作陪。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

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刘志坚等只得“洗耳恭听”，又不准作记录，记不住她的意见又无法回去汇报……

就这样，“座谈会”在上海开张了。

“一人谈”的“座谈会”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二月九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二月十日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十六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二月八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十六日继续举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二十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三十份。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刘志坚曾对笔者谈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见得会满意。”

经过四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

于是，在二十一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

二十二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

这样，二十三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肖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改《纪要》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字。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

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信未说“以便报中央审批”，意味着《纪要》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北京在起草《二月提纲》

一九六六年的二月，风云突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

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三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前已提及，这五人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五人小组写出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于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问”指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水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

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

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闹（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二六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电话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②

②转引自《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毛泽东的这些话，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当毛泽东跟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谈话的那天——三月三十日，刘志坚和陈亚丁在北京为《纪要》的通过，履行最后的手续。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引者注：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贺龙等军委常委信），请审批。

军委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四月一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内中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毛泽东在四月一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四月十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这时，中共中央的批语，已换成刘志坚在四月三日起草的另一个批语，新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于是，《纪要》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对于江青来说，四月十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这一文件，阐述了江青的文艺观，并把江青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各地贯彻执行——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而不是发在报上的一篇文章。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后台”是何等之硬。

在上海策划发表梁壁辉、姚文元的文章，江青毕竟只在幕后操纵。推进“京剧革命”，抓“样板戏”，江青的那篇《谈京剧革命》，也迟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才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

江青以一颗“政治新星”的姿态，在全党亮相！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纪要》的核心段落，是这么一段话：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引者注：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江青以为，过去抓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罢官》，“只是抓一些个别问题”，这一回，要“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了！

《纪要》，成了江青上台的“宣言”。虽说在《纪要》中，江青尚无任何头衔，只是“江青同志”罢了，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跟部队的同志“平等地进行交谈”，但《纪要》的下达，表明江青要“出山”，即将担任要职了！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四章 “旗手”登基

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宾，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竟从此以“王力”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内。从一九六〇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三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消。”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书作者曾多次访问王力，请他回忆“文革”历程。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

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据王力回忆：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

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〇一医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此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杭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召见。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西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六月一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江青呢？她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她还出席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内中好的只有七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对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挥舞大棒，骂声连连：

《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

《战火中的青春》——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队形象！

《哥俩好》——写中间人物！充满了低级趣味！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充满人性论。

《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

《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

《花好月圆》——片名就没有阶级斗争！写多角恋爱，太低级。

《五朵金花》——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也很有问题。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

《雷锋》——影片中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错误。

《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

《红霞》——宣扬假投降、美人计。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

《人民的巨掌》——为反革命杨帆翻案。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宣扬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江青的几句话，便把电影界说成一团漆黑。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江青来到了上海，她跟张春桥一起，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摘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声言要对文艺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这个报告，于六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

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松散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才正式召开会议……

滴水洞里的沉思

六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光景，三辆小轿车、一辆大客车，忽地鱼贯进入湖南韶山的一个山谷里。四周实行了严密的警戒，闲人莫入。

从车上下下来身材伟岸的人物，一望而知是毛泽东。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声震天动地、“文革”之火席卷华夏之际，毛泽东居然来到故乡的山间过着“隐居”生活！

那个山谷，人称“滴水洞”。其实，那只是因为附近有个小山洞，不论晴天或下雨，总在滴水，因此得名。后来，修水库时，人们把这小山洞填掉了，可是仍习惯地称那山谷为“滴水洞”。滴水洞是由龙头山（南）、黄峰山（北）、牛形山（西）三山环抱而成，山间树木蓊郁，夏日清风习习，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毛泽东对于滴水洞，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祖居，原本就在这里。后来，他的祖父同伯祖父分家，他的祖父迁往韶山冲上屋场安家——如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毛泽东故居，便是上屋场毛泽东祖父的房子。毛泽东是在那里出生的。上屋场离滴水洞大约四公里。毛泽东小时候在这儿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他到外婆家，要打这儿经过。他的祖父、祖母的墓，也建在这里后山的虎歇坪上。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路过滴水洞口，曾对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省里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泽东一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筹划着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别墅。此事严格保密，称“二〇三工程”。毛泽东所说是“修几间茅屋子”，下边一执行就大大加码，拨款一亿元，兴建了三栋楼：一号楼是毛泽东专用楼；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二十四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另外，还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马路。

这个“二〇三工程”从一九六〇年动工，到一九六二年完工，便时时恭候毛泽东的光临。

足足等了四年，这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他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十六日到达长沙，十七日到达滴水洞。

陪同毛泽东此行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①。张耀祠是江西瑞金沙洲坝人，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沙洲坝，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而张耀祠则在政府门口站岗……他的名字，在“文革”中常被写成“张耀词”，据他告诉笔者，那是江青给他改的，据云“光宗耀祠”乃是“封建意识”。如今，他仍用原名。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成都采访张耀祠。

毛泽东下榻于一号楼。那是一幢灰顶青瓦白墙的小楼。跟毛泽东的卧室相通，有一套完全一样的房间，只不过卫生间里的澡盆不是白色而是紫红色的，据云那是设计者们为江青准备的。江青却没有来，内中的原因不知是毛泽东不让她来（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在长沙，江青到长沙，后曾希望去滴水洞，毛泽东劝她道“你不要去”^②），也不知还是江青忌讳到了韶山，

当地人总要提起杨开慧。

②《花地》，一九八九年五期，金振林，《毛泽东隐踪之谜》。毛泽东对江青说：“你不要去，你去了，那里不得安静。那是我要去住的地方。”

在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张玉凤和一位男服务员小周。郭国群二十三岁，湖南邵阳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从长沙来此照料毛泽东。小周是毛泽东的理发师，也兼生活照料。张玉凤则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随毛泽东来此。

张玉凤二十二岁，能够成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纯属偶然。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十四岁那年，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正遇上铁路局招工，就去试试看，考上了。于是，她成为铁路客运列车的列车员。

一九六〇年冬，铁道部要调一批列车员到专列上当服务员，十六岁的张玉凤被选上。这样，她被调进北京。这时的她，还不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

上了专列，她才明白那是首长和外国国家元首乘坐的专门列车。这时的她，每月工资不过三十二元而已。先是在别的专列上工作。没多久，她被调往毛泽东专列上工作。起初，她简直不敢相信，毛泽东会坐在这趟列车上。直至专列抵达蚌埠，毛泽东跟专列上所有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张玉凤肯吃苦，工作认真细致。她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了两年之后，一天，汪东兴带她去见毛泽东，这是她头一回跟毛泽东交谈。她的心中颇为紧张。

一见面，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汪东兴见她神情紧张，就代她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她的名字三个字怎么写。说着，拿起铅笔和纸，让她写下来。

张玉凤怕自己的字写不好，就答道：“弓长张，玉石的玉，凤凰的风。”

毛泽东手中正拿着笔和纸，就随手记下了她的名字。

头一回的交谈，没几句，就结束了。

张玉凤走后，汪东兴发觉那张写了“张玉凤”三个字的纸上，一连写了好几个“张玉凤”。汪东兴便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否把张玉凤调至毛泽东的车厢当服务员。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样，张玉凤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专列上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与张玉凤同时调至毛泽东车厢的，还有一位老大姐。

这一回，毛泽东离开专列，进入滴水洞，需人照料，也就命张玉凤随行。据云，汪东兴考虑到毛泽东到滴水洞，必定要去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而张玉凤水性甚好，也是要张玉凤同行的缘由之一。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一住便是十一天。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给毛泽东递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就在滴水洞里，毛泽东写就一封文字隐晦、含意深沉的长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便可知道毛泽东在解放后诸事冗杂的情况下，信件差不多成了“电报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长达近两千字！

毛泽东此信，是写给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写好初稿后，便装入信封，要秘书妥为保管——他没有马上发出……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

“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我还不走，我还要再往一夜！’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①

①赵景云，《灵秀聚钟人莫识——韶山滴水洞印象》，《文艺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稿，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七月八日发给江青。

这是一封不寻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又鲜见于书刊，现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引者注：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引者注：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上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引者注：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

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举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七月八日①

①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毛泽东此信，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毛泽东写罢给江青的信，曾在武汉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

毛泽东同意了。

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悔悟之意。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何况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

在林彪倒台之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为世人所知。

点火于北京高校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特大喜讯”，还配发了社论。

其实，这“喜讯”发生在十天前——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全国各报也都刊载这一“特大喜讯”。

在新华社所发的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透露了毛泽东游泳时所讲的话：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①

①《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②

②《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这篇报道，给人造成的假象，似乎毛泽东仍在外地，仍在武汉。

其实，毛泽东在七月十八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

正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

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

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③

③《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④

④《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

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

“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

她在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出现在北京大学。

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七月二十二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

七月二十三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

革命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學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翌日——七月二十四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地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

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

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

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XX 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遂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引者注：应为在青岛入党）。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买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满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变化，是开端。不要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个人都要看戏吧。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京剧改革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的，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压制了自由，受了围攻吗？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在这种围攻中站得住。

刚才递条子是揭露诽谤的，可见有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

江青这人，在露“峥嵘”之际，也往往露“真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她在北京大学露“真容”，曾使听众一片哗然。

那是前一日——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尖锐地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

仿佛持“尚方宝剑”，江青在二十六日晚率“中央文革”成员们前往北京大学，万名师生聚集于大操场，“聆听”着他们的演说。会议的主旨，在于批判那“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代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职权——因为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之后，原本以陆平、彭佩云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北大党委也就垮台了。

才过了五十多天，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又陷入了陆平、彭佩云一样的困境！

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清算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种种错误。江青在一片“向江青同志

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声中，侃侃而谈，严厉批判张承先，批判工作组。

渐渐地，江青激动起来，也就说走了嘴。

江青忽地说起了自己家里的事。据当时的传单所载：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一言既出，举座万人皆惊！

张文秋何许人？怎么她是“政治骗子”？

张少华又是何许人？怎么“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的长女即毛岸英之妻刘松林（刘思齐）；次女即张少华，毛泽东的次于毛岸青之妻。

刘松林与张少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张文秋，湖北京山县人氏，本名张国兰，号文秋。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中共时，便在武汉结识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在武汉结婚。刘谦初也是中共党员。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刘谦初死于国民党刑场。张文秋不久产下遗腹女，即刘思齐——刘谦初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所以预先给孩子取了此名。

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

一九三七年冬，张文秋在延安再婚，男方是彭德怀部将陈振亚。翌年秋，生一女，从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改名邵华。

张文秋颇为不幸，新婚才一年多，陈振亚遇害于新疆迪化。张文秋又生下一遗腹女，取名张少林。

美国《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曾采访过张文秋，那时张文秋化名珊飞。史沫特莱在所著《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中，其中有一节《共产党员珊飞》，写的便是张文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刘松林跟毛岸英结婚，从此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可是，没多久，毛岸英走上朝鲜战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岸英被美军轰炸机炸死于朝鲜。十年之后，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的消息，传入江青的耳朵，江青大为不快。几年前，江青曾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跟毛泽东大闹一番。眼下，又担心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加强了家中“杨家将”的势力。对待丈夫的前妻子女，江青没有王光美那样的胸怀。

无奈，毛泽东赞成这一婚事。知道刘松林要带着妹妹到大连看望病中的毛岸青，毛泽东写了一信托她们带去：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愉快！

父亲①

①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对岸青、少华婚事的首肯，江青也就不便再从中作梗。

就在毛泽东写此信之后，毛岸青和张少华在大连结婚。张文秋也就成了毛泽东的“双倍”的亲家！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的三女儿张少林曾笑道：“可惜我没有三个儿子，没法让你成为我的媳妇，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

张少华和妹妹张少林，双双就读于北京大学，一个在中文系，一个西语系。

“文革”开始后，张少华曾在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江青得知后，笑道：“哈哈，你倒楣的日子到了！”

江青心中的积怨迸发了！正因为这样，她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点了张少华的名，点了张文秋的名。

在外人看来，江青把家庭内部的矛盾，把“婆媳”之间的矛盾，当众捅了出来，简直不可理解；

在江青说来，她早已恨透张家母女，此时此际借机发泄，倒是完全符合“逻辑”！

江青说“根本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在当年的传单上，还有下面一段文字：

“在这当中江青同志讲了过程，讲时非常激动，流了泪，我们未记清，大意是：主席有个儿子，得精神分裂症，让大夫护士看，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没有一点儿人道主义，就和他结婚，出来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毛泽东那封给毛岸青的信，最清楚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江青既然“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于是张文秋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家也就成了“政治骗子”！

笔者访问了刘松林^①，她回忆道：

①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及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五日，多次采访刘松林。

“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放了炮，我们家就倒楣了！”

“少华和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出走。少华被说成是‘钻进毛主席家中的坏分子’！”

“北大贴出许多批判我母亲和少华的大字报。母亲没办法，只得带着我两个妹妹，在北京流浪，借住在老战友家，躲避一下风头。”

“我母亲是董老（引者注：指董必武）的学生。董老说，少华怎么会成了‘主席家中的坏分子’？这是江青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了！我实在无法容忍。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知道了，保护了我母亲和少华，这才避免了大灾难……””

扎营钓鱼台

江青的轿车，进出于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轿车，也进出于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金主銮與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

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

一九五八年，钓鱼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为此处被选定为国宾馆，以高标准建造了十六幢别墅式的新楼，以接待外国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大批国家元首要前来北京……

不料，在国宾馆落成之后，这里却变得冷落，并没有出现贵宾如云的景象。那是因为中苏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而当时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冷漠。此后，这里的常住贵馆，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时回不了自己祖国的西哈努克亲王。直至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住进此地六号楼。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以及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总统布什、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住进此地，国宾馆才变得热闹起来，才变得名副其实。

就在钓鱼台的冷落的日子，江青看中了这豪华、幽雅、秀丽的国宾馆。“中央文革”先是“进驻”此地的十四号楼，作为办公楼，陈伯达住在那里。江青看中了乳白色的十一号楼，住了

进来，享受着国宾的待遇。从此，江青的代号为“十一楼”。康生也占了一座楼。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此“占楼为王”。这样“中央文革”占领了钓鱼台南半部的五座楼，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一时间，“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一时间，钓鱼台和中南海、毛家湾，成了中国政局的“三角中心”。

“中央文革”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这时，江青把“中央文革”“捏拢”了，变成了掌握实权、大权的组织。关锋、戚本禹也迁进钓鱼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这么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再不是最初的只有机要秘书一人的状态。

“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主任易人。本来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莱米，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曾任《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革”之火，烧到了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头上。另外，据王力回忆，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为任命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解放军报》社宋琼接替王力。两个月后，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马列研究院的王光宁任组长。

“中央文革”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

“中央文革”成了“江记班子”。

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

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六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①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八月五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单是：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又一次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她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

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又一次变化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她，简直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成了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影子常委”！

“旗手”的登基典礼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起彼伏，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陈伯达发表演说，称颂江青的贡献。

“……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江青接着作长篇讲话。她追述了自己如何在养病中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如何去“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然后“才想到要改”，即进行所谓“京剧革命”。

江青在谈及北京京剧一团时，点了一连串的名：

“至于你们团内某些负责人，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在这里，江青第一次把“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三旧”。在她的讲话之后，一下子便在全国掀起批“三旧”的高潮。

江青声称：

“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

问”。

谢镗忠还宣布：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在这次大会之后，江青的“旗手”之誉“鹊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鲁迅”相提并论。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高举一面红色大旗“阔步前进”，她的身后跟着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手持驳壳枪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杨子荣、挥舞大刀的琼花，穿着蓝色工作服围了白毛巾的方海珍……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五章 复仇女神

王莹惨遭江青毒害

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

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

“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炫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

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

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至置于死地而痛快。

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

“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

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

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

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

于是，发生了本书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蛟，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

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

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

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查！王莹在一九五四年底从美自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

查！王莹自一九五八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

“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之命”！

“中央文革”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

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

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王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精疲力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

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

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

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

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

“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死地：

“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一九七〇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①

①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

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那个华垣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江青记得，华垣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垣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

虽然史东山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死了，可是，华垣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垣妮应列为“审查对象”！

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帐，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一九三七年二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

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价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三十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

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有仇报仇，有冤伸冤。

无仇无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给她以帮助，有的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为她所爱，仅仅因为知道蓝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挞伐。

郑君里和赵丹知道蓝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难逃。抄家之后被投入狱中，郑君里屈死于冤狱。

顾而已，“六和塔婚礼”中的一个。要整掉他！

于伶，“十·八”抄家“候补”名单中的一个。此人知内情，该整！

史枚，当然该整。好在他蹲过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一九五七年又划为“右派”，整他不难。

章泯，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过，他是“走资派”、“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何况北京电影学院的“主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闻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难。哦，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把他整死了，了却江青一桩心事。

最令人震惊的，是秦桂贞向我讲述的故事。①

①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采访于上海。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本来早已把阿桂遗忘。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

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当年，蓝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蓝苹跟章泯的同居，阿桂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

一个电话，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因为上次江青通过叶群，委托吴法宪指挥上海的“十·八”抄家，干得很不错，这一回，她就直接找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

“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

“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不过，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江青说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惊动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调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来。在她手头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来。”

“我用飞机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军司令手底下有的是军用飞机，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锦囊妙计：“不要明火执仗，不要当场逮捕，你借我的名义，如此如此，她一定会言听计从，乖乖地来北京……”

吴法宪连连点头，领命而去。

吴法宪找了一个姓张的心腹，面授机宜。此人坐了专机，来到上海。由于江青关照过，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可能还隐藏着坏蛋，那人只得自己设法在茫茫上海滩寻找秦桂贞。

秦桂贞调换过好几个工作单位，况且已于一九六七年退休，单身一人，住在某处一间小屋里。

她是个小人物，不像郑君里、赵丹那样好找。

姓张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这才查明秦桂贞究竟住在哪里。

三月二日这天傍晚，作为里弄干部的秦桂贞，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的住宿。忽然，一个四十来岁、留着齐腮短发的女人，前来找她：“你是秦桂贞阿姨吗？”

“是的，我叫秦桂贞。”

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信。”

秦桂贞原是文盲，眼下也识字不多，看着那纸头上盖着红色圆形大印，猜想那介绍信不会是假的。

“什么事？”秦桂贞问。

“请你跟我去，到市革会，有点事情。”那女的答道。

秦桂贞随着她穿过热闹的南京路，见僻静处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女的带着她上了车。秦桂贞已经五十四岁了，还没有坐过这么漂亮的小轿车。她在揣测着，市里有什么要紧的事找她呢？

风驰电掣一般，那小轿车左抹右拐，驶入幽静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楼前。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姓张的满脸堆笑，请她坐在沙发上，说道：“秦阿姨，北京首长想念您，托我问您身体好！”

秦桂贞一听，心中顿时豁亮：那“北京首长”，当然就是当年的蓝小姐，今天的江青。

姓张的又紧接着说：“北京首长派我来，接您去北京住几天，好不好？”

“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就走！”

事情这么突然，秦桂贞毫无思想准备。好在她孤身独居，无牵无挂，要走就走。

她想了一下，记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说：“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陈阿姨说一声，因为我向来是在她家过星期天的。”

“陈阿姨是谁？”

“她是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离我家不远。”

姓张的一边记下陈阿姨的姓名，一边说：“北京首长关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带些衣服……”

小轿车送秦桂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事有凑巧，秦桂贞刚刚进屋，陈阿姨来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贞快收拾，快走。

“你要出门？上哪儿？”陈阿姨问秦桂贞。

秦桂贞支支吾吾，未敢答复。她只是说，身边总共只剩三角钱了。

陈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钱，借给她。

“后天发工资，你替我领一下。我出门的消息，谁也别告诉。”秦桂贞对陈阿姨说完这句话，就出门走了。

秦桂贞做梦也想不到：她前脚刚跨出家门，抄家者后脚就来了，把小屋里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纸片抄得一干二净，全部带走。

那个完全无辜的陈阿姨，由于目击了秦桂贞离家的一幕，被作为“反革命”遭到审查！

夜空像锅底一般乌黑。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上海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在那里等候。

秦桂贞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她走进机舱，那个姓张的穿着一身军装，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次飞行，总共只有两名乘客——她和姓张的。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专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早已等待在机场的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空军招待所。

秦桂贞独自住在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她向来睡硬板床，因不惯弹簧床，只得躺在红地毯上过夜。她向来做惯了，一下子闲得无所事事，双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好。

她帮助服务员扫地、倒痰盂、冲刷各处的抽水马桶。

她盼望着蓝小姐早日“接见”，以便可以早点回上海——她过不惯这种“红地毯生活”。

终于，三月六日，几个军人来了，说是“首长”有请，要她带上东西走。

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轿车，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她刚坐定，两个军人立即分坐在她的两侧。

卡车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很久很久。

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是什么地方？

她的鞋带、裤带全被没收，换上难看的黑色的衣服。

她的头发被剃掉，只在头顶留下一小撮。

她被单独关进小小的水泥屋里，窗上钉着铁条。

她这才恍然大悟：她被抓去坐牢了！

关押她的地方，便是秦城监狱——关押要犯的场所。

她的罪名，是“首长”定的——“特务”！

天哪，她怎么会成为“特务”？

她，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个。母亲生下她的那年，乡下发大水，没办法，母亲到上海给人当奶妈，她是靠米汤、稀饭喂大的。

才十三岁，她就到上海许家当佣人，刚到许家的那天，天那么冷，她却赤着脚，连双鞋子都没有。吃饭的时候，她光吃米饭，什么菜也不吃，使许家惊诧不已——她在乡下向来吃南瓜、山芋当饭，如今能吃上大米，在嘴里打个滚就吞下去了，还用得着吃什么菜？

她一直在许家当佣人。后来，蓝小姐成了许家的房客。

她看到蓝小姐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出于同情，她瞒着东家，给蓝小姐送饭送菜……

她万万想不到，这个蓝小姐成了“大人物”之后，竟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她是“特务”？她怎么会是“特务”？

纯朴、善良的她，说什么也想不到，蓝小姐成为“旗手”，会变得那样心狠手辣；

她记得，当蓝小姐临走的时候，她送了一本相册。蓝小姐当即送她照片留念，还说“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其实阿桂并不要什么“报答”）；

她记得，一九四六年二月，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蓝小姐抱着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念给她听，才知道蓝小姐改了名字，叫江青。那孩子叫李纳。信是蓝小姐从延安到重庆看牙病的时候，从重庆寄来的。东家读罢信，千叮万嘱，叫她千万别声张；她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她在街上看着解放军进城，寻找着蓝小姐；

她还记得，一九五〇年，东家的孩子生气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学——东家的亲戚家。她请人代笔，试着给蓝小姐写信，她不知道通讯处，就写“毛泽东转江青收”。一个多月后，一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北京大学找她，说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见吉普车，不敢上去。倒是东家的亲戚说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车。车子进入中南海，她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蓝小姐。蓝小姐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是说，不愿再当佣人了，希望参加工作，于什么活都行。后来，北海幼儿园派人找她。从此她成为北京北海幼儿园保育员，干力气活，拖地板，挑水，烧水。由于过不惯北方生活，从一九五八年调回上海，依旧当保育员，每月三十多元工资……

自从一九五〇年跟蓝小姐见过一面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蓝小姐。她也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起蓝小姐。她对蓝小姐的印象还算可以——虽然她很看不惯当年蓝小姐跟唐纳、章泯的关系……正因为这样，事隔多年，当她听说“北京首长想念你”，也就跟着来人应召而去。

经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她渐渐明白了“北京首长”为什么“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给我看。她说：“我差一点被打死在秦城监狱。在那里，我流的

泪水要用面盆装！”

她对江青咬牙切齿，再不叫她“蓝小姐”、“江青”，而是骂她“妖怪精”！

阿桂头上被留着的一小撮头发，原来是打手们在打她时揪脑袋用的。

向来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头发就是在那里变白的。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折磨着她……

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她本在一九四一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孙维世屈死狱中

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玉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

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

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如本书第一章已写及的，江青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

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

“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引者注：由于这个关系，孙维世的胞兄孙泱担任了朱德秘书），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①

^①金山，《莫将血很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青，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

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①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三九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飞往莫斯科。从此，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戏剧表演和导演。一九四六年归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毛泽东赴苏联会见斯大林时，二十八岁的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

孙维世怎么会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内中的因素错综复杂，原因颇多：

一、江青跟孙维世相识颇早。当年，蓝苹进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时，十四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也在那里，深知江青的底细；

二、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跟金山结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敌。当年，王莹跟江青争演《赛金花》时，金山极力支持王莹，跟王莹同台演出；

三、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江青把对周恩来的不满发泄在孙维世身上；

四、在延安时，任白戈写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着演资本家的姨太太，而孙维世演大小姐。首演时，毛泽东前来观看。与江青的愿望正相反，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压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

除了以上四点缘由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据黑雁男著《十年动乱》一书中，写及江青的一段话：

“青年艺术剧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着的一个才子。”^①

^①黑雁男，《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跟孙维世，原本是话剧界同行，从三十年代结怨，旧恨加新仇，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她被定为“关死对象”！孙维世果真被在狱中“关死”。

那是她入狱不过七个来月——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她惨死在囹圄之中！

周恩来闻讯大惊，知道内中蹊跷，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因为孙维世只有四十七岁而已，何况平时身体是不错的。

不料，孙维世的尸体却被火化，未作解剖！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狱中关了七年零四个月，直至毛泽东说了话，他才于一九七五年获释。

他出了监狱，才知妻子早在七年前已不在人世！

报复严朴和杨帆

在江青和叶群密谈时，江青还提及一个仇人的名字，那便是严朴——当年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的历史问题，内中的一个就是严朴。

严朴早已去世。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严朴病逝于北平。在严朴去世后四天，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严朴同志传略》一文。陈云写道：

“严朴同志一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关于个人的事情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临

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评。严朴同志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

“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当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奋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严朴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陈云送了一个大花圈，上题：“魂归江南”。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也献上了花圈。

“文革”的惊雷，连长眠于地下的严朴也不得安宁。他一下子成了两个女人的仇敌：除了江青之外，叶群也对他恨之入骨，因为那个一次次写化名姓^①攻击林彪的，正是严朴之女、陆定一之妻严慰冰！

^①过去常说成是“匿名信”，实际上严慰冰寄给林彪的信署化名，如“基督山”，应为“化名信”。

一九六八年，一群红卫兵扑向北京万安公墓。那块刻着“严朴烈士之墓”的墓碑，被砸得粉碎！

北呼南应。无锡惠山上严朴的衣冠家的墓碑，也毁于红卫兵的铁锤之下。

江青和叶群还觉得不解气。她们扬言：严朴虽然已死了快二十年，要掘墓鞭尸！

严朴之女严慰冰、严昭等，当时都已身陷秦城。严朴的外孙闻讯，赶紧写信给邓颖超。邓颖超把信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深知鞭尸之言出自江青、叶群之口，不顾她们的纠缠，毅然写下一段近三百字的批示：

“严朴同志是好党员，好同志，我与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

“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①

^①转引自严怀瑾（即严慰冰）《严朴生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恩来提及的“三少爷毁家闹革命”，是因为严朴出身于大地主之家，排行第三，人称“三少爷”。

周恩来的批示，终于使严朴遗骨得以保存。

曾经为项英起草过给中共中央电报，反映蓝苹历史问题的杨帆，亦是江青之仇人。

江青对于杨帆的迫害，远在“文革”之前。

杨帆，是在很偶然的的机会，被江青认出来：那是一九五三年一月，杨帆患目疾，视野缺损，经诊断是由于脑垂体瘤引起，赴苏联莫斯科诊治。在那里，杨帆遇上蔡畅，说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蔡畅要去看望江青，约了杨帆同往。

见面了，江青觉得杨帆面熟，便细问起来，她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当年的殷扬！

江青不动声色，记住了这个仇敌！

杨帆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捕的。那天，杨帆在家中吃过晚饭，接到上海市公安局电话，说是要有要事处理。杨帆赶到局里，等待他的是一副手铐！

杨帆被捕的起因，是一九五二年二月，毛泽东来上海视察。二月六日，国民党飞机突然轰炸上海。这件事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密报台湾。可是，后来竟被说成是杨帆向台湾提供情报！不过，在杨帆被捕前，还发生另一件事。

据杨帆回忆：“就在我被捕前的一九五四年三月间，曾经有人向中央写信，揭露江青问题，江青知道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而要求布置追查。当时就有人把我联系上了，说：‘此信与一九三九年杨帆（殷扬）通过项英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是同类问题。’

而我就在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抓了，这难道是巧合吗？”①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杨帆虽说早在一九五四年底就身陷囹圄，几乎被人遗忘。可是，江青仍一直记得这个仇人。杨帆回忆道：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覆灭前的几天，江青曾常到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去，莫名其妙地突然向该厂党委副书记钱小惠同志（引者注：他的父亲为阿英，文学家，本名钱德赋），说‘你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帆吗？这个人太坏了……’可见江青对我是仇恨满腹，耿耿于怀的……”②

②《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刘松林上海蒙难

当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点了张文秋、张少华的名之后，幸亏刘松林给毛泽东写了信，才算使母亲和妹妹免遭江青毒手。

不料，江青“盯”住了刘松林，找“岔子”整她，把她投入了监狱！

自从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把刘松林作为自己的女儿。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后来，又转到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一九六一年秋，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从事翻译工作。

毛泽东劝她再婚，要把她当女儿一样出嫁。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这样给刘松林写信：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日①

①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毛泽东劝刘松林结婚，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

毛泽东让刘松林跟杨茂之见面。一来一往，刘松林满意于这壮壮实实、朴实直率的飞行员。一九六二年，刘松林和杨茂之结婚，住在北京南池子，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

刘松林已经再婚，已不再成为江青心目中的“杨家将”，离开了中南海，原本可以“太平无事”。无奈，在刘松林的母亲和妹妹遭到江青的公开点名之后，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和杨茂之。那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过他们。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么借口逮捕他们的呢？

我于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五日在北京访问了杨茂之。他身材魁梧，军人气派，非常直率。

他回忆那苦难的岁月：

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一九七〇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同一模式。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

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声桌子，把桌子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

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

比如，有一回部队里放录音，老杨听见林彪夸奖江青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女同志”，江青当场感谢“林副统帅”的“鼓励”，叶群则领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老杨听罢，直摇头，说他们在“唱双簧”。这句话，飞快地被汇报上去了，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杨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气歪了江青的鼻子。江青知道，老杨所讲的毛泽东主席的话，势必来自刘松林那里。于是，作为“严重问题”，逮捕了老杨和刘松林……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她并不知道老杨也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的发明，而确实确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次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想写信给毛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

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说娃娃们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一九七九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下榻于空军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

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泾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泾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能是二号楼。

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

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

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贵！”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浆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

“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

“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搥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牲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

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

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

“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

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

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

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

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闵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泾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获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

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于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十七个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

一九七三年七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去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的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一九八六年盛夏，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六章 迫害元勋

煽起打倒陶铸狂潮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个个怨敌、私敌，她更着力于打倒她的一个个政敌。

一个明显的讯号，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发出。

江青说道：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江青在这里没有提及陶铸。这不是疏忽，也并不意味陶铸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内。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中，陶铸名列第四，在陈伯达、康生之前，怎会“疏忽”了他？何况，陶铸是分工管文艺的常委。

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铸的讯号！

江青本来是看中陶铸的，以为“陶铸厉害”，要用陶铸压住邓小平。不过，没多久，江青就发现，陶铸是“保皇派”，他保刘少奇，保邓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武汉的造反派却要打倒他，说他是湖北的“走资派”。

陶铸夫人曾志这样回忆：

“转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后几天了。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约二十六、七日，陶铸很晚才回来，面色阴沉，刚在饭桌旁落座，就十分严肃地说：‘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反倒显得很平静，‘江青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陶铸愤愤地答道：‘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①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陶铸眼看着王任重受到武汉造反派的围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体又不好。于是，陶铸想给王任重解围，便写报告给毛泽东，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治病。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这个会，毛泽东定下的主题是“对任重提提意见”，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在批评了王任重几句之后，火力集中到陶铸身上。据陶铸告诉曾志，“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马——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重点批判”。他们加给陶铸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点把陶铸击倒了！

不过，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曾志所忆：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那天上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主席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接下去，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主席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还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①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毛泽东一席言，那一阵密集的批判的排炮，似乎烟消云散了。

陶铸舒心地笑了。

可是，云眼中露出一缕阳光飞快地过去，滚滚乌云密布苍穹。

几天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九点，夜色浓重的北京街头，忽地爆发出一阵阵“打倒陶铸”的呼喊声！

原来，那是“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江青、陈伯达、康生齐上阵。

江青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独断专行”。陈伯达、康生也发表了反陶演讲。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江青不仅煽动了红卫兵，她也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煽动。

曾志这样回忆：

“（一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总理电话召见陶铸，总理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陶铸问主席是否知道？总理说：‘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引者注：指陶铸在十二月三十日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对他们蛮横无理的要求发火），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的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大好。也就再没有讲什么了。’……”

“文革”是怪事层出的岁月。作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经江青、陈伯达、康生这么一轰一煽，居然被打倒了！

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前一天——一月三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四十九所大专院校派出一百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一月四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五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那“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过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样，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消刘志坚的组长职务。

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一九三四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一九四二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这样，他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肖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刘志坚住在二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肖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十二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发生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支光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囚徒，却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

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前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名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阵营：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生；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组员 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这群不速之客来自北京。他们跟门口的卫兵吵着，硬要冲进大门。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一个瘦削的老人从内屋出来，还没有问清怎么回事，就被北京红卫兵团团团围住。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自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销声匿迹，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彭德怀就是海瑞”，一下子把彭德怀推到了斗争的旋涡之中！

江青，不仅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而且还要把活“海瑞”——彭德怀斗个落花流水！

彭德怀下了庐山之后，被撤国防部长之职。彭德怀给毛泽东去信，要求下放劳动。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批示：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彭德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远离北京市区的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

从此，彭德怀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但毛泽东仍保留彭德怀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度过六个春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罕见的长信，长达八万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长信，翌日便会见了。

彭德怀当天便根据自己的记忆，追记了毛泽东和他的谈话：

主席：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在庐山会议时，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主席问：哪三条？（我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就这样，彭德怀赴西南走马上任。这表明，毛泽东已在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不料，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打乱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的脚下响起了炸雷！就在《“五·一六”通知》下达整整一个月——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戚本禹、关锋就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一信，提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彭德怀：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希望中央考虑撤消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

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那来自北京的红卫兵，是由江青通过戚本禹秘密派遣的。

自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首先发起“红卫兵”，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之中，出现了“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虽说她已四十五岁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给二十岁的韩爱晶打了电话：“现在开展文化革命越来越深入，海瑞一直没有批判，你们应当把海瑞弄回来进行批判。”

韩爱晶一愣，海瑞是明朝人，怎么个“弄回来进行批判”？

戚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韩爱晶顿开茅塞。来自“中央文革”的特别使命，使“天派”红卫兵异常兴奋。那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号称“天派”（“航空”在天），在北京颇有影响。韩爱晶派出最能干的部将，组成“特遣小队”，扑向大西南，扑向成都……

不料，从成都打来的长途电话，使韩爱晶震惊：到手的彭德怀，被人抢走了！

是谁抢走彭德怀呢？

是“地派”！

所谓“地派”，亦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他们也是奉“中央文革”之命，前来“揪海瑞”！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江青给“地派”红卫兵打电话，在戚本禹给“天派”红卫兵打电话之前约一个月。“地派”红卫兵早已到达成都。无奈，他们跟成都军区的关系没搞好，未能弄清彭德怀在哪里。

“天派”红卫兵显然更为“能干”，一到成都就摸清了情况，一下子抓住了彭德怀。“地派”红卫兵闻讯，岂肯让“天派”红卫兵抢了头功？立即从“天派”那里夺走了彭德怀。

“天派”又反过来袭击“地派”，要重新夺回彭德怀。正在争执之际，“中央文革”来电：“不要闹纠纷，可以一起搞。”

于是，彭德怀被交给了“天派”红卫兵。

来自大西南的凶讯，迅速被周恩来获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周恩来致电西南建委、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及北航“红旗”：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①

①马轲、佩璞、马泰泉，《国防部长浮沉记》，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就这样，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晚离开成都，上了一节软卧车厢，由成都部队和北京红卫兵共同护送。

到了北京，正当北京卫戍部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前来迎接时，一大群红卫兵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密令涌上软卧车厢，前去劫走彭德怀！

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江青、戚本禹才不得不同意由北京卫戍区、“天派”和“地派”红卫兵共管彭德怀。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从此，戚本禹得一浑号，曰“威大帅”。

一九七九年，戚本禹在受审时曾写下笔供：

“彭德怀在‘三线’，是我叫去四川串连的学生把他带回北京的。江青当时是力主此议的。康生也是这个主张。”

本来，彭德怀一到北京，戚本禹就准备煽动红卫兵斗争他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致信江青道：“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

由于周恩来的干涉，保护了彭德怀，红卫兵未能公开批斗他彭德怀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引者注：应为二十四日凌晨），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引者注：应为二十五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彭德怀此信，显然是向毛泽东报告自己眼下的处境。他已预感到难逃劫难，所以向毛泽东致“最后一次敬礼”！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入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

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肠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六岁。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一——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刘少奇！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组员。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二十一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二月十五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在张贴大字报，呼喊着重打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正当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哼哈二将。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一九六六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

——女儿刘涛正在清华大学上学。刘涛在那里，人头熟，内情熟，自然便于王光美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父母都是四十年代中共党员，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岁月，他并不畏惧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女，并不畏惧清华大学工作组。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队”。

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倒皆倒，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倒了，刘涛倒了，王光美倒了，刘少奇也倒了。

就在张春桥秘密约见蒯大富之后，就在清华园里“打倒刘少奇”之声沸沸扬扬，就在刘涛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时候，忽地有一个神秘的人物来找她。来者自称是奉江青之命，约她聊聊。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江阿姨”在跟他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革命形势”之后，终于点出了话题：“涛涛，丁丁（刘允真的小名），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哦，江青在施展毒计：因为刘涛、刘允真系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王前所生，江青要这两个孩子去见王前，“跟你们的生母一起揭发刘少奇”！

孩子不知这是江青的政治圈套，果真去见王前，果真“一起揭发刘少奇”。

刘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父亲刘少奇，顿时清华大学为之轰动，北京为之震动，全国为之惊动！大字报马上被印成传单，飞向四面八方。大字报从生活上丑化刘少奇，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时“瞒了十岁”，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的大字报，比蒯大富的“红三司”的震天响的“打倒刘少奇”之声要厉害得多！

“后院起火！心脏爆炸！”江青得意地大笑。她这一毒计，一箭三雕：丑化了刘少奇；挑拨了刘涛、刘允真和刘少奇的关系；使王光美难堪。

那张大字报，如同在刘少奇正在流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

“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从生活作风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可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子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東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刘少奇的申辩，据理据实驳斥。可是，在那种荒唐的年月，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共和国的主席眼看着要跌入没顶之灾……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就在姚文元的那条长注见报后的第三天——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一幕惊险剧在北京发生。

那天下午，快要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电话铃声响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正在家中。王光美接电话，耳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

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王光美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刘平平，刘少奇和王光美所生的女儿，刘少奇的第六个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婚后，共生四个孩子，即刘平平（女儿）、刘源源（儿子）、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女儿）。

王光美正想细问，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刘少奇听说女儿出了车祸，也很着急。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一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

王光美打算马上去医院，但是，周恩来为了她安全，曾下过指示，要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这样，王光美让女儿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去医院。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谁知，到了那家医院，他们立即处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包围之中。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精心设计”的圈套，假称平平遇上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亭亭和源源去了之后，被他们扣留，作为“人质”。他们逼迫亭亭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粉碎性骨折”……

不过，红卫兵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

警卫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落到了红卫兵手中，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刘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周恩来一听，立即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明晨五点之前，必须让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的情景，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三人后来在联名回忆文章中如此记述：

①

①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六、八日《工人日报》。

妈妈严肃地对“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造反派”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江青。没有“江青同志支持”，他们怎敢用欺骗手段去戏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翌日，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传单，就从清华大学飞向四面八方，成为“爆炸性新闻”！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至五月六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至四月八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阿富汗；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

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王光美在党内的影响，也曾使江青极为眼红。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起，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唐山专区抚宁县户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抓“四清”，担任工作组副组长。一九六四年春节，王光美回京，刘少奇跟她谈了四清问题（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同王光美谈四清》）。三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了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四月底，王光美结束了在桃园大队的工作，回到北京。七月五日，王光美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份总结，经刘少奇审阅，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人称“桃园经验”。这份文件下达各级党组织，使王光美在党内赢得了颇高的声望（尽管“桃园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形左实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实际上是效法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借刘少奇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革”，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的垮台而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的恶作剧，使王光美第一次受到凌辱。这样的恶作剧，在中共党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毛泽东风闻此事，在翌日——一月十三日深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刘少奇。

一见面，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坐定之后，刘少奇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提出：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家，面带喜色，因为毛泽东对他很客气，并没有彻底打倒他的意思。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四月一日，对于刘少奇是难忘的。这天，各报都刊载了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指责刘少奇“假反帝、真投降”、“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美化资产阶级”、“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文章，是姚文元那长注的

继续，更是江青当年“初出茅庐”，头一回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继续。

刘少奇看了报纸，忿忿地说：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引者注：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然而，戚本禹的文章，在全国煽起了批判刘少奇的狂潮。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

这个狂潮的第一个浪头，朝王光美扑去！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四月十日，在江青、陈伯达的支持下，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这起因，是因为王光美在随刘少奇访问缅甸时，在晚宴上，戴了一条金项链。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当她见到王光美违反了她的“规定”，就记在了心中。这本是芝麻绿豆之类小事，她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们时却说：“王光美出国访问时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我本来不让她戴，她也答应我不戴了。后来，在看电视时，我却见她戴了项链！”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

光是侮辱人格、丑化形象、败坏名声，江青还觉得远远不够，她要量王光美于死地！

江青要对王光美进行政治审查，建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这个专案组，属中央专案组领导。

据王力回忆：“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江青宣布改组专案组时，除王力一人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专案组，还加上谢富治、汪东兴、叶群、杨成武。小平同志被打倒以后，是康生抓的。中间空了一段，汪东兴实际抓。江青说：‘康老（引者注：指康生）有延安整风的经验，他当组长。专案我要直接抓，戚本禹当我的秘书，具体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负责。’江青多次强调：‘专案组我要抓，我直接对毛主席负责。’”

王力还回忆：“江青要康生向主席建议请示建立刘（少奇）案、邓（小平）案，陶（铸）案。主席说，不能立，都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的常委，不好立。回去后，康生告诉我，说江青在专案组中说：‘不能立，也要立，那就都放到彭（真）案里头一起整。’”

就这样，江青还是设立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虽说是“混”在彭案之中。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地下”转为公开。

关于江青负责刘少奇、王光美专案一事，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在审问江青时，记录如下：①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审判员审问被告人江青：“你是不是控制指挥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江青答：“我是分工在这个专案组里。”

法庭宣读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报告上的批语：“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益的证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应为六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法庭两次播放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的讲话录音。其中有江青说：“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剐，万刀割……”

被告人江青听了播放的录音后说：“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是我对艺术家们谈别的问题，大概插了这么一段。”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江青加给王光美的罪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美国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荒唐的岁月，用荒唐的逻辑，编织着荒唐的故事：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一九四六年“打入”了北平军事调查处执行部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此后又嫁给了刘少奇，“埋伏”在中共核心圈之中，“窃取”最为重要的“战略情报”……

为了“证实”如此荒唐的故事，就从王光美当年求学的辅仁大学下手了……

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一九二五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三院。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一九五〇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至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祥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祥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拘捕杨承祥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七月十九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祥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祥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祥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祥夫

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祥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祥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

“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柞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周耀澄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

“通过审查杨承柞、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决，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柞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柞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柞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柞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柞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一九七〇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关于杨承柞死亡报告》中写道：

“杨承柞病情时好时坏。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三日八时零三分死亡。”

就在杨承祥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受苦受难。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祥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一九六七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柞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

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他，怎么个终于“交代”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

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

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柞、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肖孟回忆道：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

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柞，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一九四六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柞。专案组拿来杨承柞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柞”，叫他“认识”。

“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柞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项。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候审”。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候审”；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候审”。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六十六岁的陈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

“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他“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

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狱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①

①转引自一九八〇年一期《党史研究》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②

②一九八〇年一期《党史研究》。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志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也就在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①

^①一九八〇年一期《党史研究》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

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三月四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二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①

^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态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

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江青果真不死心。一九六七年十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里“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也就在这时候，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档案馆选择派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一月，嘱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〇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

“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

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②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③

^{①②③}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教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一九八三年）。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康生也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口授一份记录：

“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①叶永烈，《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陈云在江西》，《知音》一九九二年三期。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

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

“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上，用颤抖的手写下：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进入手术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他去世之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会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利用那个伪造的启事把他打成“大叛徒”！

怀疑狂·迫害狂

江青是个怀疑狂，迫害狂。她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聂荣臻元帅……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刚刚结束，聂荣臻得了肺炎，住进北京三〇一医院。

陈毅前来看望他，说道：“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惊然，真为你捏一把冷汗！”

聂荣臻懵了，不知陈毅讲的是什么简报。

原来，那份简报是补发的。聂荣臻在会议一结束就住院了，未见到那份简报。

简报记载的，是江青的发言内容。江青说：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江青旧事重提，含沙射影，那矛头直指华北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又是“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又是把特务“处决灭口”，那不就是在说幕后指挥是聂荣臻吗？

聂荣臻听罢陈毅讲述的简报内容，虽然对江青的诬告非常气愤，但心中却很坦然，他说：“这件事，毛主席很清楚！”

江青那里一阵风，北京就一阵浪。没多久，北京街头就出现触目惊心的大字标语：“聂荣臻谋害毛主席罪责难逃！”

在那种年月，“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足以置聂荣臻于死地！

江青对聂荣臻咬牙切齿，无非是因为聂荣臻和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一起，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北京怀仁堂，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以及谢富治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被称为所谓“二月逆流”。于是，江青覆手为雨，翻出城南庄旧事，颠倒黑白，加害于聂荣臻！

红卫兵们贴大字报，撒传单，炮轰聂荣臻。倒是如同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城南庄事件很清楚，所以尽管江青加在聂荣臻头上的罪名很吓人，仍无济于事。

江青耿耿于怀。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在华北会议上，江青又一次提起城南庄事件。这一回，她干脆指名道姓，点了聂荣臻夫人张瑞华：

“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一九四八年主席由延安到华北，住在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阜平县城南庄（引者注：又称城南庄），结果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否张瑞华告的密？”

毫无事实根据，仅仅凭借推测，江青就诬指聂荣臻夫人“可能”是“特务”！

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江青还说：“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黄杰是叛徒！”

信口开河，凭借“怀疑”，就诬指徐向前夫人是“叛徒”！

那年月，江青手握“专案”大权，不可一世，随意在各种场合，给人加上种种“大帽子”。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代表时，称陆定一是“军统特务”。

她的原话是：

“陆定一作为一个部长、中央委员，一个屁也不答，说明问题，陆定一是军统特务。我现在才知道，可能还要复杂。”

也就在这次讲话中，江青称周扬是“日本特务、美国特务、国民党特务”，诬指胡乔木是“叛徒”。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周扬专案组”时，又一口气点了许多“特务”：

“王昆仑、钱俊瑞、曹亮、廖沫沙也是证据很厉害的特务。肖望东呢？历史反革命，有没有现行反革命？他调到文化部做文化部长，他成了‘武化部’了。肖望东枕头底下有一支手枪。”

她还说：

“齐燕铭这个问题很容易，现行反革命嘛！那厉害得很呢！凶得很呢！”

江青还诬称荣高棠、田汉、阿甲、王昆等是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

江青信口雌黄一句话，就会使一个人无端被投入狱中好多年，甚至被迫害致死。

据特别法庭统计，仅从江青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七〇年七月的部分讲话录音中，查出江青直接点名诬陷的有一百七十二人！其中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十八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写给江青的一封“密件”中，开列了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名单。除了由江青在各种场合点名之外，

据特别法庭统计，在“文革”中，由康生直接点名诬陷的多达五百九十二人之多！

《红楼梦》第五回中有两句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江青“得志”，无比“猖狂”！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七章 步步高升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

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这八篇讲话是：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

《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

《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师、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师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报导是这么写的：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陈伯达倒向林彪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

不得不从命。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

锁毛泽东的声音”！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〇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〇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祠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

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

副主席……”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峻岭”何人？江青也！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字，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这几年，他（引者注：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

专案组统一处理。”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八章 《红都女皇》

北京盛传“江青要当副主席”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一九三三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所载报导《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导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导，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三月二十六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峰巅。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毛泽东突然休克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至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一九七一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一月十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军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张玉凤眼中的江青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一九六八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注：连载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一九七〇年七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

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七月十八日一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容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已。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尼克松眼中的江青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一九六三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勋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九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一九三六年斯诺前来陕北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一九一七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被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一九四二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弃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十年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一九五六年五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一九七八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维特克此行，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她学过中文，虽说并不精通，但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她要求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邓颖超、康克清接见了她，回答了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考虑：邓颖超早在一九二七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这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红都女皇》畅销于西方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

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导：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特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一九八八年第九期《新观察》，《〈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八月二十五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

“江青于八月二十五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八月三十一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他们根据江青的指令，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咐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印成一本又一本。一九七三年三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终于都印了出来。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

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周恩来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一九七三年四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封面上印着江青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

维特克夫人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江青同志》的出版，达到了江青的目的。这本书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西方报纸还多次报道有关此书的“幕后新闻”：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江青在与维特克会见时，要求维特克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范本”写作她的传记——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报导，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美联社报导，维特克所作江青谈话笔记在她的办公室丢失。过几天又报道，“丢失”的笔记本已找到了。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当新华社有关人员向姚文元请示，可否把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关于毛泽东主席批评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消息，刊载在内部参考刊物上，姚文元在电话中答道：“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登刊物。”

其实，毛泽东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曾颇为震怒。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十九章 攻击“周公”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一九七二年越做越美：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

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生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后来，毛泽东渐渐不满于刘少奇，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

于是林彪成了毛泽东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粉身碎骨，毛泽东第二次遴选接班人失败。

眼下，毛泽东不能不郑重其事地第三次考虑他的接班人。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何况他在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立了“大功”。可是，也许因为他跟江青的关系过分密切，毛泽东也没有考虑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

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一九七二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

“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一九八八年版。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印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章、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

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后的二十多天——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说是来京“学习”，连此人自己也一时闹不清来京干什么。

此人只有三十七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王洪文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岁，名唤“华国锋”。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一九三八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一九四五年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一九四九年南下。一九五一年六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九五八年，华国锋任湖南省副省长。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六八年八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

一九七一年二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参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了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在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一九五一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一九六八年后，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为在爆发“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四月十二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邓小平出现了！这是 he 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注：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四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中共“十大”的有关问题。经毛泽东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还作出了“惊人”的决定：成立中共“十大”准备委员会，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王洪文一下子被提升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意味着他成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

江青在党内的地位朝后退却了，叶剑英坐在了她的前面。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这表明中共组成了新的领导阵营。在大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江青原先极力想成为中共第三把手，如今已被王洪文所取代。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这么一来，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摆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镜头，也没有他退场镜头！虽说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的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迫不及待”地攻击周恩来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

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指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她，喊“九哥”。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王海容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长沙人。在长沙读完初中，于一九五二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一九七〇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一九七二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翻译，便是王海容（后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一九七一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原名唐锡朝，一九一〇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一九二七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一九四〇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他们的女儿出身于纽约，那就是唐闻生。正因为这样，唐闻生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唐闻生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创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闷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囑令《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勾”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藉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咐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续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九月十五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九月二十七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子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

“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捉摸“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

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一首诗表态：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团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党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十五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七四、三、二十日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四月二十八日，发生缺氧病状；

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六月一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六月二十二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二十章 “组阁”失败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

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〇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一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太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

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

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

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

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 Politics 比他强。”

“Polit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

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批示：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

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最后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二八、六、一九七六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

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开了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

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

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二十一章 发动“批邓”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荻。笔者在一九九〇年六月与芦荻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荻。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荻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荻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

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

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

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项桂冠。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

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江青嘱咐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导。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华国锋主持“批邓”的“转弯子”会议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自从“打招呼”之后，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五个接班人

张春桥既为自己未能当上总理而懊恼万分，也为邓小平遭毛泽东否定而幸灾乐祸。二月三日，张春桥在《有感》中诅咒邓小平：“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说：（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

对抗方面去。”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等。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引者注：指江青），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车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年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车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师，所以他首先打我。……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

江青在讲话中，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俨然一派“红都女皇”的口气：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的这番“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尽管此时她正得势，但毛泽东仍于三月十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天安门广场爆发反江青的怒火

丙辰清明节——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人如海，诗如潮。人们缅怀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心底的吼声。

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

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

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

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谎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数十万群众、数千个花圈，云集天安门广场。丙辰“天安门事件”，震惊中外。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定下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和诗歌的人。她还提出，清明已过，花圈要组织人马连夜全部运走！

当夜，毛泽东听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汇报，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被民兵和公安人员迁走、销毁，与群众发生冲突，开始捕人。当晚，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镇压了群众的抗议运动。

七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七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

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江青一气之下，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幕

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九七六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口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智尚清楚，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

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二十多天后，七月六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导

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

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八月二十六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八月二十八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

八月三十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九月二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九月三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外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骑马、逗鹿、玩兔、玩得好痛快。

九月五日晚，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江青正在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她，毛泽东病危，火速返京。夜十一时，江青这才离开了大寨。

毛泽东是在八月下旬病情加重的。八月二十八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多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九月七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当时的情景：

“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

“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搅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非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罗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一九七六年，长达四十一年。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十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本来，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只是由于毛泽东生前坚决反对她继任党的主席，因此，在中共中央九月九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夕——九月八日，清早七时，江青忽地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她请工人吃文冠果。这种产于北方的木瓜，又叫“文官果”。江青特意解释道，请大家吃“文冠果”，意味着“文官夺权”。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稿，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

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稿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终于得以顺利举行。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睽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披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

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一八九五——一九七四）死于任内。庇隆夫人以一身黑出席追悼会，并继承了庇隆总统的最高权力。江青以她特殊的形象，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荧光屏上。不过，她的“戏”，已临近最后一幕了……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少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很快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九月二十九日夜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九月十九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

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远新的工作问题，陷入僵局。江青又哭又闹，最后才说出，留下毛远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此言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吃惊，连他们都未听说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呢！会议一直开到子夜，还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会上当面争吵，会下更是剑拔弩张。一场政治大搏斗，在中国已经不可避免！

江青在筹备“最盛大的节日”

就在大闹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频频四出活动，发表讲话。

江青来到清华大学大兴农村分校，来到二七机车车辆厂。

她信口而说，发表这样的讲话：

“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讲，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诸位都是我们女人生的！”

她又说：

“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她谈起了康熙皇帝，来了个“古为今用”：

“康熙皇帝这个人很厉害，六岁登基，身边有个大臣叫鳌拜，不让他掌权。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要求选一些少年进宫一起踢球、栽跟斗，这些人都会武术。有一天，鳌拜一人进宫，康熙就指使这些青年把鳌拜抓起来杀了。”

讲这番话时，江青显然以康熙皇帝自命。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发表讲话，大骂邓小平：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引者注：王洪文曾回上海“调查研究”一段时间），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引者注：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江青还说：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一九八八年。）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在秋天的阳光下，苹果正熟。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江青的“最盛大的节日”是什么？她笑而不言。

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

“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江青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她又笑着不愿道破。

十月一日，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

“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什么“特大喜讯”？什么“公报”？江青在葫芦里卖药！

十月二日，叶剑英从沈阳军区得到异常动向：毛远新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来北京！

孙玉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在保卫珍宝岛战斗中一举成名。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的珍宝岛，当时成为中苏之争的焦点。苏联坦克二十余辆、装甲车三十余辆、步兵二百余人突然向该岛发起进攻。孙玉国是该岛边防站副站长，作战有功。三个月后，他跃为中共“九大”代表。二十八岁的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中共“九大”上作为部队代表发言。不久，中共军委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一九七三年，三十二岁的他，飞快地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翌年，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跟毛远新交往密切。王洪文当面向他许诺，将来提升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于是，孙玉国也就成了江青麾下一员战将……

叶剑英急电沈阳军区，命令那个装甲师返回原地！

十月四日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中午，在北海仿膳用餐。江青一边吃着，一边向同席者说：

“我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要加强锻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斗争是长期复杂的……”

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地位，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内中发出了不寻常的充满杀气的讯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所称“修正主义头子”，明白无误地指华国锋：十月二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华国锋的批语指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中错了三个字！华国锋还说，我有毛泽东主席的原稿为证。张春桥得知，急忙以“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阻止华国锋的批语下达……

“梁效”的文章强调：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在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作了批语之后，“梁效”仍然“对着干”，而且倒打一耙，说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十月五日，迟群在给毛远新的信中，声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十月六日，总决战终于在北京打响……

世界各报竟载《毛的遗孀被捕》

“新闻记者的耳朵，连睡觉时都是竖着的。”此言不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清早，英国《每日电讯报》送到订户手中时，一条十月十一日发自北京的电讯，一下子便轰动了伦敦。

那醒目的三行大字标题，把读者镇住了：

眉题——华粉碎极左分子

主题——毛的遗孀被捕

副题——四个领导人被指控策划北京政变

《每日电讯报》是独家新闻，首次在上报导了中国政局的突变！其他的报纸都晚了一步，在翌日才竞相刊载《毛的遗孀被捕》的新闻。

《每日电讯报》那独家新闻，是该报驻北京记者尼杰尔·韦德从北京发出的。他并非“老北京”，四个月前，他才从驻华盛顿记者调任驻北京记者。

据韦德说，他最初注意到，九月十六日，中国各报都在显著地刊载所谓的“遗言”，即“按既定方针办”，可是九月十八日华国锋在追悼毛泽东的百万人大会上致悼词，却没有提到这句话！当时，韦德在收看大会实况转播电视，他注意到，王洪文站在华国锋身边，不时不安地从华国锋的肩膀后看着华国锋的手稿。仅仅凭借这两点，韦德机智地发现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步调不一致”！

十月十日，韦德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中国雇员那里，得知北京大学出现了不寻常的大字标语。他当即追踪这一消息，终于摸到发生在北京、但又处于严格保密之中的重大新闻。

十月十一日，他从北京发出了电讯《毛的遗孀被捕》：

“据北京可靠消息，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她在中共政治局的三名追随者被指控策划政变而被捕。

“这一被捕行动是在周末特别会上向工厂和附近单位的政工人员宣布的。首都昨夜没有发现骚乱现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所谓‘上海帮’是一九七一年前国防部长林彪企图发动政变后，中国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闻。”

韦德由于第一个报导江青被捕，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赞许，成为“新闻界的新闻人物”。

江青及其同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是在十月六日被捕的。关于这一举世瞩目的“爆炸性政治新闻”的详细内幕，在事件发生十多年后，才慢慢地从中共高层“渗透”出来。

近年来，正儿八经的官方文献中，透露内中细节的是《李先念文选》第一五七条注释：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这条注释虽然不是李先念写的，但编者在加这条注释时，显然请教过李先念，写毕后又经李先念过目。这条注释是迄今为止，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内幕的最权威的记述。当然，这条注释也有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提及也曾起了重要作用的汪东兴——虽然他在后来犯了错误。

关于如何逮捕“四人帮”，曾有过众说纷坛的传说。内中较为准确的记述，是范硕的《叶剑英在一九七六》一书：

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商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于中午一时发出电话通知。当晚八时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议题两项：一、审议《毛泽东

选集》第五卷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

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但是，姚文元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决定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

晚上七时，华国锋和叶剑英几乎同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而汪东兴则早已带着警卫人员守候在那里。

七时五十五分，张春桥来了。一进入怀仁堂正厅，立即被捕。

紧接着，王洪文到达，步入怀仁堂正厅时，遭到和张春桥同样的命运。

姚文元迟到，八时一刻才来。一进门，他便被捕，押往东廊大休息室。

至于江青，她不是政治局常委，没有通知她前来开会，对她实行单独解决。

奉命前去拘捕江青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九日、十日，在西南某地，访问了已经七十有六、离休多年的张耀祠，请他详细谈了拘捕江青的经过——这是他第一次对外透露此事。

张耀祠，早在他十六岁——一九三二年，便已在红都瑞金为毛泽东站岗。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直至毛泽东去世。一九五三年五月，张耀祠出任中央警卫团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为汪东兴)，负责北京中南海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虽然名为中央警卫团，实际上是师的编制，他是师长。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一九六四年，升为少将。

张耀祠清楚地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下午三时，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来一下。他和汪东兴都在中南海办公，他很快就来到汪东兴那里。多年来，他一直是汪东兴的副手，常到汪东兴那里。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奉命来到那里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命令式口吻对张耀祠说：“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一听，感到颇为振奋。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继续说道：“分四个小组行动，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你负责江青小组。你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你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制定的“十·六”行动计划。

张耀祠作为八三四一部队（亦即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对于中南海了如指掌。当然，他对于江青和毛远新的住处，也极为熟悉。那时，江青虽然长住钓鱼台，但近来住在中南海万字廊二〇一号，而毛远新则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离江青住处很近。

拘捕江青的一幕，我曾听到过种种传说：江青在地上打滚，大喊大闹……

张耀祠笑道，这些传说纯属“推理”、“想象”。

这位历史的当事人，叙述了那转变中国历史的一幕。那过程似乎并无“惊心动魄”之处，他说得那么平淡：

他离开了汪东兴那里之后，便着手作了安排，把这一重大任务向几位警卫作了交代。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带领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在张耀祠看来，拘捕毛远新、江青，易如反掌——他们四周的警卫们，本来都是张耀祠的部下。

张耀祠来到毛远新那里，向他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带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江青那里，张耀祠常去。尤其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差不多他每天要上江青那里去一、二趟。正因为这样，他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这一回，张耀祠与往日不同，他站在江青面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说了以下一段话：

“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眼怒视，但并没有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

江青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进钥匙，再把信封两端用封条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江青自己的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司机也是张耀祠的部下。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十月六日夜，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里。

震惊中外的“十·六”行动，兵不血刃，未发一弹，“四人帮”便被一网打尽！

人称：这是中国的“十月革命”！

六天之后，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把《毛的遗孀被捕》，公诸于世……

十六年之后，张耀祠在与笔者的长谈中，首次披露了他当年拘捕江青的详情……

——(本章结束)——多多电子书——

第二十三章 尾声

被告席上依然演员本色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北京正义路一号人头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这里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主犯共十六名，即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内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死，出庭受审的是十名主犯，人称“十恶不赦”。

下午三时整，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三时十五分，江华宣布“传被告人江青到庭。”

已经四年多没有公开露面的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送下，走出法庭的候审室，站到了被告席上。

江青是梳洗打扮了一番出庭的。她的目光是傲慢的。据云，在出庭前，她为自己订了三条“决心”：

“一、永远保持英雄形象，保持革命者应有的志气；”

“二、绝不向修正主义者低头；”

“三、坚持真理，不认罪、不怕死。”

据副庭长伍修全回忆：在开庭之前，“我们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那次看到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

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据云，江青在关押期间，每日闻鸡起舞，锻炼身体，为的是上法庭“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说：“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尚光荣。”

开庭之前，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江青曾会见律师。她提出，“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律师答复她：“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江青说：“我提出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律师答：“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他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江青也就向律师问起问题来。她很快就发现，律师是站在“那边”的立场上，解答她的问题。她恼怒了：“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作我的律师！”

这样，江青拒聘了律师。

公审之前，江青被押往正义路法庭候审室。那候审室共十间，供十名主犯各居一间。屋里有一桌、一椅、一床和一个厕所。她提出要在床头挂一幅毛泽东像，遭到拒绝。不过，她要求在桌上放一套《毛泽东选集》，倒是被接受。

江青依然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总是穿一件黑色棉袄出庭，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打了一块补丁。比起其他九名主犯来，她坐在被告席上，表情要“丰富”得多：时而冷笑，时而蔑视，时而怒气冲冲，时而装聋作哑，依然演员本色。

她跟张春桥全然不同。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耷拉着脑袋，如一段木头。她则喊喊喳喳，要辩解，要“反击”。

在受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江青总共出庭十次：

第一次，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法庭宣读起诉书；

第二次，十一月二十六日，庭审“长沙告状”。

第三次，十二月三日，庭审“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非法逮捕无辜；诬陷王光美”。

第四次，十二月五日，庭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特务’、‘反革命’”。

第五次，十二月九日，庭审“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第六次，十二月十二日，庭审“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诬陷迫害邓小平；诬陷陆定一”。

第七次，十二月二十三日，庭审“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第八次，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辩论。

第九次，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庭辩论。

第十次，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和另九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法庭宣判。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在最高法庭对江青进行犯罪事实调查时，江青最常用的答复词是：“不记得了。”

有时，进了一步：“可能有的，不记得了。”

查一下庭审记录，江青回答“不记得”，几乎占她说话的十之七八。

偶然，她也答复：“是事实。”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法庭进行辩论。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知道她作为被告人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护发言，江青早就作了准备。

江青声称，她要在法庭上宣读“宣言”！

她的“宣言”是什么样的呢？

起初，她想写一首长诗，一首比文天祥的《正气歌》更加“雄壮”、更加“磅礴”的长诗。她曾向监狱当局要了《文天祥集》，要了《辞海》。不知道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激情”，还是本来就缺乏“诗才”，折腾了三天，“新正气歌”没有写出来。

她又说要学屈原的《楚辞》，依然没写出什么“留存千古”、“映照青史”的“史诗”来！

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被告人江青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

于是，江青拿起了一叠纸，站起来宣读《我的一点看法》。那标题，似乎还算“谦虚”，只是“一点看法”而已。不过，她的“诗一般的语言”，充满火药味：

“项庄舞剑，意有沛公。投降叛变，授人以柄。要害问题两个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继续革命。以三项指示为纲，以目混纲，修正反党。穷凶极恶，大现原形。掩盖罪恶，画皮美容。树立威信，欺世盗名。标新立异，妖言惑众。弥天大谎，遮瞒真情。偷天换日伎俩，上下其手劣行。张冠李戴——强加。移花接木——暗中。栽赃嫁祸他人，推责盗誉——缺公。转移人民视线，妄图施耍臭名，罗织诬陷中央文革，迫害灭口有关知情，笑修正主义螳臂之輩，推动世界的动力乃是人民大众英雄。”

江青的“看法”何止“一点”。她在法庭上滔滔不绝，作此生此世最后一次公开演讲：

“逮捕审判，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

“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

江青质问法庭：

“怎么能把谋害人的和被谋害的搞在一起？说以江青为首的搞这个阴谋活动？”

“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江青说起了自己当年跟毛泽东转战陕北，质问法庭：

“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女同志只有我一个，你们躲在哪里去了？！”

江青念《我的一点看法》，历时近二个小时。

江青念毕，把原文交给了值庭法警。

审判长反复问江青：“还有什么要说的？”

江青答：“已经累了，到此为止。”

于是，审判长宣布把江青带出法庭，休庭。此时已是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第一审判庭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在庭长江华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员江文就江青二十四日上午的长篇辩护词，予以逐点批驳。

江文说：

江青在长达两小时的所谓辩护发言中，对本庭指控她所犯的严重反革命罪行，没有提出任何可以证明她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通篇不过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转移目标，掩盖罪责的谎言和诡辩……

江文发言毕，审判长曾汉周问江青还有什么话要讲。

江青忽地提出要看中共“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审判长认为，被告人江青的要求，与本案无关，予以驳回。

江青发怒，说审判长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她谩骂法庭，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大声说道：

“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这时审判长向江青宣布：

“你在法庭辩论中，对特别检察厅指控你的犯罪事实不是进行陈述和辩护，而是利用法庭辩

论的机会，进行诽谤、谩骂，法庭一再警告你，你不服从法庭的指挥，违犯法庭规则，现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江青又继续作“最后的陈述”，咒骂法庭“包庇、减轻真正的罪犯”。她攻击邓小平，咒骂华国锋是“叛徒”。

宣判时的闹剧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北京正义路一号特别法庭爆满。对十名主犯公开宣告判决，在这里进行。

这天，江青是十名主犯中起得最早的一个。显然，出于对最后判决的关注，她一夜没有睡好。开庭之后，由庭长江华宣读判决书。判决书很长，达一万六千多字，江华读完“集团罪”部分，然后由副庭长伍修权宣读十名主犯“个人罪”部分，再由江华接下去，直至全部读毕。在“个人罪”这一部分，江青名列第一位。关于江青的犯罪事实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作出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迫害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杨一辰、杨承柞、王广恩和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柞病危期间，江青决定对他“突击审讯”，使杨承柞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指使对病势危重的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丁觉群、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江青等人的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江青在各种会议上，点名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使他们一一受到迫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点名诬陷张霖之，使他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诬陷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是“工贼”，使时传祥遭受严重摧残，被折磨致死。

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在上海非法搜查了郑君里等五人的家，致使他们受到人身迫害。

一九七六年，江青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同年三月，江青在对十二个省、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点名诬陷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

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江青戴着耳机，侧着脑袋，很仔细地听着伍修权宣读的关于她的“个人罪”的部分。

最后，由庭长江华宣布判决，他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念道：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

顿时，全场寂静无声。江青伸长了脖子，屏息敛气，侧过了耳朵——她预料，排在第一名的，一定是她。

果真，伍修权提高了声调，放慢了速度，每一个字都念得清清楚楚：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

江青一听，顿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乱喊乱叫。

此时，万众欢呼，人心大快。

随着伍修权的命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两名身穿蓝色制服、腰佩手枪的法警，拖着耍赖的江青，拉出了法庭。

到了外边，法警一松手，江青干脆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吵、大闹，口中还不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

这时一位法警对她猛喝一声：“江青，你听清楚了没有——判处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就像吃了“止哭剂”似的，江青一听，不哭、不吵、不闹了，马上乖乖地从地上爬起来。

原来她太沉不住气了，刚才她在法庭上只听见“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就闹了起来，没听见后面的一句话——“缓期二年执行”。

江青，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精彩的一幕闹剧——她太沉不住气了！

关于江青的判决，伍修权曾说过特别法庭反复研究的情况：

“这次判决，在国内是大快人心，国际上的反应基本上也是风平浪静，各方都认为我们判得还是合理的，没有发生什么异议。在宣判以前，国际上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当时我们已经看出苗头，如果立即杀了江青，反映可能很坏，有的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有的外国人到我国驻外使馆去请愿保护江青，并且国际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条，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虽然我们是独立审判，不应受外国的影响，但这些情况在判刑时也不能不予考虑。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原来估计国内可能会有人不满，现在看来也都被大家理解和接受了。”

在判决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特别法庭派出司法警察，向江青送达了判决书。

在判决后一星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彭真在正义路一号，逐一会见十名主犯。江青见到彭真时，骂他是“邓小平的走卒”，她要“见华国锋问个明白”，并要求“见邓小平一面”。彭真见她毫无认罪的表现，谈话也就不了了之。

唐纳的后来

走笔行文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本书前文提及的、与江青关系颇为密切的几个人物后来的命运。幸亏唐纳在“文革”岁月，身居海外，“旗手”鞭长莫及，他才免遭毒手。

虽然由于他跟蓝苹有过那么一段关系，他的名字是人们熟知的，但是他与蓝苹离异之后的经历，他怎样来到海外，他的后来情况如何，却是鲜为人们所知。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

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报海旧闻》中，这样提及唐纳：

“……正好这时（指一九四五年——引者注），英国大使寇尔从重庆来到上海。原在《大公报》编过副刊的马季良（唐纳）兄，那时在英国新闻处工作，我们找他商量，他对我们的打算，极表赞成。于是，我们写好了一份‘请帖’请他代为递交寇尔。”

此后唐纳竟受徐铸成之邀，在上海出任《文汇报》副总编。

一九四九年，唐纳来到香港，担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

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唐纳从香港给上海的郑君里寄来一封用泪水写成的信：

君里兄：

迟复为歉。

我想等我决定了自己的归宿再告诉你。昨日我向总主笔提交了辞呈。我预备先赴美国，在华侨主办的《纽约日报》工作，过了一年半载，再赴法和安那（引者注：即陈润琼女士）定居。

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人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唯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革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革，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

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愚弟 季良顿首

香港·荷李活道

不久，唐纳去了美国。在《纽约日报》社，在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

一九五一年他来到巴黎，定居那里。

他的挚友笑着告诉我，唐纳为什么会离沪前往海外？原来，这是与他对妻子陈润琼的一片痴情有关……

一九三九年，当唐纳担任《大公报》记者时，在武汉认识陈珊，产生感情。结婚后，有过一个男孩。翌年，由于陈璐另嫁一位盐商，他便与陈璐离异了。

此后，他一直独身，忙于写作。

一九四七年八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自由论坛报》一位女记者操流利英语，谈吐非凡，举止端庄，才貌双全，顿时引起唐纳的爱慕，居然一见钟情。这位女记者，乃国民党政府前驻法大使陈录的三女儿陈润琼，福州人，不仅英语娴熟，而且法语纯正。

唐纳有意，陈润琼却并未首肯。

陈女士去香港工作，唐纳亦调往香港任职。

陈女士到美国在联合国工作，唐纳亦随往美国。

陈女士发觉，唐纳为人善良，富有才华，富有人情味。据云，唐纳每天给陈女士献上一束花，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陈女士终于为他的痴情所感动。一九五一年，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迄今三十五年了，夫妻白头，恩爱如初。唐纳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饭店来了。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后来的“京华饭店”，到后来的“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

陈女士为人能干，善于经营，成为唐纳的贤内助。自一九七九年起，唐纳退休，饭店交给陈女士经营。

唐纳与陈女士婚后，生一女儿，取名马忆华，想念祖国之意。如今，马忆华已大学毕业，亭亭玉立，成为唐纳夫妇的掌上明珠。

远在异国他乡，唐纳过着小康生活。

据说，那位为江青立传的美国维特克女士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曾两次前去找他，愿以二十万至三十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唐纳坚决拒绝。

也有的海外报纸曾载唐纳在饭店二楼举办江青照片展览，以招徕顾客。唐纳断然否认。唐纳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唐纳才得以几度返回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笔者看过他在各地旅游时所拍的照片，他的交际困仅限于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终年七十四岁。

据云，他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他曾找人寻找当年他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导。只是他几度提笔，未曾写出这部自传，使病重了。

徐明清为江青吃冤枉官司

徐明清也是与江青有过密切关系的人物。

解放后，徐明清担任中央某部人事司副司长，跟江青没有什么来往。毛泽东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不同了。他们住在中南海，门卫森严，再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可以串门似地步入毛泽东的窑洞。

黄敬在解放后成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他遇见徐明清，还是亲热地喊她“阿徐”。

在“文革”中，江青一跃而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在政治舞台上“露峥嵘”。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干部，在全国掀起了抓“叛徒”恶风。于是那些过去曾被捕、坐过牢的老干部，一下子都成了“抓叛徒专案组”审查对象。徐明清在一九三五年四月曾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成了“审查对象”。一九七二年，徐明清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徐明清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六月十九日、十一月十六日，三度写信给江青，希望得到申辩，推倒不实之词。徐明清在信中写道：“三十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上是了解的。”徐明清本来以为，江青会如实为她作证。不料，江青不予置理。那些日子，徐明清过着换斗、受批的生活。王观澜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受到几十次的批斗。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他参加陈正人追悼会，遇见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握着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说道：“身体不错，没有浮肿。能工作！能工作！”紧接着，周恩来便安排王观澜为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观澜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担任农业部顾问组组长。

然而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之际，徐明清却蒙受了一场历史的误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

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立即开始了。

一查江青的档案，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时所写关于江青历史情况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三十年代，徐明清与江青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诚如所有的江青传记都要提到徐明清。

于是，就在江青被捕的第四天——十月十日，中央专案人员便来敲徐明清家的门了。在作了审讯式的谈话之后，便要徐明清写材料。

徐明清所谈、所写，大致上跟在延安时所写的材料差不多。

专案人员看了以后，认为徐明清写的是“客观主义”，“不深刻”。何况，她当时头上还戴着“叛徒”的帽子，专案人员认为她在“包庇”江青。

于是，她失去了自由。她被关押在一个至今不知地点的房子里，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着她，要她交代，要她写材料，弄得她的神经有点错乱了。

一九七六年年底，徐明清被押往秦城监狱。在那里，徐明清受到更加严厉的审问。当时，就连王观澜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撤消了！

在逼供信的情况下，徐明清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写了一份交代。徐明清说，这份交代是由审问者口授，由她执笔写成的。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被逼而写的这份交代，在两个月后——一九七七年三月六日，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之中，印发全国。文件中所加按语说：

“一九三三年秋，江青在上海展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一九三七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指江青）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这份“红头”文件，富有权威性。种种江青传记差不多都是依据这一文件中的材料，写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关系。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真实情况的老同志开始自觉反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着手调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信息，是从胡耀邦的一次报告中发出的。那时，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批评了乱抓人的问题，一口气点了二十多个遭到乱抓人的名字，内中提及了徐明清。这表明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注意到徐明清冤案。

不过，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江青的历史问题，事关重大，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提出“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给徐明清带来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中央组织部着手认真调查徐明清的历史情况。

一九七九年四月，秦城监狱的看守忽然通知徐明清，说是要她进城看病。她觉得奇怪，说自己没有生什么病。看守说反正有车进城，你随车去检查检查身体也好嘛。既然如此，徐明清答应了，准备进城检查身体。可是看守又通知她，把东西收拾一下，全部带走！

徐明清心中纳闷，不知究竟，只得照办。

进城之后，她被安排住在一家监狱系统的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原本憔悴如鬼的她，经过一个多月休养，算是有点人样了。

一天，她正躺在床上，监狱长忽然进来，通知她：“赶紧起来，回家去！”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快，快，王观澜同志派车来接你啦！”监狱长说，“他和孩子们在外边等你呢！”

真是喜从天降，徐明清连忙翻身下床。不过她细细一想，又站住了，问道：“你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说我是‘叛徒’。一定要把问题讲清楚，我才能离开这里！我在监狱里写的材料，是你们逼我写的，我不承认！”

于是，请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单位的代表，向她明确宣布：“你先回家休息，组织上正在调查了解，不久就会对你的问题作出正式结论，请你放心。”

就这样，徐明清和王观澜以及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中。

不过，她的案子“通天”。被逼所写的材料，上了“红头”文件的。正因为这样，她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仔细调查，而且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

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进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得到了认真、坚决的贯彻。她的“通天”案子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

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径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这样从“文革”中抓“叛徒”开始，直到后来因江青问题蒙尘，风风雨雨十四年，徐明清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艰难的日子。

她与笔者长谈。最后，她谈及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

“人是会变的。江青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了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等等问题……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徐明清于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二日给笔者来信，感慨万千地写道：

“十四年，对一个人来说，太长了！”

“路线偏差造成对革命同志的精神、肉体的摧残、折磨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内耗！”

刘志坚和秦桂贞“翻身”

“中央文革”副组长刘志坚是被江青打倒的，遭到了长期监禁。

那是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秘书念着长长的名单。他从这年春天起，患老年性白内障，视力渐衰，不能亲自阅批文件，要靠秘书念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典即将举行，有关部门报来了出席国庆招待会并拟见报的两千多人名单。

毛泽东主席听毕，提出要增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高震是否列入。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名单进行讨论，“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见周恩来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的小胡同——拐棒胡同，那里的一座四合院在沉寂了七个春秋之后，忽地热闹起来。

二十九日那天，一辆轿车停在四合院门口。来人奉中央之命，正式通知软禁在那里的刘志坚：

“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明天，你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

喜讯来得那么突兀，刘志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急急如律令：洗澡，理发，赶制新军装……裁缝在给他量了身材之后，当天就做好一套崭新的军装送来，以便他翌日能出席国宴。望着那红的帽徽和领章，刘志坚百感交集，泪水模糊了视线。

奉命监禁他达七年的部队撤走了，换上了原来的警卫员为他警卫。炊事员回来了。久别的那辆“吉姆”牌轿车，又回到他的身边。夫人刘菜瑛，也和他团聚了。一夜之间，他从“囚犯”跃为首长，可谓天渊之别。

翌日傍晚，“吉姆”送他来到熟悉的人民大会堂。年逾花甲的他，穿着一身新军装，步入宴会厅，见到抱病前来主持国庆招待会的周恩来总理，屏息聆听周恩来致祝酒词。许多人对于曾被“打倒”的刘志坚的突然“亮相”于公众场合，投来惊讶的目光。

十月一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在报道昨晚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时，提到了刘志坚的大名。全国各大报所载国庆招待会出席者的名单中，也都印着“刘志坚”——这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的名字。

“哦，刘志坚出来了！”这，成了当时全国关注的新闻。

十月三日，叶剑英元帅召见了刘志坚中将，详细询问了他的种种情况，特别问及了他的身体状况。

四个多月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刘志坚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七五年三月，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当时的院长为宋时轮上将。

五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召见刘志坚。不久，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从此，他在西南边陲这一重要的军事岗位上，干了七年多……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九八〇年，刘志坚冤案才得以正式平反。

在正式平反后，年已古稀的刘志坚，被从昆明调回北京。

他的三个子女，在“文革”中曾受他株连，天各一方：

长女原在中央美术学院学国画，被调离北京，到兰州那儿山沟里的“五·七”干校劳动；

二女儿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文学理论，被分配到东北一所中学教书；

小儿子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山西阳泉煤矿当工人。

随着刘志坚正式平反，一家五口人分处五个地方的局面总算结束。

如今，年近八旬的刘志坚将军，住在北京西城。在宽敞的客厅里，我与她以及他的夫人刘莱瑛长谈着。客厅里，挂着舒同题赠的李白的诗。他的记忆力仍很不错，往事历历在心头。

回顾“文革”初期的往事，他感叹道：“当时，虽然自己对一些问题有看法，想不通，但是也并不很清楚。我主管军队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我当时对毛泽东主席处于迷信状态，所以对‘文革’的错误也不是一开始就看出来的。对于‘文革’，我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秦桂贞受江青迫害，也吃尽苦头。她骂江青是“妖怪精”

终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她听到了“妖怪精”被抓起来的消息，兴奋得失眠了！

终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她登上中国民航“波音”班机，飞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邀请这位普通的妇女，作为被害人，出庭控诉江青罪行。

她住在北京第一流的京西宾馆。

一天，法官忽然来到她的房间，郑重其事地对她说：“秦桂贞同志，在公审江青之前，我们请你协助完成一项任务。”

“什么事？”她连忙问。

“关于对你的残酷迫害，我们提审了吴法宪，他承认了，作了交代。可是，江青矢口否认，态度非常恶劣！”法官说道。

秦桂贞一听，怒火顿起，说：“这妖怪精……”

“我们想请你辛苦一趟，到监狱去，去看一看江青。”法官说：“我们估计，她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想赖帐！”

法官还拿出一本旧相册，上面贴着蓝苹的许多剧照，秦桂贞一眼就认出，这是她当年送给蓝苹的。法官还拿出从秦桂贞家抄去的那些蓝苹照片。秦桂贞马上站了起来，跟着法官离开京西宾馆。

汽车驶出北京城。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她看见一片熟悉的景象：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

这不就是秦城监狱吗？

秦桂贞兴奋起来：“哈，妖怪精，我们‘对调’啦——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今天你来住！”

随着法官步入秦城监狱，秦桂贞见到一个女人裹着一件军大衣，翻起海虎绒衣领，倚墙坐着，在那里晒太阳。此人面色白里透红，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养神哩。

秦桂贞细细一瞧，不是别人，正是“妖怪精”！

秦桂贞怒不可遏，对着“妖怪精”大声喊道：“蓝小姐，我来了！”

江青一听这熟悉的声音，立即站了起来，瞪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她，终于喊了出来：“阿桂！”

江青居然伸出了手，想跟她握手哩。

秦桂贞才不会跟“妖怪精”握手。她义正词严地对江青说：“我待你那样好，你把我害得那么苦！”

这位普通的妇女，用这样一句朴素而深刻的话，回敬了“旗手”。

江青顿时脸色刷白。

秦桂贞一扭头，理都不理，走了。

“阿桂——”江青拖长声调，在那里喊她。

秦桂贞连头也不回，上车去……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到京西宾馆，笑着对秦桂贞说：“那天你去了以后，江青承认了对你的迫害……”

秦桂贞笑了。笑得那么得意。

她说出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天，终于时候到了！”

在我访问秦桂贞的时候，她伸出双腕，上面还留着当年手铐的凹印。她说这是蓝小姐留给她的“纪念”。

江青的铁窗生涯

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到了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她被改刑为“无期徒刑”。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死刑缓期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江青谈不上“悔改表现”，但是以这样的理由为她改刑：“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其实，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当特别法庭决定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时，就已考虑了二年期满后怎么处理。

伍修权曾这么谈及：

“至于‘死缓’二年以后怎么办，我们也有个初步设想，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和‘十二大’开过以后，我国人民对这类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一个特别决议，对这次判决予以减刑，将江青、张春桥死刑变为无期徒刑（引者注：在十名主犯中，唯张春桥和江青一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的无期和有期徒刑，是否也相应地减刑，到时候再酌情处理，以此体现我们政权的稳固和政策的正确。……”

江青的铁窗生涯，虽说因为秦城监狱门卫森严而几乎无法为外界所知，但笔者访问了公安部有关人士，还是得知了一些情况：

江青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二十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不过，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看不见外面。

她的伙食还可以，因为毛泽东过去说过，对于犯了严重错误以至罪行的高级干部，在生活上还是给予照顾。她的伙食，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要好。特别是在审判期间，伙食更好一些。她在狱中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她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只是在最高法院审判期间，不准她看报纸、电视，不准听广播，因为那一段时间，不断发表有关审判十名主犯的报道，有些内容涉及别的主犯的态度、交代，不便于让她知道。

江青的情绪不稳定，喜怒无常。考虑到她已上了年纪，狱中没有安排她参加劳动。只是她素来喜欢打毛线，如今又闹得无聊，有时靠织毛线衣打发日子。

另外，她喜欢看书。她自己拥有一万来册藏书。她获得允许，从她的藏书中，选择她要看的书，在狱中阅读。

江青读了这样一些书：

《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李长吉集》、《词综》、《李白与杜甫》、《楚辞》、《重订唐诗别裁集》、《阿登纳回忆录》、《李文山诗集》、《增广诗韵全璧》、《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真迹》、《史记》、《王临川全集》、《容斋诗话》、《重订老子正话》、《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敦煌壁画集》等。

江青毕竟是“四人帮”之首，虽然身在狱中，但仍为中外新闻界所关注。海外报刊上，不时登出关于江青狱中动静的报道，内中有不少只是猜想、传闻而已。

关于江青，中国官方每隔一、两年，要通过新闻传媒，予以报道。

以下是笔者所搜集的历年来关于江青狱中情况的正式报道：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该社北京特派员横崛走访中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的报道。

鲁主任说：“江青关押在北京监狱的单独牢房里。我们根据革命的人道主义给她一定的待遇，保障她的生活。并不是每天都有鱼有肉，但与其他犯人吃得一样。由于年龄关系（七十岁），几乎不要她参加劳动了。她的身体原先就不好，但监狱里有医生，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一九八六年七月，公安部部长阮崇武答复了外国记者的提问。

合众社记者问：江青、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的身体怎么样？张春桥能下床走动吗？

答：两人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问：什么病？

答：年纪大了，多少都有点老年病。

问：江青现在的态度怎么样？有无悔改之意？

答：江青的态度怎么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她这样的人很难说有什么悔改之心。

问：我们听说江青在监狱里被强迫做布娃娃？

答：（摇摇头）你是不是听信了一个意大利记者的报道。他怎么知道江青在做布娃娃，是不是从门缝里看到的。（众笑）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北京电，报道新闻发言人曾涛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曾涛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在继续服刑。他们当中，张春桥、江青患有老年性疾病，已得到正常治疗。

曾涛还提及，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故四人因年老有病，均已保外就医。邱会作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刑满释放。黄永胜于一九八三年因肝癌病亡。因此，在十名主犯之中，只有“四人帮”那四人仍在狱中。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香港《文汇报》、《明报》报道了中国司法部官员答记者问。

这位官员说，现年七十四岁的江青，最近因患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目前正在狱中接受治疗。

他否认了某青年杂志所说江青已被放出治疗喉癌的报道。

从以上逐年的关于江青的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江青晚年的概况。

女儿李讷一次次前去探监

江青晚年，她的唯一的直系亲属是女儿李讷——毛泽东和她所生的女儿。李讷获准一次次前去探望江青……

一九六五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解放军报》社当编辑。

一九六六年，父亲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母亲江青一马当先，成了“文革先锋”。那大浪大潮，把李讷也卷了进去。凭着李讷那“响当当”的背景，才二十六岁的她，擢为《解放军报》总编辑。此时，她化名“萧力”，亦即“小李”的谐音。

不过，李讷没干多久总编辑，就被毛泽东调去当联络员。确实，她当联络员倒是最为恰巧。她的年岁，跟红卫兵相仿。穿一身军装，可以随便进出各大学，“摸”来准确的、第一手情况，向父亲汇报，使毛泽东了解“文革”的脉搏。

一九七〇年，毛泽东让“萧力”到井冈山那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锻炼。

在那里，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年已三十的李讷，跟“五·七”干校中的小徐相爱了。

小徐是在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父亲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李讷会爱上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却不是“门当户对”的高干子弟，消息传出，人们颇为震惊。

毛泽东并不计较小徐的“身份”，应允这门亲事，还送了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礼物。毛泽东同意了，江青也只好表示同意。不过，婚后不久，李讷和小徐性格不合，志趣也不同，感情产生裂痕，彼此分居。但李讷已怀孕，生下一子；取名“李小宇”。

李讷回到北京。从一九七四年起，她先是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不过她身体欠佳，她的母亲没有派她当毛泽东联络员，而是从辽宁调来了毛远新。这么一来，她倒没有卷入“四人帮”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捕，李讷那特殊背景一下子消失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不成了。她跟儿子默默地在北京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

一九八五年，经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介绍，她和王景清结婚。王景清在四十年代，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后来他担任怒江军区参谋长，跟妻子离异。王景清为人憨厚、善良，细心

地照料李讷，使她在孤寂中得到了安慰。

李讷和王景清一起去秦城监狱探望，江青对新女婿表示满意。

他们每次去秦城监狱，是坐公共汽车去的。一往一返便是一整天。

江青见到女儿、女婿，还是高兴的。江青的腿脚有点不大灵便，往往要扶着墙壁走路，但气色还不错。最使李讷感到不快的是，江青极易发怒，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常常为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为芝麻绿豆小事，江青会发火。

尽管来去那么劳累，见面又往往不愉快，李讷和王景清还是一次次去看望江青……

以自杀告终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新华社（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江青终年七十七岁。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一九九一年——她已经被捕十五个年头了！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终于不想再活下去了！

其实，如同她当年“鼎盛”时，对张玉凤说过的：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本章结束)

--本卷结束

--(完)--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大陆直连本站: <http://tiny.cc/meyarw>)

声明: 本书仅供读者预览, 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 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